

5061/5600.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UB  
JUL 28 1959  
中國語文

37

7

1955



## 中國語文 1955年7月号(总第37期)目录

提高我們的政治警惕性，徹底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

和一切暗莊的反革命分子.....章 慤 (3)

### 討論和研究

拼音文字中的声調問題.....周有光 (4)

談南方人学习北京声調的問題.....江 成 (7)

試論尖团音的分合.....李 儔 (10)

不应当歪曲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任言信 (13)

僮族文字同僮語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問題.....謝爾久琴柯 (15)

关于汉语有没有詞类的討論.....本刊編輯部 (20)

对許紹早的批評的荅辯.....傅于东 (22)

文字改革和电报叶务.....朱学範 (26)

东北鐵路电报改革工作的經驗总结.....铁道部电务局 (30)

关于解决拼音电报中的同音字問題.....張 雁 (32)

談談科学用字的同音代替.....刘澤先 (33)

### 語文知識講話

現代汉语語法研究(六).....苏联 A. A. 龍果夫 (36)

### 报道·消息

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即将召开現代汉语規範問題学术會議..... (35)

汉语拼音文字怎樣处理声調問題——北京語言学界第三次座談会記要——..... (40)

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召开汉语規範化問題座談会..... (42)



# 提高我們的政治警惕性，徹底肅清胡風 反革命集團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章 翹

《人民日報》陸續發表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証實了胡風和他的集團的骨幹分子原來是反革命分子。他們混進了革命隊伍，有的混進了共產黨，爲的是要進行反革命的勾當。他們有自己的組織，有反黨、反人民的綱領，用兩面派的手腕和隱蔽的方式頑強地跟黨和人民爲敵。

胡風曾在江西“剿共”軍中做過反共的政治工作，早就和國民黨許多特務頭子有聯繫。他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一貫地傳播着資產階級的主觀唯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他口頭上說追隨着共產黨，但是事實上他領導着反黨、反人民的罪惡活動。

他一貫地堅持他的錯誤思想。在他所著的《對文藝問題的意見》那篇文章裏，他提出了反動的文藝綱領：反對作家掌握共產主義世界觀；反對作家跟工農兵結合；反對進行思想改造；反對民族形式的文藝；反對文藝爲當前的政治任務服務；取消文藝界統一組織，取消共產黨對文藝的領導。他對黨的文藝方針，對黨所領導的文藝事業，對進步的作家，不斷地進行極其惡毒的攻擊。他竟荒謬到那種程度：把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污蔑爲“圖騰”小冊子。

在最後一次進攻失敗後，他才寫出他的“自我批評”，企圖用假檢討蒙混過去。同時他指示他的骨幹分子——張中曉——“……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爲了事業，爲了更遠大的未來！”由此可見，以胡風爲首的反革命集團是不甘心於失敗的，他們還準備着繼續進行反黨、反人民的罪惡活動。如果不加以鎮壓，就是養虎爲患。

從《人民日報》所揭發的材料看來，胡風反革命集團不單是極端仇視、痛恨黨的文藝方針和黨所領導的文藝事業，並且對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所獲得的偉大的革命勝利和輝煌的成就，都是深惡痛絕的。胡風把黨所領導的文藝事業污蔑爲“這殭屍統治的文壇”。他接着說：“但我在磨我的劍，窺測方向，到我看準了的時候，我願意割下我的頭顱拋擲出去，把那個髒臭的鐵壁擊碎的。”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如阿壘、蘆甸、張中曉等，十分仇視人民革命政權和新中國的一切。阿壘詛咒人民革命政權的“滅亡”、“完蛋”。蘆甸把革命陣營看作是“枯黃的葉子”、“腐朽的屍體”。張中曉寫信給胡風說：“對這個社會秩序，我憎恨。”

他們既然那樣憎恨人民革命事業和人民革命政權，那麼他們的希望寄託在什麼上呢？很明顯，他們的希望是寄託在反革命政權的復辟上。這就是爲什麼胡風指使他的嘍囉們採取“挖心戰”和“孫行者鑽進肚皮去的戰術”來破壞人民革命事業，妄圖從內部來瓦解人民革命政權的原因。難道這不是很明白的嗎？

自從胡風反革命的罪行被揭發後，蔣介石匪幫要他到台灣去，並說他“有胆有識，值得贊揚”。這不是証明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得到蔣匪幫的支持嗎？

現在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醜惡的、猙獰的面孔和反革命的陰謀被揭露了，這是中國人民在同反革命陰謀的鬥爭中所取得的重大勝利。同時，正如《人民日報》6月10日的社論指出，我們必須從胡風事件吸取教訓，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當；並且都要學到一項本領，要善於辨別反革命分子，以便把一切反革命的陰謀揭露出來。”社論又指出：“必須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地有分別地對於清查出來的這些分子給以適當的處理。這是整個革命隊伍一切成員的任務，這是一切愛國者必須注意的大事情。”

我們語文工作者應該響應《人民日報》那篇社論的號召，提高我們的政治警惕性，爲徹底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同時，我們語文工作者應該把這次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這個政治任務，跟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思想建設工作結合起來，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以提高我們的思想政治水平，爲消除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爲擴大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指導作用而奮鬥。



# 拼音文字中的声調問題

周有光

## 一 声調的社會職能

声調一方面表現爲物理現象，另一方面表現爲社會現象。作爲物理現象，声調主要是元音的高低升降變化。作爲社會現象，声調是區別詞兒意義的一種條件。声調雖然以物理現象而存在，可是声調在語言中所以有它一定的重要性，却是由於它在一定場合下担负着區別詞兒意義的社會職能。声調成爲漢語和其他漢藏語言的一種特徵，是因爲它有這樣的社會職能。声調成爲漢語拼音文字必須研究的一個問題，也是因爲它有這樣的社會職能。

在漢語詞兒裏面，每個重音音節都有一定的声調。可是，不要誤認漢語詞兒統統是依賴声調來區別意義的。正相反，依賴声調區別意義的僅僅是漢語詞兒的一小部分，就是那些同音異調的詞兒。同音異調詞兒多半是單音節詞兒。多音節詞兒很少同音異調，所以多音節詞兒一般都不依賴声調區別意義。

古代漢語裏，單音節詞兒佔據多數。現代漢語裏，多音節詞兒的比重不斷增加，大約已經佔據詞彙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漢語多音節化的必然性是不難理解的。現代北京話有四百多個音節，加上四種声調變化，成爲一千多個有調音節，假如不用多音節詞兒，就只能構成一千多個詞兒，超過一千多個，就不能避免同音同調的同音詞兒了。任何一種語言決不能局限於一千多個詞兒。就是加上一些單音節的同音同調詞兒也還是不夠的。我們無限制地發展着的思想要求我們用可以無限制地增加的多音節詞兒來表達。多音節詞兒在漢語最古的文字記錄裏就已經有了。現代漢語的多音節化更有迅速的發展。

社會的發展和現代教育的逐漸普及促進了漢語的多音節化。在口語裏，在書面上，多音節化的發展都是顯然可見的。人民的知識愈提高，口語裏應用多音節詞兒的需要也愈多。從文言文到白話文，也就是口語多音節化在書面上的反映。

詞兒並不因爲多音節化而失去声調。声調却因多音節化而逐漸失去區別意義的作用。多音節化的結果，声調雖然保留着它的物理存在，但是逐漸失去它的社會職能。詞兒的多音節化与声調區別意義的作用正在以相反的方向發展着。

同音詞当中有同音異調詞兒和同音同調詞兒。於同音同調詞兒，声調並不發生區別意義的作用。調只是區別詞兒意義的條件之一，它並不能解決同音詞的問題。

声調的特性跟元音和輔音的特性不同。第一，調是附着於元音或元音輔音的結合上面的。離開元音或元音輔音的結合，声調變化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可是離開声調變化，元音和輔音仍然存在。因此，音和輔音是構成音節的基本條件，而声調只是音節的補助條件。第二，声調的明確性比較微弱。調主要是元音的音高變化，音高變化不及元音或輔音本身的音位變化來得明確而肯定（這在異地人更難感覺到）。第三，声調的穩定性比較微弱。声調在音節上變成失去個性的輕聲，受了前後音節的影響或口氣的影響又發生一定的變化。從1932年的《國音用字彙》到1955年的《同音字典》，二十年中北京話声調就變了不少，例如“拙”“跌”等一些古入聲字還是陽平，現在變爲陰平。元音和輔音也有改變，可是像声調那麼快。第四，声調調值的普遍性比較狹小。值（声調的實際高低升降）只在很小地區中是相同的，往往鄰縣各不相同（北京跟天津就不一樣）。語言學比較各地方言調值的異同和它在歷史演變中的分合關係，把紛歧的調值歸納成彼此相通的調類。可是各調類多少不一（少的三調，多的七調、九調或更多）。彼此相通的規律不很簡單，而且還有不少例外（例如入聲在北京話中的声調分配）。第五，声調區別意義的作用範圍比較狹小。在同音異調的詞兒中間，它有區別意義的作用；在一般詞兒中間，它不是區別意義的決定條件。換言之，声調要在元音和輔音



區別意義的作用時候方才發揮區別意義的作用。

《聲實驗錄》的作者劉半農說：“音質（輔音和元音）於語言，比四聲重要得許多”。聲調的特性決定它在漢語中的重要性次於元音和輔音，因此聲調在拼音字中的地位也就不能跟元音和輔音等量齊觀。

## 二 聲調的標記範圍

聲調在漢語裏既然還有區別詞兒意義的作用，漢語拼音文字就應當標記聲調。不過，標記聲調有兩種不同的意義。一種是作為正音符号即語音教學的工具標記聲調。另一種是作為詞兒定型即文字形態的一部分而標記聲調。二者不可混為一談。

學習標準語，需要學習聲調以及其他語音特點（重音等）。為了方便語音教學，需要有所謂聲調符号及其它語音符号（如重音符号等），幫助指導正確發音。在詞典上，在語文課本上，在各種通俗讀物上，是指導正確發音的地方，都要標記聲調，最好每個音節一一標記，不僅標記四聲，有時還要標記輕聲和變調。正音符号是一種語音教學的工具，它的目的在指導正確發音。它是作為外加物加到文字上去的語音符号，不是文字本身的構成部分。

詞兒定型中的聲調標記作用不同。它是詞兒的書寫形態，是文字形態的構成部分。它也可以指導發音（變調），可是它的主要目的在區別詞兒的面貌，幫助區別詞兒的意義。在文字形態上，只有對於意義必不可少的地方才把聲調標記出來，其他一概不標。當然，不標聲調並非否定聲調或廢除聲調，只是在文字形態上不寫出而已。

作為正音符号，聲調應當儘多標記；作為詞兒定型，聲調應當儘少標記。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分別呢？二者的目的不同。正音符号只在有關正音教育的場合上應用。它是給學習文字和標準語音的人們看，所以要儘多標記。定型的詞兒是正式的文字。正式文字是千千万萬已經識字的人們每天要閱讀，或用機器來轉動的。文字使用的羣衆性和頻繁要求文字形態儘可能地簡明。為了簡明，就應當少標調，只把區別意義所必要的聲調寫進正式文面去。假如有調皆標，那就造成累贅和浪費了。一方面要求簡明，另一方面還要求精密。為了精密，拼音文字不能放棄區別詞義的聲調條件，同時還要其他條件來區別聲調所不能區別的詞義和詞性。

像“社會主義”、“帝國主義”這樣的多音節詞兒，同音詞問題，寫成 shèxuéizhuji, diguozhuji, 不標調，已經是够明白了。對初學的人們，當然可以

標記聲調，指導發音。學會以後，不標聲調，決不會讀錯聲調。假如把聲調標記加進文字，作為固定形態的一部分，寫成 shèxuéizhǔjì, diguózhǔjì 或 shèhhuéyjuuyih, dihgwójjuuyih, 天天這樣書寫，這不是自找麻煩麼？單音節詞像“賊”(zei)、“丟”(diu)、“黑”(xei)等等，既沒有同音異調詞兒，當然也不須標記聲調。聲調和重音同樣是語言的節律<sup>①</sup>。西洋文字如俄文、英文等不把重音標記作為文字形態的構成部分，也是為了使文字簡明。

依賴聲調區別意義的同音異調詞兒要在文字形態上標記聲調。例如：“買麻”(上、陽)、“賣馬”(去、上)、“埋媽”(陽、陰)，可以分別寫成 mǎi má, mài mǎ, mái ma, 或 maai max, maih maa, maj ma。同音異調詞兒如其詞類或功能不同，不怕混淆，在文字形態上不須標記聲調。例如：“所以”和“蓑衣”，一個虛詞，一個實詞，同樣寫成 suoji, 也不相混<sup>②</sup>。一組詞類或功能相同的同音異調詞兒，不須全部標調，至少其中最常用的一個可以不標。例如：“大(da)”和“打(dǎ 或 daa)”，“看(kan)”和“砍(kǎn 或 kaan)”，前一個最常用的詞兒(大、看)不須標記聲調。同音異調的多音節詞兒只要標記一個重音音節或一個足以區別意義的音節。例如：“建立”、“見禮”，不必寫成 giànli, giànli 或 gianhlih, gianhlii, 只要寫成 gianli, gianli 或 gianlih, gianlii 就可以了。輕聲(如“兒子”的“子”、“衣服”的“服”)、擬聲(如“辟拍”、“辟歷拍拉”)和外來音(如“布爾加寧”、“莫斯科”、“雷達”)都不須標記聲調。文字形態上應該標記聲調的範圍，大致是輕聲、擬聲、外來音以及一些最常用詞兒以外的詞類相同的同音異調詞兒，這主要是單音節詞兒。

上面說過，聲調的穩定性是微弱的，它受前後音節的影響而發生一定的變化。例如：北京話裏，兩個上聲連接，前一個就變陽平。“好”(上, xǎu)和“米”(上, mǐ)連接，說成“好米”(陽平, 上, xáu mǐ)。又如：上聲後面連接平聲(陰或陽)或去聲，上聲就變“半上”。“好”(上, xǎu)加“人”(陽平, rén), 就說成“好人”(半上, 陽平, xáu rén)。這樣，“好”這個音節就有幾種不同的聲調：原調和變調。“好”的聲調雖然變化，它的意義沒有變化。正音符号要求發音正確，應當根據變調標記。文字形態要求同一詞兒有同一面

① 田恭：《語言的節律》，見《見中國語文》，27—28期。

② “Suoji 一件”當然是“蓑衣一件”，“suoji 如此”當然是“所以如此”。“Suoji suoji 丟了”，可能弄不清那個是“所以”，那個是“蓑衣”，但這有什麼關係呢？

貌，应当根據原調標記。(區別詞義或詞類的聲調變化，不算變調，在文字形態上要照實際調。例如：表示“愛好”的動詞“好”xào要標去聲)。

### 三 聲調的標記方法

聲調標記有好幾種方法，但主要的不外附加符號和字母拼寫兩種方法。

用附加符號標調，這在注音字母裏就早已有了成例。注音字母的辦法是：(1)陰平省略不標，(2)陽平在字母上面加[ˊ]，(3)上聲在字母上面加[ˇ]，(4)去聲在字母上面加[ˋ]，(5)輕聲在字母左面加[·]，(6)如其需要標記入聲，在字母上面加[ˊ]，(7)北京的“半上”變調沒有規定符號，《增訂注解國音常用字彙》把上聲符號反過來，寫成[ˋ]。

拼音文字不妨繼承注音字母的成例。在文字形態上，陰平和輕聲不標，陽平、上聲和去聲用三種符號。(陽平符號可以把向右上挑‘改為向左下撇’，這樣書寫方便，也符合國際習慣)。正音符號在需要時候還可以標記陰平(可用[ˊ])，輕聲(便利橫寫起見，點可加在字母下面)、半上和入聲。

附加符號的放置地位可以有兩種。一種是加在音節的主要元音字母上面，如其元音字母省略，加在主要輔音字母上面。例如：愛 ài，眼 iǎn，死 sǐ，十 shí。另一種是加在音節末尾的右邊靠近上角。例如：愛 aiˊ，眼 ianˊ，死 sˊ，十 shˊ。(新出版的《同音字典》中注音字母的聲調符號就是加在右邊靠近上角的。)

聲調符加在元音字母上面，這跟國際習慣是符合的，同時也可以表明聲調主要就是元音的音高變化。可是，字母加上符號，對於文字的機械化是一個累贅。在打字机上增加幾個符號困難還不很大，在字母排鑄機、電報打字機、郵址刻印機等機器上，就要增加字母模型，這等於增加字母總數。元音字母和可能構成音節的輔音字母都加上三種符號，要增加21個到33個(最多48個)字母模型(例如a, e, o, i, u, y, j; z, c, s, r; 或Y, Z, C, S, I, X, U, W, P, M, F, A, T, N, D各三個)。這等於把字母總數增加一倍以上，對於機械化的不便是不難了解的。如其把聲調符號加在音節末尾，就只要增加三個符號模型，非常方便。對於電報，音節末尾的符號用字母代替(例如用-x, -v, -h)，也比代符字母夾在音節中間妥當。(例如在電報上寫ianx比寫iaxn好)。音節末尾的聲調符號還可以兼作音節分界的用處。

用字母拼寫來標記聲調，只要變化運用原有的字母就可以達到目的，沒有專造字母增加字母總數的必

要。變化運用原有字母的方法，國語羅馬字已經有精細的設計。它運用加字法(加h, r)，疊字法(重元音字母和-h, -l)和改字法(i, u改e, o或y, w; ng, nq)，擬訂了如下的聲調拼寫規則：

陰平：(1)用基本拼法。(2)聲母m, n, l, r後加(如mhau猫)。

陽平：(1)開口韻元音後加r(如char茶，ton同)。(2)韻母第一字母i, u改寫y, w(如tyan田hwei回)，單元音i, u改寫yi, wu(如pyi皮，吳)。(3)聲母如爲m, n, l, r，用基本拼法(如民)。

上聲：(1)重疊單元音(如faan反)。(2)複韻頭尾字母如爲i, u，改寫e, o(如goan管，hae海)但既改頭不改尾(如neau鳥)。(3)ei, ou, ie, uo重e或o(如meei美，guoo果)。

去聲：(1)韻尾-i, -u, -n, -ng, -l改寫-y, -nn, -nq, -ll(如gay蓋，yaw要，bann半，ganqell二)。(2)無韻尾的加-h(如shih戲)。

這種聲調拼寫規則過於繁複，而且音節分界不明(例如“使用”拼成shyyong)，似乎可以簡化如下：

陰平：用基本拼法。

陽平：音節後加-x(但末一字母i, u改寫)。

上聲：重疊主要元音字母。

去聲：音節後加-h。

附加符號和字母拼寫兩種方法，各有優點。符號的最大優點，是它一方面可以區分同音異調，另一方面又不更動文字的基本形態。它可以兼充符號和定型標記兩種作用。在拼音文字的初創時期，何處應標，何處不標，何處多標，何處少標，一時於約定俗成。在不更動文字基本形態的條件下，附加符號，就不妨多方嘗試，各行其是。最後，在約定俗成的拼音文字上，必要的符號會保留下來，不必要的符號會脫落掉<sup>①</sup>。字母拼寫的優點是形態明確，但它缺乏伸縮性。所以附加符號可能是比較容易得各方贊同的辦法。

從國語羅馬字到拉丁化新文字，在聲調問題上，過了全標和不標兩種嘗試。今天已經到了可以總結兩種嘗試從而解決標調問題的時候了。根據聲調在裏面區分詞兒意義的作用，確定聲調在拼音文字形態的標記範圍，同時保留正音符號的適當運用，這就是可能的解決吧。

① 黎錦熙先生風趣地稱爲“蝌蚪式”。



# 談南方人學習北京聲調的問題

江 成

漢語調類的數目在各地很不一致，最少的只有三，最多的達到十一類。不過要談各地調類之間的關係，必須按照平、上、去、入四類來談。把聲調分成四類實在是統攝各地調類關係的很科學的方法。現在我們談聲調，也應該按照這四分法來談。

在這四聲中，入聲情形比較特殊，放到後面去，現在先談其餘三聲。

因為各地調類之間有一定的轉變規律可尋，所以南方人學起北京的調類來，並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需要全部逐字硬記的。

拿比較容易理解的輔音來做比方：上海人學習北京的因音，只要注意把自己方言裏的尖音併到因音裏就行了。調類多的地區的人學習北京調類，採取的是這個辦法。上海人學習把尖音併到因音裏去，基本還是一種意識活動；而廣州人學習把陰去和陽去併到北京的去聲，則往往是不自覺的，或者幾乎是不自覺的。凡是去聲分陰陽的地區（除一部分吳語區）的人，學北京的去聲，據我了解下來差不多都是如此。

各地調類和北京調類的區別，基本上就在分不分陰陽（指“上下”）上面，所謂學習北京調類，基本上也是學習把陰陽合併。

據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說，丹陽話的平聲不分陰陽的。丹陽人學習北京調類的情形我不了，據推測，他們學習區分陰平和陽平，大概和某些學習區分  $P$ 、 $q$ 、 $\Delta$  和  $u$ 、 $y$ 、 $\pi$  一樣，是需要硬記的。

總看全國調類紛歧的情形，各地人學習北京調類有規律可以遵循，而且遵循這個規律來學習北京調類往往是很自然的，不自覺的，我過去教學北京聲調類（調值），一直採用直接教學法，舉例讓大家聽而不加分析，效果往往很好，原因大概就在這裏。

所以我們在談聲調的時候，不必強調調類紛歧給教學造成的困難。撇開聲調的陰陽區別不談，各地調類基本上是一致的。

調類一致並不等於每個調類所包括的單字在各地都一樣。例如“塊”字，有些地方讀去聲，有些地方讀上聲。這種紛歧在各地和北京之間是有的。

據我初步統計，廣州話裏和北京話調類不同的非

入聲字有 93 個，佔調查的字彙總數 2515 的 3.71%<sup>①</sup>。其中不同的大部分是陽上字，如“柱”“旱”等在北京已經變入去聲；另外一些是北方口語裏的字，如“抓（廣州讀上，北京讀陰平）”，“嚷（廣州讀去，北京讀上）”之類。

福州話裏和北京話調類不同的非入聲字有 109 個，佔統計的字彙的總數 2934 的 3.74%<sup>②</sup>。

客家話裏和北京話調類不同的非入聲字有 136 個，佔統計的字彙的總數 2676 的 5.06%<sup>③</sup>。

這裏要說明一下，因為根據的材料不同，各個材料所包括的單字不完全一樣，有些單字在甲材料裏有而在乙材料裏沒有，因此總的字數不能完全相同。在統計時，凡是我認為常用字，即統計在內。另外，有時一個字在北京有兩種讀音，如“企”讀上聲又讀去聲（意義不變），在廣州字彙裏只讀上聲一種，也作為相同看待。有些字，聲母或韻母不同，而根本無通轉規律或無明顯的規律可尋的，不管調類是否相同，都不統計在內，如“糾”北京讀如“鳩”，廣州讀如“斗”，“鉛”北京讀如“牽”，廣州讀如“圓”之類。有些字因意義不同而調類不同的，在各地也基本上一致。如“愛好”的“好”讀去聲，“好壞”的“好”讀上聲；“丸散”的“散”讀上聲，“散開”的“散”讀去聲之類。這些一律統計在內。

據教學經驗來看，廣州人和福州人一般似乎很少注意到各地的字調有紛歧，他們大都把注意力放在調值上面。因此在教的時候要特別選出一些調類不同的字給他們記住，使他們注意：“抓”不是“爪”，“嚷”不

① 這是根據華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廣州音常用詞表》統計的。《詞表》共有 3000 字，其中 485 個是入聲字。

② 這是根據的《戚參將八音》統計的。我把其中我認為常用的 2934 個非入聲字選出來和北京音對照，得出來這樣一個比例數。

③ 這是根據 D. Mac Iver 編的《Hakka Syllabary》統計的。這本字彙是否可靠不知道，我自己也不懂客家話。好在我並不一定要求得到精確的數字，比例稍有出入無關大局。又據王力的《中國音韻學》說，有些上聲字在客家話裏轉入陰平，我在統計時沒有發現這個現象，可能這本字彙裏所拼的只是讀書音。

是“讓”，“鼻子”不是“避子”或“屁子”。由於這類字不很多，他們從來沒有表示過有困難。我曾留神過一些自學北京話的廣州人，他們是在說得比較熟練之後才開始注意糾正個別字調的。

在整個教學中，聲調的確是比較輕鬆的課程。這因為聲調的轉變比較規則。拿福州的“春”韻的613個非入聲字來說，其中277個字的韻母，福州人在學北京音時要硬記，227個字的聲母要硬記，而聲調要硬記的只有31個字。因此，教學的結果，聲調總是最先被學生掌握住。

至於吳語，因為手邊沒有現成的材料，字調無從統計。這裏只能根據吳語的特性來談。

吳語區內各方言間的字調也很不一致，例如杭州的字調幾乎完全和北京的一致，而紹興的則和北京的有比較大的分歧；像新上海話，它的聲調已經一半脫離了原來的四聲格局而形成了下面這樣一個格局：

清長音1(天、霞、錢、殯)

清長音2(刊、想、告)

濁長音(期、平、買、賣)

清促音[陰入]

濁促音[陽入]

吳語區的人學習北京聲調，主要有這樣幾個困難：第一，自己方言裏的陽平、陽上、陽去(埋、買、賣)的調值比較接近，不容易分清；在蘇州陽上和陽去已合併，在上海連陽平也併在一起了。第二，有些方言把陰上和陰去併成了一個調子；有些方言陰上(陰去)和陰平雖然不同，但調值很接近，不容辨別。有人曾經說過，寧波人對“一堆”和“一對”一類的詞“是不大能夠明確分出來”的<sup>①</sup>。當然這種情形不很普遍，例如杭嘉湖三角地帶的調值都是相當清晰易辨的。第三，有一部分陽上字在北京轉入了去聲。

由於字調不一致和調類合併，江浙大部分人學習北京聲調，已經比較難於“以類比類”了；頂多只是拿陰平字來比陰平字比較簡單。另外，像上面提到過的“好”“散”各有兩種讀音的情形，在一部分地區(如上海)的話裏已經不存在。

從上面這些情況來看，江浙有些人學習北京的調類的確比粵、閩人學習起來困難大一些。

但據我教學的經驗來看，江浙人學得並不見得慢多少。各地人的情形當然有不同，例如杭州人好像比閩、粵人學得還快，而上海人學得最慢。

上海人雖然學得最慢，但是也不如想像的那樣困難。我猜想，這可能有三個原因：第一是有些詞基本上不必學，如“清長音1”在北京音裏大都變陰平。第

二是平常北京話聽得多，不知不覺已經記住了一些常用的字的聲調，例如“好壞”的“好”不會說成“耗”，“走”不會說成“揍”。第三是在記住聲母的時候，同時記住了聲調，例如記住了“皮、塗、狂、慈、持、讀送氣聲母，也就記住了它們大抵是讀陽平；記住了“避、度、逛、字、治、技”讀不送氣聲母，也就記住了它們大抵是讀去聲。如果聲調沒有記住，聲母也定沒有記住，這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另外也確有些上海人，聲調一直沒有學得很好，不過這些人學習母和韻母的成績也都很差。(有些學習拼音文字的只學聲、韻不學調，那當然記不住調，這是另一問題)

江浙人學習北京聲調，比較喜歡把某些非輕聲音節，如“汽車”的“車”，“電話”的“話”，都說成聲；還有人常愛照自己方音的習慣自由變調，例如“發展”說成“發沾”，把“五點鐘(吳點鐘)”說成“五衆”。對於多用輕聲和隨便變調的習慣，我很注意正，因為這樣說話容易造成誤解。

我在教聲調的時候，總是寫出“聲調練習表”來，帶領大家反覆朗讀，而不講調值的轉變規律。因為教聲調時講調值的轉變規律，容易使學生把調值類似的兩種轉變纏混，或者會使他們在說話的時候，聲調在嘴裏咀嚼一會才說出來。反覆朗讀的教學，不會產生這種結果。

這樣教起來，即使是江浙人，也是聲調比韻母學會。

上面談的是非入聲的教學情況。

入聲的情形比較特別。它到北京音裏變成哪個規律是有的，不過這些規律現在已經不太可靠；規律雖然比較可靠，但是不研究音韻學的人無法掌握。有些南方人記住了一些入聲字在北京音裏的讀音之後，會不自覺地掌握住其中一兩條比較明顯的規律，如次清音的入聲字變成去聲字之類。但就一般說來，學習入聲字都是一個字一個字硬記的。

不過，硬記的不光是入聲字在北京音裏所入的類，還要記韻。

拿上海話清音的a?韻做例子，在北京音裏分下面這些韻(包括調)：

Y(紮)Y(察)Y(塔)Y(榻)IY(瞎)IY(夾)IY(嚇)Y(拍)Y(百)Y(喝)Y(格)Y(冊)Y(濕)Y(赤)XZ(着)XZ(綽)<sup>②</sup>

<sup>①</sup> 見倪海曙編的《中國語文的新生》172頁。

<sup>②</sup> 有些字的變調影響到清濁，如“要求”的“要”讀“腰”，“從容”的“從”讀“聰”，不讀“從”，這兩類字在上海話裏還是分的。

這裏舉的是比較突出的例子。上海話的入聲有五，每一韻在北京話裏至少分入三韻(包括調)。



非入声字决没有这样厉害的纷乱情形。当然，一  
要找出转变规律来，也可以，不过要通过音韵学，  
也是一般人办不到的。所以一般人学习入声字，要  
时记住它们在北京音里读哪一调和哪一韵。照一般  
形看来，南方人是这样对待入声字的：

1. 按照北京白话音的韵和调来读，如“绿”读成  
“lǜ”，“百”读成“bǎi”；
2. 按照北京读书音的韵来读，保留促音或读成阳  
平，如“绿”读成 lǜ? 或“lú”，“百”读成 pǎo? 或北京  
“博”。

我在教入声字的时候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凡是  
《音常用字彙》裏“○”后面的字，必须完全照北京音  
读，“④”后面的字，韵按照北京音读，但可以读成阳  
平（就是说，他们若读成阳平，我不纠正）。

我所以要这样做，第一，因为入声字除掉转入阳  
平和“○”后面的不入阳平的字，只占全部常用字的  
1%①，不致影响一般的语义清楚；第二，比较符合  
一般人学习北京音的习惯，使它们学起来便利些。当  
这个精神不一定适宜用到拼音文字的单音工作上，  
因为拼音文字要求有固定的标准拼法。

总之，根据教学经验，南方人学习北京的声调的  
困难并不比学习声或韵的困难大。不过这里所说的不  
括北京的不合规格的土话字调在内②。

我曾经说过，不必强迫各地人学习北京的调值，

这里还要补充两句。声调是抽象的，只有当调类和某  
地的调值结合起来的时候，它才是具体的东西。将来  
教声调，势必还要拿一定的调值来作为教学调类的手  
段，否则教师将无法开口。根据目前南方学习普通话  
的情形来看，他们大都很自然地就学会了北京调值或  
不很纯粹的北京调值。所以我想，将来即使用北京调  
值来教拼音文字，也不会有什么困难。至少这个困难  
要比学习“声值”或“韵值”小得多。

我想，只要把声调的纷歧和声母、韵母的纷歧比  
较一下，我们就一定不会过分强调学习声调的困难  
了，因为南方人学习北方音，主要困难绝对不在声调  
上。如果将来教拼音文字是直接教“词儿”的话，恐怕  
连“声调练习表”都不需要；学的人记住了一定数量  
的词儿之后，对其余很多词儿的声调符号大致上可以  
类推旁通（当然也有需要“硬记”的）。至于普通话  
区的人学习声调，问题就更小了。

①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的《简明字彙》共收 3507 个字，  
其中有 472 个是入声字；在入声字中有 142 字转入阳平，有  
96 字是“○”后面的入声字；69 字中有读阳平的 20 个字，已  
包括在 142 字中，故不重复统计。472-142-49=281。当  
初我教的时候，只是感觉到这一类的字不多，没有作过统  
计；这个统计是最近做的。

② 参看《语文知识》12、13 两本中陈刚的《谈北京话里  
的歧调字》一文。

39 页)

例如“出去”)以及把它用在“做活去呢”，“洗  
去呢”，“睡去呢”这一类型的词组里，促成这  
个动词的另一虚词用法，即用为不定式的语尾。这个  
虚尾的名词性表现在：动词加上这个语尾之后，就像  
有名词一样，可以用做主语或是宾语，例如：

说去好说，做去可难(得很)。

他走了外头看去了。

据我看去，他能走开。

### 表示给和取的动词

101 在及物动词的内部又可以分出为数不多但  
很重要的一组动词，这些动词由于它们的意义内容  
在後面有两个宾语——间接的和直接的，这也就  
成了它们语法上的特点。属于这一组的不但有表示  
的动词，像“给”和“送”，还有表示“取”的动词，像  
“借”、“买”等等①。例如“谁给他钱的？”或  
“他借我三块钱”。

用人称代名词做间接宾语的时候，可以在它後面  
上加语。名词语尾“的”把它转变为直接宾语的加  
语。例如，除了“给他钱”以外，在方言里还可以  
“给他的钱”；除了“借他钱”以外，还可以  
“借他的钱”，意义不变(参看 § 33)。

### 表示说话、感觉和思想的动词

102 在汉语中，正如在其他语言中一样，表示

说话、感觉和思想的动词，像“说，看，听，知道”，  
等等，构成特殊的一组。

这些动词的语法上的特点是可以整个句子作宾  
语，例如：

他说他明儿来。

在这些场合，句子“他明儿来”是动词“说”的宾语，  
并且是直接宾语，这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证明：在一  
些方言里，它像任何直接宾语一样，可以被转变为动  
词·前置词“把”的宾语，放在主要动词之前，例如：

学生 qay 把他打哪来的，走哪  
去的给说了。(甘肃)

可是因为在这种句子里，在逻辑上最为重要的不  
是说话或感觉这些动作的本身，而是这些动作的内容，  
所以在现代汉语中，如我们曾看到过的 (§ 88)，在这  
种场合有使逻辑上的和语法上的谓语趋于一致的倾  
向。因此产生下面这种对现代语说来是非常典型的句  
法结构：

我打算着是他来了。

我思量的他明儿来呢。

最后还有混合格式：……的+是……。

人明明的是叫老虎给吃了。

在所有这些场合，不论“是”还是“的”还是“的是”，  
都起着同一个作用——它们突出并强调一个陈述的宾  
语，亦即对于这一陈述的主语所报道的新的东西。

(邵荣芬、郑祖庆译，吕叔湘校)

① 比较法语 lui emprunter, lui arracher, 等等。

# 試論尖團音的分合

李 濤

中國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這是早就肯定了的。拼音文字跟漢字不完全一樣，它的字形是用字母根據語言的聲音組成的。因此，對於確定拼音文字字形的標準音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現時各方面對於拼音文字應該採用北京音系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在尖團音的分合上意見有着分歧。尖團音的分合對於確定拼音文字的字形有很大的關係，對於它的處理已經引起語言學家和文字改革工作者的注意。

## 一 尖團音和尖音字

在漢語裏有些地區是分尖音、團音的。什麼叫尖音、團音呢？ $P, \text{ㄗ}, \Delta$ 這組聲母跟“ $i$ ”韻母（或由“ $i$ ”開頭的結合韻母）或“ $u$ ”韻母（或由“ $u$ ”開頭的結合韻母）相拼合而成的音節，稱為尖音，像  $PI$ （即） $\text{ㄗ}i$ （齊） $\Delta i$ （西）、 $PU$ （聚） $\text{ㄗ}u$ （趨） $\Delta u$ （徐）這些都是。 $\text{ㄣ}, \text{ㄘ}, \text{ㄙ}$ 這組聲母跟“ $i$ ”韻母（或由“ $i$ ”開頭的結合韻母）或“ $u$ ”韻母（或由“ $u$ ”開頭的結合韻母）相拼合而成的音節，稱為團音，像  $\text{ㄣ}i$ （及） $\text{ㄘ}i$ （其） $\text{ㄙ}i$ （希）、 $\text{ㄣ}u$ （居） $\text{ㄘ}u$ （區） $\text{ㄙ}u$ （許）這些都是。尖音有38個音節（包括同  $u\text{ㄝ$  拼合的），讀尖音的字約有八百多個；團音有42個音節，讀團音的字約有一千多個。但是，有些地區却不分尖音團音，就是說只有團音沒有尖音。分尖團音地區的尖音字，在不分尖團音的地區都是念團音的。由於上面這種情況，就發生了漢語拼音文字要不要分尖團的問題。

我國記錄古音的字書，如《廣韻》《集韻》《中原音韻》《五方元音》等是有尖團音的區別的，1605年前後利瑪竇在中國出版的供西洋人學漢字的注音文章裏也有尖團音的區別。但是記錄現代音字書，如《新華字典》《同音字典》等是沒有尖團音的區別的。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全面調查，我們作得很不夠，古代的字書上有尖團音的區別和現代的字書上沒有尖團音的區別，都還不能有力地證明各地方言對尖團音區別的情況。究竟是不分尖團音的佔多數，還是分尖團音的佔多數，這個問題目前可以存疑，等有了確實的資料之後再來研究。

拿全國範圍內能區別尖團音的人多作為把尖團分開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

## 二 尖團音發展的趨勢

語言不是靜止不變的，語言是隨着社會發展而發展的。語音的變化是語言發展的結果，是語言發展內容之一。現代漢語是由古代漢語發展來的，現代語的語音是由古代漢語的語音變化來的。現代漢語多數方言中的舌面音（ $\text{ㄣ}, \text{ㄘ}, \text{ㄙ}$ ）是由古代漢語的舌根音舌尖音轉變來的。“精”現在讀作  $\text{ㄣ}i\text{ㄥ}$ ，古時的聲母是  $P$ ；“清”現在讀作  $\text{ㄘ}i\text{ㄥ}$ ，古時的聲母是  $\text{ㄗ}$ ；“心”現在讀作  $\text{ㄙ}i\text{ㄥ}$ ，古時的聲母是  $\Delta$ 。古時的  $P, \text{ㄗ}, \Delta$  所以能夠變為現代的  $\text{ㄣ}, \text{ㄘ}, \text{ㄙ}$ ，主要是由於以下的原因：

$P, \text{ㄗ}, \Delta$  是舌尖前音，發音的時候舌尖向前碰到上門牙的背面，或者接近上門牙的背面，讓氣受到阻礙。 $i\text{ㄩ}$  在發音的時候，舌頭的前部上升跟顎的前部（硬顎）接近，舌尖抵住下門牙的背面，同時把嘴閉攏，讓一口氣從舌頭前部和硬顎的中間流出。發  $i$  音的嘴唇是扁的，發  $u$  音的嘴唇是圓的。 $\text{ㄣ}, \text{ㄘ}$  是舌面音，發音的時候舌頭的前部上升碰到硬顎，舌尖也要抵住下門牙的背面，讓氣流受到阻礙。 $P$  同  $i\text{ㄩ}$  拼合成音節的時候，舌尖要從上門牙的背面向下門牙的背面移動；但是  $\text{ㄣ}, \text{ㄘ}, \text{ㄙ}$  同  $i, u$  拼合成音節的時候，舌尖是不移動的。尖音的拼合，舌尖運動量大些，所以也就困難一些；團音的拼合，舌尖不必移動，所以也就容易一些。在漢語的許多地方裏，在語言的發展過程中，尖音有併入團音的事實。由於語音同化的影響，全國方言中的尖音都有着併入團音的明顯的趨勢。

在過去有些地區是分辨尖團音的，但是現在不分了，像四川。也有些地區是老年人能分而年青人不分了，像開封。尖音併入團音一方面是由於語音在變化，一方面是由於受方言集中的影響。語音的變化比較慢，方言集中的影響是比較快的。尖音併入團音的趨勢在人口流動量大的地區就顯得快，而

① 參考田恭《語音的變化（上）》，見《中國語文》31期。



口流動量小的地區就顯得慢些。但是不管變化的快，還是變化的慢，由於方言的集中，語音的同化，在漢語的發展中有着尖音併入團音的明顯的趨勢一點，是不容否認的。

### 三 尖團音和同音詞

有一些同志拿尖團音的區別可以解決或是減少同音詞作理由，主張把尖團音分開。但是尖團音的區別到底能不能減少或是解決同音詞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根據實際的材料，不能憑空臆斷。為此我曾經作過一次統計<sup>②</sup>。在漢語同音詞裏面帶有  $\mu$ 、 $\epsilon$ 、 $\tau$  這一組聲母的同音詞一共有 524 組 1529 個，其中有尖音同音詞 636 個，佔總數的 42% 弱。這 524 組同音詞是不能夠用尖團音的區別來區分，可以劃分成六類：

第一類，這組同音詞裏面根本就沒有尖音，像：

$\mu i y$  枷家加夾甲假嫁駕價

$\mu i \epsilon$  知交知覺直覺直角指教至交

這一類的同音詞用尖團音的區別是不能夠解決的。這類的同音詞一共有 245 組。

第二類，這組同音詞裏面根本就沒有團音，像：

$\epsilon i \epsilon$  清唱情場清場

$\tau \epsilon \epsilon$  深情申請神情

$\epsilon i i$  青衣情意情義

$\tau i \epsilon i$  犀利西曆洗禮

這一類的同音詞用尖團音的區別是不能解決的。這類的同音詞一共有 181 組。

第三類，這組的同音詞在三個以上，只有一個尖音，其餘的都是團音，像：（右上角有 \* 的是尖音）

$\epsilon u \tau$  圈踴杈拳全\*効

$\tau i \tau \epsilon i$  掀起限期賢妻\*

$\tau i \epsilon \tau \epsilon \tau$  香灰香會相會\*

這一類的同音詞可以用尖團音來區別。區別的結果，每組裏減少一個同音詞。這類的同音詞一共有 8 組。

第四類，這組的同音詞在三個以上，只有一個團音，其餘的都是尖音，像：（在左上有 \* 的是團音）

$\tau i \epsilon i$  錫器習氣\*稀奇

$\epsilon i \tau \epsilon i$  槍斃牆壁\*強逼

$\mu i \epsilon$  枝節直接肢\*解

$\epsilon i \tau$  情勢請示\*輕視

這一類的同音詞可以用尖團音來區別。區別的結果，每組裏減少一個同音詞。這類的同音詞一共有 4 組。

第五類，這組的同音詞一共有兩個，一個是尖音，一個是團音，像：（右上角有 \* 的是尖音）

$\epsilon i \tau \tau$  牽線前\*線

$\epsilon i \epsilon i \epsilon$  輕油情\*由

$\tau \epsilon \epsilon i \epsilon$  城牆\*逞強

$\tau i \tau \epsilon$  吸收洗\*手

這一類的同音詞可以用尖團音來區別。區別的結果，每組可以減少兩個同音詞。這類的同音詞一共有 30 組。

第六類，這組的同音詞在四個以上，尖音的和團音的都在兩個以上，像：（右上角有 \* 的都是尖音）

$\epsilon i \tau \epsilon \tau$  機會級會集\*會際\*會

$\tau \mu i$  失計時計實際\*史績\*

市集\*世紀事蹟\*史記

這一類的同音詞雖然有尖團音的區別，但是用尖團音也只能把一組同音詞分化為兩組，這對於同音詞的解決沒有實際的價值。這類的同音詞一共有 36 組。

統計的結果是：利用尖團音的區別可以在 1529 個同音詞中解決 92 個同音詞（第三類的  $18 \times 1$  加第四類的  $14 \times 1$  加第五類的  $30 \times 2$ ），佔  $\mu$ 、 $\epsilon$ 、 $\tau$  組同音詞的 6% 強。

拼音文字的尖音寫法對於不會讀尖音字的人來說，是文字的一種特別寫法，要想學會只有死記。為了區別  $\mu \epsilon \tau$  組的百分之六（92 個）的同音詞，不得不死記住百分之四十二（637 個）的特別寫法的字；為了記住這百分之四十二的尖音字又不得不对非尖音的百分之五十八（882 個）的普通寫法的同音詞加以懷疑。這就等於說為了區別百分之六的同音詞，必須死記住百分之百的尖音寫法和團音寫法。這種解決同音詞的辦法不能算是一種明智的辦法。況且利用這種方法只能在字形上區別百分之六同音詞，還有百分之九十四的，就是還有 1437 個  $\mu \epsilon \tau$  組的同音詞仍然得用其他的辦法，像標注聲調，另用特別寫法等來加以解決。這樣區分尖團音的結果是只會增加拼音文字在學習和使用上的困難，而對於同音詞的解決是無濟於事的。

### 四 處理尖團音的原則和意見

文字是書寫語言的一套記號體系，理想的文字必須是同語言——語言的聲音密切相結合的。因此，漢語拼音文字的字形必須根據漢語的實際語音來拼寫。尖團音的分合是漢語語音的一部分，不能孤立地加以解決。根據這個，提出第一個原則：尖團音的處理必須用活語言的實際語音作根據。

② 統計的材料有：林迭肯的《國語拼音詞彙》，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的《語典》，陸志章的《北京話單音詞詞彙》等。

語言是在不斷的發展之中的，它的發展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來的，不是人們的意志所能安排得了的。語音的變化是語言發展的內容之一，語音的變化也不是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根據這個，提出第二個原則：尖團音的處理必須是合於語音變化的自然規律的。

拼音文字的擬製是爲了滿足人民大眾在文化上的需要的。因此它應該是爲人民大眾所易於接受的。根據這個，提出第三個原則：尖團音的處理必須是便利於人民大眾學習的。

拼音文字的同音詞是需要也是必須加以解決的，根據這個，提出第四個原則：尖團音的處理必須是便利於同音詞的解決的。

這四個原則如果可以成立，那麼尖團音的處理在原則上應該是：尖團音合併，如果確實有必要可以利用尖音作爲某幾個字的特別寫法。

所以要這樣作，首先是因爲這樣作是有着活生生的語言的實際的語音作爲根據的。漢民族的民族共同語是北方方言，北方方言的地點方言是北京方言，在北京方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北京話是漢民族的民族共通語。承認北京話是民族共通語並不否認北京話仍然要在發展的过程中吸收其他方言的優良成分來豐富自己。但是這種吸收只能是吸收其它方言的某些語詞，而決不能吸收其它方言的某些音素。事實上北京話在過去已經是在這樣發展着並且今後也仍然是要這樣繼續發展的。

(接43頁) 應該趕快定出一個規範來，在廣播、戲劇、學校等方面都要使用這個明確的規範。遺憾的是文化部和教育部對這個問題還沒有予以應有的注意。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對這個問題過去也沒有進行研究。今天特地召開座談會來听取各方面的意見，爲的是今後要想法來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大家想一想，還有哪些問題，應該提到語言研究所8月召開的學術會議上去討論。

是不是應該分“尖團音”這是確立標準音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南京、上海等地大多數人士認爲應該分，這個問題是應該好好考慮的。應該充分蒐集贊成分“尖團”和反對分“尖團”的意見，提到8月的會上去討論、解決。我們常說標準語以北京話爲基礎，這只是假定的用語。標準語和標準音是有區別的，標準音是以政治上文化上先進的地方的語音爲基礎的，也就是以首都北京的語音爲基礎；標準語應該以北方的普通話即官話爲基礎，它比北京話要廣泛得多。漢語標準語的語法、詞彙應該拿官話方言作基礎。漢語各方言在語法上的差別很少，在詞彙上的差別也不大。漢語標準語雖然以北方官話爲基礎，但是還要吸收外地的詞彙。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就說過：“第一，要向人民羣衆學習語言。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第二，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適用的東西。……例如今天開的幹部大會，這‘幹部’兩個字，就是從外國學來的。我們還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用語。第三，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語彙和典故，這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東西還是應該繼承。”（《毛澤東選集》，838頁）。標準語雖然是一個方言作基礎的，但是它比任何一個方言

其次，尖團音的合併並不影響語言的了解，這要舉出一件事情來就可以証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國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時間所使用的語言沒有尖團音的區別的北京話（這北京話稱得上是漢民族的民族共通語或標準語，如果有人懷疑說這個還是標準的，那麼在漢語裏沒辦法找到標準語了），但並沒有影響到誰的了解。不分尖團音的人聽起來能解是很自然的，但是也從來沒有聽見過能區分尖團的人對廣播的不分別尖團音提出過不同的意見。

尖團音的合併是便利於人民大眾的學習的，非尖音區的人學習尖音是非常困難的，而尖音區的人不尖音却是比較容易的。非尖音區的人學習尖音要一音節一個音節地死記，一個語詞一個語詞地死記。音節38個，組成語詞可以多得成千上萬，要想完全住，不是很簡單的事情。但是要尖音區的人不拼尖音是一句話：把尖音也都寫成團音。兩者難易的比較很顯然的。

尖音因爲在歷史上的確是漢語裏曾經有過的，因此在確實有必要的時候用它給某幾個字作一特別寫法是可以的。漢語裏的同音詞，在用聲調加區別之後，還會剩下爲數不多的同音詞，這時候就以利用尖音來給這些同音詞作特別寫法，來加以解決的。因爲利用尖音的音節數目是非常少的，所以不誤會這是尖團音的全分或半分。

都豐富，修辭手段比任何一個方言要來得多。高爾基曾經說過：“標準語是人民的語言，是經過語言巨匠加工的語言。以人民的語言爲基礎，並且經過文學的加工，經過歷史的磨鍊。它比口語要豐富得多，比口語更具有表現力。”

現在有些人對標準語的意義還不明白，我們應該召開會輿論進行宣傳，在各種報紙期刊上發表文章，使大家了解標準語的重要意義。戲劇演員對語音規範化有很大的作用。蘇聯的小劇院和藝術劇院的語音是全國人民學習標準音的範，其它國家也一樣。爲什麼我們的戲劇工作者和電影工作者還沒有提出語言規範這個問題來呢？各地人都要求學習北京話，但還缺少參考讀物，例如剛才電影工作者提出來的音對照表。語言研究所可以組織上海、廣州等地的同志進行這項編寫工作。舉辦通俗的講座，宣傳標準語的重要，也很必需的。俄語方言差別不大，但給教師編了不少小冊子讓他們能更好的掌握標準語的規範來進行教學。我們也應該這樣做。中小學教師還應當與學生的家長們聯繫，使他們了解標準語的意義，而且讓家長們也幫助推行。

剛才大家所說的許多問題，全都應該解決。不能認爲快的就解決了，但是也不能拖延。這個問題解決得越快，中國的文化就會發展得越快。

文字改革與建立標準語有很大關係，也應該刻不容緩地進行這項工作。因爲如果拖延下去，對全國人民更進一步團結，對人民文化的發展會有很大的妨礙。

以上談的都是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方言成分，方言標準語，文學作品中方言的使用和翻譯等等問題也很重要，不過時間已經不早了，有機會再談吧。我希望語言研究所經常召開這樣的座談會。

最後我還要說一句，進行建立統一的標準語的工作是大家都來做的，語言研究所要多做些組織工作。



# 不应当歪曲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任 言 信

編者按：本刊第36期發表了李仁先生的《拼音文字必須有類符》一文，該文作者的正面主張是拼音形聲字，作為他理論根據的是漢語是單音節語（關於對漢語是單音節語理論的批判請參考本刊第11期《漢語是不是單音節語》，第35期《單音節語問題的實質》等文）。以此作為理由，他批評了拉丁化新文字。但是作者對拉丁化的介紹或了解並不合乎事實。我們考慮到這種不合乎事實的看法，也許有它的一定的代表性，所以發表出來，請大家討論。這裏我們發表了任言信先生的文章，對拉丁化新文字作了一些介紹，並且指出了上述文章中不妥的說法。

《中國語文》第36期登載的《拼音文字必須有類符》一篇文章，對於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肆意曲解和污蔑。此地我向讀者們說明幾點事實。

首先，我要向讀者們說明歷史事實。在最近四十年中，對於中國文化有貢獻的拼音方案只有三種，即拼音字母、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在最近二十五年中，拼音文字成為一個羣衆性的運動並在人民解放鬥爭中發生一定作用的就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解放以來六年之中，拼音文字對於文化建設較有貢獻的也就是拉丁化新文字，它在鐵路電報以及其他種種重要技術上都獲得了一定的成就。今天，拉丁化新文字擁有相當多的實際使用者。當然，拉丁化新文字並不是完全成熟的，它還有缺點需要研究改進，並不是國家規定的正式文字，這都是事實。但是，拉丁化新文字說成幼稚不堪、一文不值、“行不通”、“失敗”了，這都完全不是事實。到今天為止，除了拉丁化新文字之外，還沒有另一種拼音文字做着規模的實驗，將來拼音文字不論採用拉丁字母與否，拉丁化新文字的實踐總是未來正式拼音文字的初基礎。我們知道，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先烈瞿秋白和他的革命同志們在研究改進過去歷史上各種拉丁化方案以後擬訂出來的。這個方案雖然還應當進一步研究改進，可是歪曲事實加以攻擊是不應當的。

下面，讓我們看看《拼音文字必須有類符》一文是怎樣曲解和污蔑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

第一，該文作者給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戴上第一頂帽子：“犯了無政府主義的錯誤”。他說，在拉丁化新文字中，“一個意義可以有許多形式的字，如‘是的’一

詞可以有 shd, shdi, sdi, sgo, sgei, snei, sge; ‘什麼’一詞可以有 shmo, mage, maga, osh, os, najang, sma, simo, zage, zago, moz … 等等的形式”。

拉丁化新文字真是這樣寫的麼？懂得拉丁化新文字的人們不在少數。有誰把“是的”或“什麼”任意寫成這許多形式呢？拉丁化新文字的寫法，在二十五年之中是在不斷研究改進着的，但是決不是可以亂寫成各種樣子。“是的”原來寫成 shdi，後來改成 shde，又有人試驗簡化為 shd，可是並沒有人寫成其他各種樣子。“什麼”寫成 shemo，有人寫 sheme，可是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寫法。該文作者舉了十一種“什麼”的寫法，可是其中一種正確的寫法也沒有舉出，這不是有意混亂視聽是什麼？

一種拼音文字在“正字法”未完全肯定以前，有一些詞兒寫法須要研究修改，這是常有的事。俄文在十月革命後經過一度較大的“新正字法”的修改，到現在還在年年討論正字法問題。一種文字進行正字法的研究，這說明它是在不斷生長和完善。這是好事情，不是壞事情。拉丁化新文字只有正字法的修正，並沒有一個詞兒隨便亂寫的事情，而且在研究修正中的詞兒的拼法也只有極少幾個。

該文中舉出的這些例子也許是由“方言拉丁化”的假定推出來的。但是即使是方言拉丁化，同一體系還是只有同一的寫法，決計不能雜湊。雜湊的寫法是該文作者自己捏造的。

該文又說，拉丁化新文字“一個字可以有許多的意義，如‘ba’可以有‘把、巴……’，‘sh’可以有‘是、

屍……’等”。關於解決同音詞問題，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者正在研究運用語言中固有的條件和合乎現代語言科學的方法擬訂分化和定型的辦法（參看《中國語文》和《語文知識》許多研究文章）。同音詞是任何語言中都有的現象，方塊漢字也有很多字是同音詞。方塊漢字當中還有許多現代漢語已經不用的字，這也不可跟現代漢語當中活着的字混爲一談。可是該文作者竟把語言中的同音詞現象說成是拉丁化新文字的“無政府主義”，把拉丁化新文字稱爲“沒有固定性的無政府主義的文字”！

第二，該文作者給拉丁化新文字戴上第二頂帽子：“犯了極端民主化的錯誤”。他攻擊的是方言文字的主張。他說：“……實行方言文字，即廣東一區就辦不到”。“所謂廣東話，並不止廣州白話一種，還有客家話、潮汕話等等。”“以廣州話爲標準呢，還是以其他地方的話爲標準？以廣州話爲標準，便對其他各區人民沒有講民主，若以其他各區的話爲標準，則結果更壞。”

過去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者曾主張各大方言區要以其政治經濟中心的語言爲基礎，擬訂方言拼音文字方案，並以北方話拼音文字作爲全民族的共同文字。近幾年來的研究結果，認爲漢民族只應當有一種全民族的通用文字，方音符号只用來作爲特殊場合（如地方戲台詞等）記錄方言之用，以及作爲方言區人民學習全民族通用文字時候的教學工具。

應當說明，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者曾主張方言文字，可是並沒有反對全民族的共同文字，正相反，他們是一向主張以“北拉”作爲全民族共同的拼音文字的雛形的。他們曾主張方言文字以一個中心地點爲基礎，批判了一縣一種文字的主張，並沒有“極端民主地”主張以任何地點的語言代表全區。所謂“方言區”也有它的一定科學意義，並不是“廣東話”中可以包括客家話和潮汕話在內。看來該文作者並不了解廣東話的“廣東”和廣東省的“廣東”是含義不同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者的主張近幾年來發展成爲主張只有一種全民族的共同文字，在這上面有條件地運用方音拼寫。一種新興的文化運動的主張必然要逐步修正與改進。我們應當歡迎他們的修正與改進，不應當抓住他們現在已經放棄了的過時的主張，而且錯誤地歪曲地解釋這些過時的主張，加以漫罵和攻擊。

第三，該文作者給拉丁化新文字戴上第三頂帽子：“犯了空想主義的錯誤”。他說，拉丁化新文字沒有“從實際出發”是經不起“實踐的考驗”的。這真是閉着眼睛罵人。只要舉一個例：東北全區鐵路電報都應用拉丁化新文字，這是不是從實際出發？由於鐵路電報

在東北試用的成功，現在正在研究如何擴大推行，這是不是經得起實踐的考驗？

該文作者又說，“他們的原則，依我看來，一共有三個：（一）要能夠卻又只能寫口頭語；（二）文字裏不許用不發音的字母；（三）文字的一個字母，只許代表一個音，一個音只能用一個字母來代表。”該文作者根據他的“看來”，給拉丁化新文字下了結論：“總之，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則，都是空想的，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拉丁化新文字要求能夠寫口語，可是誰說過“又要只能寫口頭語”？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者不是還在討論如何吸收文言詞兒以豐富現代的語彙麼？拉丁化新文字要求文字以表音爲原則，可是誰說過“不許用不發音的字母”？拉丁化新文字不是把“再”寫成 zaai，當中有一個 a 不發音麼？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者不是還在公開討論運用不發音的字母或符號表示聲調或其他語言條件以分化同音詞麼？當然，不發音的字母只可以在必要的場合下應用。拉丁化新文字要求在可能情形下一母一音、一音一母，可是誰說過“只許”兩字的？拉丁化新文字不是用 g、k、x 變讀爲 и、к、т 麼？不是用 e 表示 э 和 ы 麼？正相反，拉丁化新文字是反對過分拘泥“一母一音”原則的。這究竟是誰在“空想”？而且，把拉丁化新文字說成建立在這樣三個原則上面，是完全莫名其妙的說法。

除了上面三頂大帽子以外，該文作者還給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扣上另外三頂帽子：一、基本理論不健全，二、不能繼承既有的文獻，三、犯了窒息語言的錯誤。這三頂帽子下面蓋着的是同樣歪曲和武斷的語言。爲了珍惜篇幅，我暫且放下不談了。

該文作者說，他一、“檢查了過去新文字運動失敗的原因”，二、“研究了許多現代文獻”，三、“研究了現有知識分子的客觀情況和他們使用文字的習慣”，四、“研究了漢語詞彙中詞類的構成”，五、“研究了包含約七千字的字典”，六、考查了俄、英、法的文字拼法”，七、“研究了南北方言”，八、“比較了各種區別同音詞的方法”，九、“比較了絕對詞兒連寫與相對詞兒連寫兩種方案的優劣”，十、研究了文字改革的政治路線……”！好大的口氣！他“研究出來的是什麼呢？就是把我們的一切語詞分爲“蟲豸類”，“言談心情類”等等十七類，每類後面加上一個拉丁字母（有兩類例外），例如“蚤”寫成 cane，“愁”寫成 chou。這樣一種別人早已談過並早已拋棄掉的东西，就是該文作者的“偉大創造”。怪不得我們的成語裏有這樣一句話：“大言不慚”！



# 僮族文字同僮語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問題\*

謝爾久琴柯教授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蘇聯顧問)

今天有机会同大家談論一個重要的和文化有密切關係的問題——僮族文字的問題，我感到很高興。這是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問題，要作周密的考慮，細緻的研究。在一次座談會上是不能很好地解決所有的問題的，所以，今天我主要只談幾個比較重大的問題。這些問題昨天同志們都熱烈地談論過。現在我來談一談按照馬克思主義論點應該怎樣製定文字，推行文字，使文字很快地成為提高文化的有力工具。

在談這些問題之前，我先談一談僮語的一些情況，也談一談方言劃分的問題。我在北京的時候，看了一些不完整的材料，也和同志們交談過。初步印象是：南部和北部的方言差別很大，南部的人和北部的人不能通話。所以當時我想，可能要製定兩種文字。到了這裏以後，進一步了解了一些情況，和袁家驊教授談了話，我就沒有製定兩種文字的想法了。但是方言的劃分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在這裏我們應該想到斯大林同志關於方言的論點。斯大林同志在給桑席葉同志的回信中很明確地指出了地方方言的特點。他的論點應該作為我們劃分僮語方言的根據。斯大林同志在那封覆信裏說：“‘階級’習慣語，正確些說，應當作為同行語，並非替人民羣衆服務，而是替狹小的社會上層分子服務。此外，它們沒有自己本身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因此，它們無論如何不能發展成為獨立的語言。相反地，地方（‘地域’）方言，是替人民羣衆服務，並且有自己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因此，這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過程中可以成為民族語言底基礎並發展為獨立的民族語言”（《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43頁）。這樣看來，方言的特點，是由它的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決定的。一個方言所以區別於其他方言就在於它們在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上各有自己的一些特點。有了這些特點，所以劃分為不同的方言。在民族形成過程中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及基本詞彙的方言才可能成為獨立的語言。

談到民族，我們知道，有些民族（нация）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有些人羣（народ）[這兒指我國中國所用的廣義的“民族”——譯者註]在殖民地的條件下沒有也不能發展成為民族。我們這裏說的民族

（нация）是指資產階級的民族和社會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形成的，社會主義的民族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形成的，在其他條件下形成的則是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有些人羣在殖民地的條件下沒有機會形成為民族，只有在社會主義時期才形成為民族。他們在社會主義時期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有了發展的條件，有了發展的保證，這樣就逐漸地形成為民族。

我們現在來為僮族創製文字，正是為了給僮族很快地發展成為新的類型的民族，即社會主義的民族，創製有利的工具。現在，在解放以後，所有的條件都具備了，僮族有發展成為一個新型的民族的一切保證了。為僮族建立統一的民族標準語和創製文字是促成僮族形成新型的民族的有力因素之一。

在昨天的座談會上，僮族的知識分子，在座的為僮族創製文字的工作同志，指出僮族是一個統一的民族，應該創造一種文字，這一點意見是一致的。關於方言的劃分，大家的意見是把僮語分成八個方言區，這八個方言區又歸併成南北兩個大方言區。從語法結構方面說，南北的差別不大；從基本詞彙方面說，北部各方言內部大体上是一致的，南部各方言內部大体上也是一致的，南部和北部可就有些差別。從語音方面說，南北一共可以細分為八個方言區。大家的意思是這樣。不過根據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地方方言有自己的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的論點，僮族的方言只能分成南部和北部兩個方言。劃分方言要從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上去看，光從語音上去劃分是不合適的。比如柳江有三十七個聲母，有許多圓唇音和顎化音，來賓有帶喉塞聲的鼻音和 kʰ, pʰ 等一套帶 ʰ 的聲母，武鳴也有它的語音特點，但這些語音差別，只是方言內部的差別。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的差別在於詞彙，而不在於語音。所以我們把僮族語言劃分成兩個方言是合理的。

\* 譯者按：本篇是1955年4月29日蘇聯顧問謝爾久琴柯教授在桂西僮文研究指導委員會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最近由口譯者把原記錄向謝爾久琴柯教授重述了一遍，他在個別地方又作了一些訂正補充。

我們要爲僮族創造文字，就得選擇一個基礎方言，只能說選擇南部方言或北部方言做基礎，而不是選擇某一地點的土語做基礎。過去我們在蘇聯爲各少數民族創造文字都是以方言做基礎。漢語也是以北部方言爲基礎，而不是以北京土語爲基礎的。俄語也是這樣，它是以中部方言爲基礎的。意大利語以塔斯干地區的方言爲基礎，法語以法蘭西島（Île-de-France）地區的方言爲基礎，也都不是以很小的土語做基礎，而是以方言做基礎的。在爲僮族制定文字的問題上，我們要用北部方言做基礎，不用南部方言做基礎。至於語音，那只是標準語中的個別部分問題，這比標準語的問題小得多，後面還要討論。關於選擇基礎方言，有人談到來賓，說是那裏有一個礦廠，有發展前途，可以作爲基礎方言。但是我們不能以經濟條件作爲選擇標準語的唯一依據。如果這樣，就有點像馬爾把語言當作基礎的上層建築一樣，可是語言不是上層建築，它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單從經濟觀點來看，就是把它當作上層建築了。斯大林同志說，我們的文化，按其內容是社會主義的，按其形式是民族的，這就是說按其語言是民族的。民族語言是民族文化的表現形式，文化越高，語言就越豐富。所以我們在解決語言問題的時候，要考慮的主要是文化、政治條件，而經濟條件不是直接規定語言發展的。因爲語言是文化的民族形式，如果把礦廠作爲條件，作爲根據，就不對了。一個礦廠是不能起什麼作用的。來賓附近雖然有一個礦廠，但工人可能大多數是文盲，他們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起不了什麼大作用。根據材料，那個地方的經濟並不大發達，也沒有什麼發展前途，所以把礦廠作爲唯一條件來解決基礎方言問題，不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至於標準音和標準音的規則，那是個正音法的問題，就應該選擇一個中心的城市，政治、文化都是先進的，對其他地方有影響的。所以我們要在僮族自治區找一個文化高，政治經濟有發展前途的地點，拿它的語音做基礎方言標準音的依據才是合適的。這樣的地點在什麼地方呢？我說，在南寧附近，因爲南寧附近是文化、政治集中的地方，是一個中心的地點，能夠對其他地區有很大的影響，其他地方的人民和它有較多的聯繫。

我們知道漢語的標準音是以文化、政治中心北京的語音爲依據的，我們以它爲依據，就因爲它的文化高，在漢族政治文化的發展上，過去和現在都有很大的作用。莫斯科音被採用作爲俄語的標準音，也是因爲同樣的理由。雖然列寧格勒過去曾經有二百多年做

過首都，並且也是很大的經濟中心，但標準音還是以文化中心在文化上有特殊作用的莫斯科爲準，因爲它可以把這高度的文化普遍到全國去。總之，標準音主要應該考慮到文化條件，要考慮那個地點是不是文化中心。

我們僮族的標準音選哪裏好呢？我說，應該在南寧附近，文化比較高的地方，這地方也正是僮族的心，關於這點大家比我知道得清楚，可以自己去看想一想。

我們討論到標準音的時候，應該從教育學上的價值來考慮。在北部方言區內有幾個土語（тобод），要從教育觀點上去看，哪一個土語最容易學。比如柳江有37個聲母，有許多圓唇音和顎化音等等，這是其他方言區所沒有或很少的。來賓有許多喉塞鼻音，有pʰ, kʰ等一套音，看來這是古老的成分，這一套音在北部，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失掉了。田東、百色聲母簡化了，也是跟其他地區不同的。從教育學上的價值來看，中心地點的語音是比較合適的。但我得說，這和我個人利益沒有關係，我既不是武鳴人，也不是來賓人，或龍津人，我是從原則來考慮問題的。（蘇聯顧問說到這裏時，他自己笑了，大家也笑了。）

我們知道，解放前廣西省政府設在桂林，後來搬到南寧來了，就因爲它地點適中，交通方便，能聯繫各方面。此外中心地點有很多學校，培養着大量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由於社會的需要，中心地區中現在沒有鐵路的地點，比方武鳴吧，將來也會有的。這些條件決定了標準音應以中心地點爲準。請注意，我說的是標準音，並不是基礎方言。昨天覃應机主席說到中心地點在經濟上的作用，有發展的前途。

下面談談張均如同志昨天談的問題。她打了一個比方，她說，武鳴話好像一個小孩兒，像它的父親又像它的母親。這個比方很好。假如把北部方言比做父親，把南部方言比做母親，那末，也許它多像父親一些，像母親的成分少一點，也許還像它的姑姑，舅舅（西部土語等等）哩！

我們現在就是要選擇一個自然造成的能聯繫各方面的中心地點作爲標準。在規定標準音時，不是從數字方面來看的，比方說使用那個土語的人有多少等。這樣的數字有時候可以照顧，但也不是非照顧不可的。選擇基礎方言一定在北部，因爲它有四百多萬人口，而南部只有二百多萬人。但談到標準音的時候，不見得應該這樣看。北部有幾個土語，它們的語音不一致，我們只應該選擇一個。在這裏有些同志說選擇一個作標準，同時照顧到其他土語。那是不可能的，那



只能造成一種混亂現象。過去我們蘇聯有人那樣做，但是都沒有做到，都失敗了。我們有很多僮族兄弟都會講漢語，漢語的標準音假如也要照顧廣東話，福話……等等，根本是不可想像的，是一定沒有結果的。我們的語音應該是以一個地點為標準，這個地點該在文化上是比較先進的地點，在政治上、文化上起作用的地點。

僮語以中心地點的語音作標準音，如果又要照顧柳江的圓唇，顎化聲母，來賓的喉塞鼻音，以及百的特點等等，那一定不能成功的。我們所選的不是任何一個地區的語音，也不是一個很小地方的語音，應該是一個中心地點的語音。俄語以首都莫斯科音為標準音，漢語以北京音為標準音，僮語也要以一個中心地點的音作標準音才合適。

下面我想分別談一下大家提到的三個問題：（一）語的“純粹性”和“一致性”的問題；（二）怎樣照顧南的方言；（三）怎樣創製我們的文字，推行我們的字。

我們先談一談土語的“純粹性”和“一致性”的問題。我們知道，語言是交際的工具，它跟人民的歷史密切的關係，語言根據內部發展規律起變化，同時由於它的使用者經常跟外界接觸交往的結果，也起變化。因此，詞彙不是很整齊的。比如俄語裏邊有許多別的語言的成分，因為它和突厥、蒙古諸族交往，所以就吸收了它們語言的成分，俄語 башмак（毛製頭巾），башмак（靴子）就是从突厥語來的借詞……，俄語也吸收了許多西歐的語言成分，吸收了喀爾芬蘭語系的語詞，吸收了高加索山區民族的語詞，韃靼語詞等等。有時候這種相互影響也發生在語法方面，我的故鄉羅斯托夫城附近的一個村子，由於近突厥族，過去常把 молодец（小伙子）說成 молодес，отец（父親）說成 отес。突厥語過去沒有 ц 音，所以 отец 成了 отес，現在由於俄語借入大量詞彙，如 ЦК（中央委員會）центр（中央）конституция（憲法）революция（革命）……已經有 ц 這個音了。這說明語言的相互影響，詞彙、語音，有時甚至語法都能有影響。特別在詞彙方面，影響更大。

我們知道，要找一個很整齊、一致、純粹的土語是很困難的。隨着文化的發展，語言的內部規律也在不斷地豐富發展。跟其他的地方頻繁交往，可以促進語言的發展變化。漢語就是這樣，它是根據自己發展內部規律不斷發展豐富起來的，而它跟其他語言的相互影響也促進了它的變化。僮語也是這樣，它吸收一些漢語成分，甚至於吸收一些越南、孟高棉語的

成分。詞彙互相影響，互相發生作用是很自然的現象。就是語音方面，也有互相影響的現象。所以我們找不到也不需要找一個很“整齊”“一致”“純粹”的語言。

語言是經常地發展，不斷地改進，完善着的。斯大林同志說過，基本詞彙是比較穩固的，語法結構還更穩固些，發展最快的是詞彙。這裏說到語法和基本詞彙的穩固性，不是說它不變化，只是說比起一般詞彙來，語法和基本詞彙變化得較慢。斯大林同志說：“語言的文法構造比語言的基本詞彙變化得更慢。文法構造是千百年來形成的，它在語言中已是根深蒂固，所以它的變化要比基本詞彙更慢。它當然逐漸發生變化，它逐漸改進着，改良和改正自己的規則，用新的規則充實起來”。（《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23頁）。所謂語言的“一致性”“純粹性”應該這樣解釋：某一個地方的語言比較“一致”、“整齊”、“純粹”，是因為那裏的人和外部的生活脫節了。我和袁教授等談過，以僮族地區來說，語言最“純粹”的地方可能是最偏僻的角落或山地，那裏的人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區裏，和外界的接觸較少，受外界影響小，語言中保持了一些古老的东西，因而比較“一致”、“整齊”、“純粹”。至於一個中心地點，那裏交通發達，和外面的人交往多，關係密，要求語言“一致”、“整齊”、“純粹”是不可能的。有時候在一個村莊中，他們的語言比較“一致”、“整齊”、“純粹”是有的，但那不是我們所要找的。

我們知道民族是發展的，民族語言也是發展的，生活中經常有新東西出現，這些新的概念就加進了語言中去，成了它的成分。蘇聯過去有些民族主義者，強調語言的“純粹、一致”，排斥外來的成分，也就是排斥先進的影響，拒絕常常是通過新詞彙表現出來的蘇維埃的影響，這顯然是錯誤的。

過去蘇聯在選擇別洛露西亞語基礎方言時，有些民族主義者提議要選最純粹的呼達羅夫話作為基礎方言。呼達羅夫是一個小村莊，它跟別洛露西亞的文化發展沒有多少關係。在那個小村莊中，從前是住的地主、富農，跟文化教育沒有什麼接觸，他們的語言保持了很多的古老的东西。那些民族主義者要把它選為基礎方言，他們的理論是：借用外來的語言，就影響了自己語言的“整齊”、“一致”和“純潔”。但我們知道，在社會主義時期，新的概念不斷地產生，那些新概念要用新詞彙來表達，俄羅斯先進的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所創造所使用的新詞彙是一定要傳到其他語言裏去的。我們知道，那些民族主義者提出的語言“純粹性”的理論決不是我們所需要的理論，他們是企圖把別

洛露西亞人和俄羅斯人隔開的。事實上那些新的概念、新的借詞只能使別洛露西亞的語言更豐富更發展，不會對它發生不好的影響。

這是蘇聯過去所發生的情況。我在北京的時候，看過俄譯本的《毛澤東選集》，我記得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那篇文章中曾提到反對“宗派主義”反對“形式主義”。在對待新詞概念上，我們是不應該有宗派主義、形式主義的思想的。毛主席曾指示說：首先“要向人民羣衆學習語言。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同時，“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份。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適用的東西。因為中國原有語彙不夠用，現在我們的語彙中就有許多是從外國吸收來的，例如今天開的幹部大會，這“幹部”兩個字，就是從外國學來的。我們還要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用語”。（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二版 838 頁）。這樣看來，毛主席曾經指示過必要的時候可以借用外國語，來豐富漢語的詞彙。借詞對我們並沒有什麼壞影響，它只會使我們的語言更豐富。聯繫我們的實際情況來說，不應該怕我們的語言裏有許多借詞，也不應該強調語言的純粹性。

再舉一個例子來談談。談到給中國少數民族語言選擇基礎方言問題時，有人提到應該找一個很少受其他語言（主要是漢語）影響的地方的話做基礎方言。那些人以為，如果受了其他語言如漢語的影響，就要失去少數民族語言的特點，就違反了或者影響到少數民族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因此他們提出要選一個離漢語越遠越好的地方作為基礎方言。我們知道，从古到今，漢族的文化一直是比較高的，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許多新概念。這些是應該吸收的，吸收了並沒有什麼可怕。吸收了這些成分，這些少數民族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還是保留着的。忘記了特別是通過借詞才經常使語言豐富和發展，而要找一個很“純粹、一致”的語言，是錯誤的，其政治後果一定是不好的。

我們要選擇北部方言作為基礎方言，它的標準音就要選擇文化上最先進的地點，要選擇中心地點，這樣才能夠影響其他地區。但要選擇中心地點，語言就不能夠很“純粹”，它跟其他地區交往多，彼此影響多，自然是不可能“純粹”的。反過來說，語言“純粹”的地方倒多半是文化經濟生活跟其他地區脫節的，人民的生活比較孤立的，最偏僻的地方，文化發展上最落後的地方。

現在談一談如何照顧南部方言的問題。

僮族是一個統一的民族，一定要創造一種統一文字，在這方面同志們談了很多。同時也談到統一標準語對文化發展，民族發展是一個有力的工具，是很正確的。是的，應該創造一種文字，使它對僮文化的發展起很大的作用。我們的文字應該是統一的，是所有的人共同學習和使用的。我們絕不能因字問題而使南北部方言區分裂開來。南部方言有兩萬多人口，它有它自己語言的特點，這和北部方言不同的；比如它有送氣音，還有其他的特點，我們該想辦法去照顧。越南也有一民族使用跟僮族語言似的語言，他們也有送氣音。在創造文字的時候，好也能考慮到照顧他們。當然這個問題要由他們自己去解決，我們能做到對他們有所幫助的話，那就好。要照顧南部方言，照顧的辦法也很簡單。比如字母表上加一些符號來表示南部方言的特點。蘇聯有這樣的經驗，我給“阿巴津”語〔高加索的一個少數民族語言——譯者註〕創造文字的時候就是這樣的。阿巴津語分為兩個方言，其中人數少的一個方言，音的特點是有雙唇顫抖的  $br[\psi]$  等三個音，因此加了三個符號。文字是一種，在字母表的前部是大一致的字母，只是在字母表後面在括号內加上少數音特有的音符。課本是編寫統一的一種，在課本內加上一些補充，大致每冊有三四頁補充頁。大家都用這同一課本，但其中方言差異的地方要加以說明，方言跟標準音對照一下。小學生在一二年級的時候要使用這種加補充的課本，到三年級的時候，這種補充就很少了。小學畢業（四年）以後，就沒有什麼補充了。所加的補充是這樣的：要說明某字某音在本地裏是什麼，在標準語裏是什麼，給他們有個對照，就方便了。前面是標準音，後面括号內是本地音，這樣照顧，使得兩個方言區的人民都滿意。學習的時候，一方面學習帶補充的東西，同時要熟悉標準語規範。到了三年級以後，這些補充就很少或者沒了，以後就只用一種標準語了。所以能夠這樣，是很簡單的，經過學習，他們已能掌握標準規範，因此不用補充了。最初的時候，這樣照顧是必要的，雖然，他們一看跟自己的語言不同，他們就不滿意。

在語音上，可以這樣的照顧，就是加幾個符號。詞彙有差別的也可以這樣照顧，前面的是標準詞彙，後面加上括号的是地方的詞彙。這樣，前面懂，一看後面就懂了。或者是製定一個詞彙對照表，在後面，某個詞在前面讀不懂的，有了表一查就懂了。語法上的差別也是有的。如阿巴津語的“我走



т, 方言說 спойт, 可以寫成 сцит(спойт)。到了中  
根本就不用補充了。那時只用統一的標準語。

通過學校的教學和普遍流行的印刷品, 經過幾年  
後, 就可以完全過渡到一種標準語去, 根本不用補充  
。阿巴津的文字現在就只有一種統一的文字, 取消  
那三個補充符號。他們的方言差別是不是不大呢?  
能比僮語還要大些, 他們還有語法上的差別, 但都  
著起了變化, 統一成一種規範的文字了。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談一談, 那就是第三個問  
——怎樣準備推行文字?

我們對僮族語言文字, 已經做了很多工作。現在  
該準備很快地把這種文字推行到學校裏去, 使用在  
出版物上。人民也很迫切地要求這種文字快點出來,  
此, 我們得加緊工作, 使它早日實現。在語音、詞  
語法方面, 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 可以根據這  
材料來決定問題了。但是有些同志說: “我們的詞  
不一致”。其實詞彙不一致並不是什麼毛病, 它只不  
是表示我們表情達意的手段有許多同義的詞罷了。

如科學術語(如生物學、數學以及其他各部門科學  
的術語)方面可能就沒有矛盾, 所以問題不在我們  
在有許多同義詞(各地詞彙不一致); 倒是在於我們  
術語還很少。例如蘇聯創造阿巴津語的文字時, 兩  
方言中表示“蛇”的詞有兩個, 我們認為是方言的差  
別, 後來發現其中一個是“毒蛇”, 一個是“無毒蛇”,  
義並不完全相同。所以凡是遇到這種情形, 最初我  
可能感到有些麻煩, 某一個詞, 可能本地沒有, 對  
不了解, 但沒有關係, 過幾年就沒問題了。編寫課  
時, 詞彙方面可能還會發生恐慌, 感到不夠用, 那  
還得找一些老年人來問問, 是不是還有別的說法, 尤  
是在編寫像動物學、植物學的課本時, 更會感到詞  
不夠。有一種突厥語, “鳥”字有三個: куш, карма  
чпочик。開始時我們沒有問清楚, 以為是詞彙的  
別, 以後發現第一個表示大鳥, 第二個是不大不小  
鳥, 最後一個是小鳥。所以詞彙多, 只能使標準語  
豐富。要知道每個地方總有它的特點, 這方面不必  
心。

一般說來, 標準語的詞彙都比方言詞彙豐富, 假  
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 它的詞彙就不單是北部的  
彙, 它一定還要吸收各地的詞彙, 吸收南方方言的  
彙, 以至於吸收個別作家作品中的成分, 個別文  
政治活動家的詞彙, 還要从其他語言借用一些詞  
。所以我們說, 方言間的詞彙有些差別, 並不是缺  
。反而是它的優點, 可以利用它們來表示許多不同  
的概念。學習標準語, 開頭幾年會有一些困難, 有

不了解的地方, 但過一些時候, 通過教育, 宣傳, 出  
版物的傳播, 大家都學習, 閱讀, 就可以了解。這  
是一個規律, 用不着擔心。

現在我們就應該準備一切條件來推行我們的文  
字, 在這些工作中, 語言研究所應該做些什麼工  
作呢? 語言研究所過去做了許多工作, 它對僮語研究工  
作有許多貢獻, 有很多對工作有幫助的經驗, 這都很  
好。以後應該繼續方言的調查研究, 找出各個方言的  
特點, 寫出方言綱要, 供給教師和幹部作參考。另外  
語言研究所還要配合僮文研究委員會收集更多的詞  
彙, 編纂詞典、語法綱要, 給教師、幹部參考。

僮文研究委員會要組織各方面的力量, 準備推行  
文字, 它要同民族事務委員會、教育廳, 以及有關各  
級人民政府經常聯繫, 去研究怎樣準備條件做推行工  
作, 還要和文化機構、電台、出版機構聯繫, 做好推  
行文字的準備工作。

教育廳則應和教育部聯繫, 研究怎樣着手共同編  
輯各科課本和教學參考書, 供給教學和學習的人使  
用, 同時要培養教師。

所有這些工作, 現在我們就應該着手進行, 如果  
等到方案批准之後才去着手進行, 那就失掉了很多時  
間, 所以現在就應該開始做。我們僮文的一切基本問  
題, 都已經清楚了。因此, 可以根據現有的材料製定  
方案, 培養教師、幹部, 進行一切準備工作。僮族的  
知識分子很多, 我們的工作不是很困難的。蘇聯在創  
造文字的時候, 人才沒有這麼多, 當時假如有這麼多  
的人才, 就不會感到那麼多的困難了。各位對僮族文  
字工作是熱愛的, 積極的, 可見我們的問題容易解  
決。但是有一點要注意, 就是要防止本位主義, 比如  
在基礎方言問題上, 來賓人要選擇來賓話, 武鳴人要  
選擇武鳴話, 龍津人要選擇龍津話等等, 要防止這種  
情形的發生。我們要從國家的利益, 整個民族利益來  
看問題, 不要從個人的得失去考慮問題, 要拿出所有  
的力量來促使僮文快快推行起來。

僮族語言是屬於漢藏語系漢傣語族的一個語言,  
僮文是其中第一個新創的拼音文字, 它對其他民族有  
很大的影響, 對漢字改革也有幫助, 就這方面來說,  
僮族同志應該是很自豪的, 我衷心預祝僮文的成功。  
(全體熱烈的鼓掌)。

請容許我再說一句, 現在我們的條件, 我們的準  
備工作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應該想盡一切辦法, 使這  
套文字在明年(1956年)10月1日能夠推行。

(劉湧泉口譯, 施政記錄)

# 关于汉语有没有词类的讨论

本刊编辑部

本刊展开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是从1953年10月开始的。到1954年8月以后，双方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参加这个讨论的，不但有国内的语言学家，而且也有苏联的语言学家；不但有年老的语言学家，而且也有全国各地的年青的语文工作者。应该指出，苏联穆德洛夫同志的参加，对于我们的争论的展开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经过这次讨论，我们深刻认识到：学术上不同的意见，应当充分展开争论，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使问题得到解决或者接近于解决。当然，汉语的词类问题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解决。差不多在我们进行争论的同一个时期，苏联语言学界也举行了关于各种类型的语言的词类的讨论大会；会上虽然肯定了词类是各种类型的语言的固有的范畴之一，但是对于划分词类的标准也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認識（參看本刊1955年5月号40—42頁）。可見這個問題是非常複雜的，需要我們全體語文工作者認真地切實地進行全面的深刻的研究，才能解決的。呂叔湘先生說：“認識問題（按指漢語詞類問題）的複雜性，我想，該是走向解決問題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要佔有材料。……在這方面，咱們過去做的工作真是太不夠了”。應該說，不單是漢語詞類問題，就是漢語研究領域內的一切問題，我們過去所做的佔有材料的工作都是非常不夠的。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就是要詳細佔有材料，深入鑽研。除了詳細佔有材料之外，還須注意研究問題的思想方法，沒有正確的思想方法，即使佔有的材料很豐富，也很难得出科學的結論來的。為了使今後的討論更深入一步，本刊特把這次討論的一些情況作個簡單的說明，扼要地敘述一下雙方的論點，指出某些問題已經得到解決，某些問題還沒解決，爭論的焦點在哪裏，希望同志們在現有的基礎上針對這些還沒解決的問題加以研究。

討論是這樣引起來的：高名凱先後在本刊發表了《關於漢語的詞類分別》（1953年10月号）、《再論漢語的詞類分別（答B.Γ.穆德洛夫同志）》（1954年8月号）、《三論漢語的詞類分別》（1955年1月号）三篇文章，始終主張漢語的實詞沒有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的分別，贊成這個主張的有劉正埏（《語言學界也應該廣泛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1955年3月号）；反對

這個主張的則有曹伯韓（《對於漢語語法研究的幾點意見》，1953年11月号）、文鍊、胡附（《談詞的分類》，1954年2月号，3月号）、《詞的範圍、形態、功能》，1954年8月号）、顏景常（《對於語法討論的意見和希望》，1954年3月号）、B.Γ.穆德洛夫（《漢語是有詞類分別的——對高名凱教授的文章提一些意見》，1954年6月号）、陳乃凡（《漢語裏沒有詞類分別嗎？》，1954年8月号）、鍾棧、趙淑華、金德厚、王還（《漢語的詞類問題》，1954年8月号）、呂叔湘（《關於漢語詞類的一些原則性問題》，1954年9月号，10月号）、俞敏（《形態變化和語法環境》，1954年10月号）、陳（《區分詞類不能割裂意義和形態》，1954年10月号）、魯（《“不”能和名詞聯合嗎？》，1954年11号）、劉冠羣（《漢語詞類分別的商榷》，1954年11月号）、伯晦（《我對區分漢語詞類的看法》，1955年2月号）、胡明揚（《試論我國語言學界目前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1955年3月号）、山石（《語言學界應該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1955年3月号）、姜遠（《向語言學界提三點建議》，1955年3月号）、莫木（《關於“再論漢語的詞類分別”的例證問題》，1955年3月号）、黎錦熙（《詞類大系——附論“詞組”和“詞類形態”》，1955年5月号）等人。

高名凱主張漢語實詞沒有詞類區別的邏輯是：區分詞類不能拿詞的意義、聲調變化、功能和結合關係作標準，而只能拿標明各種詞類的特殊形式，即狹義的詞形變化作標準（大前提），這種標明各種詞類的特殊形式是不存在於漢語的，而漢語的構詞形態也不足以作為區分詞類的標準（小前提），因此，漢語的實詞沒有詞類的分別（結論）。

高名凱着重地論證了拿詞的意義規定詞的類別的錯誤，他說，漢語有名、動、形容等概念，但是這些概念是用詞彙的方式表達出來的，不是用語法的形式表達出來的。如果以為有名、動、形容等概念，就須有名、動、形容等詞，那就是邏輯的分類，而不是詞的分類，因為它沒有注意到詞類的特殊的物質外殼，而有物質外殼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這個論點，穆德洛夫、陳乃凡、俞敏是同意的。曹伯韓、文鍊、胡附、鍾棧、趙淑華、金德厚、王還、呂叔湘、陳陵、伯晦、黎錦熙等人也都同意不能單拿詞義來作劃分



的標準，呂叔湘並補充說明了用詞義劃分詞類在實踐上的困難。但是他們認為在劃分詞類的時候，不能離開詞的意義不管，因為詞義是和詞的形態有機地構成的統一體，不能分割開來。呂叔湘說：“無論用什麼方法劃分詞類，詞義是一項重要的參考資料，如果分類的結果跟詞義大相衝突，準保不受欢迎”。

漢語的聲調變化，根據高名凱的分析，只有區別詞義的作用，沒有區別詞類的作用。所以高名凱認為主張從聲調上來劃分詞類的實際上仍是从意義出發，是不正確的。穆德洛夫、陳乃凡都同意這個論點。黎錦熙也說聲調變化主要是表示詞義的，俞敏認為聲調變化在現代漢語裏只剩下一點殘餘，已經不能歸出條例。曹伯韓則認為聲調變化是意義的區別，同時也是詞類的區別。

高名凱否認詞的功能可以劃分詞類的理由是，同一功能的詞，不一定同類，正如木頭和鋼骨都可作柱，但木頭不就是鋼骨一樣。他說，以英語為例，作主語的可以是名詞、動詞的現在分詞、無定式動詞、形容詞，可見從功能上看，是分別不了詞類的。即使從功能上能够給詞加以歸類，高名凱也不承認它是詞的類別。他說：“即使有的所謂‘名詞’只能具有名詞的作用，也不等於說它們就是名詞，……詞甚至於可以只具有一種功能，也不等於說這個詞就是某一詞類的詞，因為詞類是詞法上的問題，它必具備一個條：有某種表示概括性的範疇的特殊的詞形變化來把這個範疇鞏固在詞本身上面的時候，這個詞才有詞類”。主張功能是劃分詞類的標準之一的，有曹伯韓、文鍊、胡附、穆德洛夫、陳乃凡、鍾棧、趙淑華、金厚、王還、呂叔湘等人，其中以陳乃凡說得最明確。他說，詞的屬性不是老跟它的表面特徵一致的：有時同一個詞類而有不同的形態，有時不同的詞類却有同樣的形態，有時詞就根本沒有形態，如果光看形態，而不抓住詞的功能來辨認詞類，那就会得出“同類的詞同類，異形的詞異類，無形的詞無類”的結論。並強調“要摸詞類的底，光看形態還不行，要緊的是研究它們的功能”。這裏所謂功能，是指詞在句中的職務和詞的結合能力而言的，高名凱的所謂功能，是說的詞在句中的職務，兩個人指的範疇不完全相同。如果拿詞在句中的職務來定詞類，即按句子成分定詞類，文鍊、胡附也認為只能作為輔助的手段，呂叔湘對這標準所存在的嚴重缺點更作了詳盡的分析。鍾熙則認為按句子成分來辨別固有的詞類，同按詞的結合關係來鑑定詞類有同樣的意義。

詞和詞的結合關係，高名凱認為是詞義配合的問題，

不是詞類的問題。他承認詞的組合是一種語法形式，但是他指出，語法形式和詞的變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某種詞之所以為某種詞，並不是依靠它同別的詞組合在一起才確定的。英語裏和前置詞聯合的有名詞、動詞的現在分詞和形容詞，法語裏和前置詞à聯合的有名詞和動詞，我們認識它們是名詞或動詞，並不依靠它們和某一個前置詞聯合，而是依靠它們的形態。他說，如果從詞的組合關係上去規定詞類，那就意味着否認了形態的語法作用，从而有詞的變化的語言和沒有詞的變化的語言就沒有什麼語法上的不同，誤認一切語言都有詞類，一切語言的詞類都是一樣的了。反對高名凱的人大都認為結合關係是劃分漢語詞類的主要標準。他們指出，只有個別詞的結合現象，才是詞義配合的問題，而整個詞類的結合現象，則是語法問題而不是詞義配合的問題。他們認為詞的變化歸根到底是為了表示各種結合關係而產生的，孤立的不與其他的詞發生關係的詞永遠也不會起詞形變化，因此直接地從結合關係上來規定詞類是可能的。文鍊、胡附說：“詞類是結構中的類，詞形有變化，一定與結構有關”。又說：“形態是在結構中產生的，沒有結構，也就沒有形態。狹義的形態只是廣義形態的外部特徵，因此，沒有外部的特徵，也能歸類”。穆德洛夫舉 *пальто* 和 *рано* 形式相同，其所以能區別前者是名詞，後者是副詞，就是从它們和別的詞的結合關係上看出來的。曹伯韓也舉出英語的實詞 *little*, *more*, *less* 等等兼了幾類，也是從詞與詞的結合關係上辨認出來的。

結合關係包括鑑定字在內。高名凱承認它也能表示語法範疇，而且這語法範疇也可能是屬於某一類詞的，但是他認為這只是說表示這語法範疇的鑑定字能够使它和它組合在一起的詞具有某種詞類的功能，不是說和它組合在一起的詞就是某種詞類。呂叔湘認為鑑定字雖不能用作劃分詞類的主要根據，但是可以用作輔助手段。

形態問題雙方爭論很熱烈。高名凱承認詞尾“者”“子”“兒”“頭”“性”等等是漢語的形態，可是他認為這些是構詞法的問題，與詞類分別沒有關係。至於“了”“着”“們”“的”，高名凱不承認它們是形態。他說，形態是詞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了、着、們、的”並不是非與詞根結合在一起不可，不用它也可以，換個成分，換一種說法也可以，因此只能認為它們是表示語法作用的語法工具或補助詞，不能認為它們是漢語的形態。關於重疊形式，高名凱認為只有詞根的重疊才是詞的變化，而詞的變化並不一定是詞類的標誌，因為構詞法也應用詞的變化。他指出漢語的重疊形式是不是

詞根的重疊，還有待於深入研究，即使是詞根重疊，這種重疊形式也不是某一類詞區別於另一類詞所特有的，因此也不能拿來作為劃分詞類的根據。反對的人認為構詞的形態和標明詞類的形態是統一的，他們舉了漢語中許多名詞是由動詞形容詞加上詞尾“子、兒、頭、者”等等而轉變來的事實。鍾棧等四位根據《英語語法》一書指出起構詞作用的同時也起分別詞類的作用。鍾棧等四位又指出“們”“着”“了”“的”不是表示詞或句子之間的關係的，和補助詞的性質根本不同。俞敏更根據梵語語根可以單用，德語動詞詞頭和詞根可以拆開的現象說明高名凱對於形態的了解是不完全正確的。至於重疊形式，俞敏舉“人”“好”“飛”三個詞為例，說明它是漢語中最顯著的狹義形態，黎錦熙則認為它主要是關係構詞法。

總起來說，爭論的焦點在這裏。主張沒有詞類分別的人說，只有狹義的形態才能分類，漢語詞尾“者”“子”“兒”“頭”“性”等等和重疊式是廣義的形態，即屬於構詞法的，不是狹義的形態，所以漢語不能劃分詞類。反對的人說，劃分詞類要憑幾個標準，不能光靠狹義形態，所以漢語能夠劃分詞類。

這次爭論雖然還沒有解決漢語的詞類問題，但仍然是有收穫的。一，大家明確了不能單憑意義來分詞類。二，大家明確了漢語是有形態的，不過和印歐語言的形態有一定程度的差別。三，主張漢語有詞類分別的人認為漢語詞類問題是很複雜的，不能用一個標準，而必須運用幾個標準才能解決問題。

在主張漢語有詞類分別的人中間，認識還不一的地方在於：第一，劃分詞類的標準有的主張兩個，有的主張三個，有的主張四個。同時，標準的數目同的，內容也不一定相同。第二，幾個標準之間哪是主要的？哪個是次要的？第三，幾個標準是同時用呢，還是一次只用一個為主？

除了詞類問題本身而外，還有三個問題也是需要明確一下。（一）取消詞類分別是否等於取消語法？句話說，沒有詞類分別是不是還可以有語法？（二）述語法現象是否應該分別一般和特殊？可否用後者斥前者？（三）討論現代漢語的規律的時候，可否用現代漢語的情形（以及保存在現代的成語裏的情形）作論據？這些問題在雙方的爭論裏也接觸到了，但是沒有從理論上來加以解決。無疑地，這些問題的解決對於我們認識漢語的詞到底有沒有詞類區別會有很大的幫助，雖然它們的意義還不限於詞類問題上。

附帶地說一下，關於漢語詞類問題的討論，已經起了中國語言學界的重視，在北京大學成立五十七年的紀念大會上，在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的成立會上，也都進行過討論。王力先生在這兩個大會上了專題報告，提出了充分的理論根據，認為漢語的詞以分類。蘇聯謝爾久琴柯教授給了王力先生的報告一個很好的評價，並且指出了報告中在引証蘇聯學者於漢語詞類的意見的時候把專門研究漢語的學者和專門研究漢語的學者平列起來是不妥當的，蘇聯的學家們一致認為漢語是有詞類的。

## 對許紹早的批評的答辯\*

傅子東

### 一 詞的性質和功用

許紹早說我是按照詞在句子中的功用來規定名詞裏頭的抽象名詞的，因此，他指出這是跟我的語法理論——不是詞的功用產生詞的性質，而是詞的性質產生詞的功用——相矛盾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自然是個矛盾，可是事實上我並不是按照詞的功用來規定名詞中的抽象名詞的。

我在我的《語法理論》中已明確指出，表事物動作的詞“團結”和表示抽象事物的詞“團結”，表事物性態的詞“幸福”和表示抽象事物的詞“幸福”，各代表兩個不同的概念，在詞典上它們是作為兩個不同的東西而出現的，不過它們的形体相同罷了（參看本書33—34頁）。這就是說，作為名詞的“團結”性質上是和作為動詞的“團結”不相同的，作為名詞的“幸福”性質上是和作為形容詞的“幸福”不相同的。“團結”作為一種東西或名詞出現在說話者的頭腦中時，說話者就可以說出“團結從鬥爭中產生”，“幸福”作為一種東西或名詞出現在說話者

的頭腦中時，說話者就可以說出“幸福結合健康”；“團結”作為一種動作或動詞出現在說話者的頭腦中時，說話者就可以說出“大家團結起來”，“幸福”作為事物所具有的一種性質狀態出現在說話者的頭腦中時，說話者就可以說出“社會主義制度和新民主主義制度下的人民都過着幸福生活”。所謂“團結從鬥爭中產生”的“團結”是作為一種東西或名詞進入句子而扮演主詞，不是作為一種動作或動詞進入句子後因扮演了主詞而轉變為名詞的；“幸福結合健康”的“幸福”是作為一種東西或名詞進入句子而扮演主詞，不是作為事物所具有的一種性質或狀態進入句子後因扮演了主詞而轉變為名詞的。認為詞類進入句子後可以轉變它的性質，在我看來，不是與客觀的實際的語言現象相符合的。

\* 許紹早批評我的文章，題為《漢語語法理論中的些問題——讀傅子東著語法理論後》，見《中國語文》1953年1月號，29—33頁。本文所引許紹早的說法都是從那篇歸納出來的，請讀者自己去參看，這裏不一一標註出處。



許紹早在引証了我的“不進入句子中或跟句子沒有任何聯繫的詞是客觀上決不可能存在的東西”一句話以後，接就質問我說：“既然詞在不進入句子中時是不存在的，那詞性怎樣又是在進入句子之前就已經確定了的？進入句子後也沒有，何來詞性？”並且還作出斷語說：“所以位次連自己也不知道詞性應怎樣解釋”。許紹早先生，不是連詞性也不知道該怎樣解釋，而是你沒有弄清楚我那句話意思啊！試以“鳥飛”為例，“鳥”是執行“飛”這個動作的東西，“飛”是這種東西執行的一種動作。“鳥”的名詞的意義或性質，“飛”的動詞的意義或性質，在進入“鳥飛”這個句子以前已經確定，這是常識所肯定了的。“鳥”和“飛”進入句子前詞典上有獨立的意義或性質，進入句子後在句子中彼此各有一定的地位，或有相互依存的聯繫；它們的意義或性質，進入句子後表現為動作的主体，表現為主体執行的動作，更明確地被認識出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一方面有獨立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必然與資產階級進入同一的資本主義社會，它的性質從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中更明確地被認識出來。詞有獨立的存在，正如無產階級有獨立的存在——不進入句子中或是跟句子沒有任何聯繫的詞是客觀上決不可能存在的東西，正如不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或跟資產階級沒有任何聯繫的無產階級是客觀上決不可能存在的東西——試問我的“不進入句子或跟句子沒有任何聯繫的詞是客觀上決不可能存在的東西”和你了解的“詞在不進入句中時是存在的”有什麼共通之處呢？

## 二 詞性的發展

許紹早說我對“發展的詞性”沒有解釋；並且說我不是按發展的詞性來分詞類。事實自然也不是這樣，上述的抽象詞“團結”和“幸福”就具體地証實了我按照詞性的發展區別詞類的。作為跟具體的東西相同的東西，“團結”或“幸福”可以記述一種執行動作的東西——這個客觀的現象，就可以和記述一種東西所執行的某種動作如“產生”或“合”——這個客觀的現象，聯繫起來，在“團結從鬥爭中產生”或“幸福結合健康”的詞羣或句子中更清楚地表現出它們的詞性質，即指某種動作的執行者——這個具體的東西同抽象的東西。既然是跟具體的東西同性質的抽象的東西，它們就可以被附加詞限制或修飾，恰如指具體的東西的名詞附加詞限制或修飾一樣，例如“一種團結”，“我們的幸福”，“團結的”，“將來的幸福”，“一種人”，“我們的筆”，“堅固的”，“將來的陣地”。“團結”或“幸福”在這些詞羣中的名詞意義或性質也顯明得像普通名詞一樣。所以這個“團結”或“幸福”的名詞性質是常識所肯定的。英語中無數的兼性詞，有力地証明了同一的形体上附著兩種不同的客觀的存在，兩個不同性質的詞。就英語說，兩個不同性質的詞，作為兩個不同的客觀存在，通過語尾變化或屈折形附加在兩個不同的形体上的，是完全一樣的。我們漢語裏面只附著在同一形体上的名詞和動詞，有的通過四聲不同，讀音上有區別，如“中”，作為名詞或形容詞讀陰平，動詞讀去聲（漢字拼音化時，標明四聲，形体上也就有了區別）；但是名詞的“中”，形容詞的“中”，動詞的“中”，是三個不同的客觀的存在，因為它們的性質是各別的，名詞的

“中”是指一種空間的位置，即一種具體事物，形容詞的“中”是指事物的一種性狀，動詞的“中”是指事物的一種動作。可是形容詞的“中”，動詞的“中”，是從名詞的“中”孳生或發展出來的。“團結從鬥爭中產生”中的“團結”本是動詞，“幸福結合健康”的“幸福”本是形容詞，這只能說是許紹早自己的話語。

許紹早問：“毛澤東時代是中國黃金時代”一句中的“毛澤東”和“黃金”都是名詞，“木人”的“木”是由單音的名詞孳生出來的形容詞。為什麼同是名詞，在句子中執行同樣的職務，一個仍是名詞而另一個又成了形容詞呢？我可以回答，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的《國音常用字彙》（45頁）在“木”字下註明：（5）“謂呆笨”，最近它出的《同音字典》（79頁）解為（4）“發僵”，（5）“呆板”，現行通俗的字典如《學文化字典》（12頁）和《新華字典》（85頁）等，無不有這樣的註解，這就是詞性發展的確認。作為“木材”的“木”，“木”是名詞；作為“呆笨”的“木”，“木”是形容詞。一般字典為什麼對於“木”的某一個意義能確定為“呆笨”，就是照習慣；“木”或“呆笨”為什麼是一個意義，因為是習慣所公認的。（參看《語法理論》，20—21頁）。

許紹早又問：怎麼知道“從來沒有紅過臉”的“紅”和“圈點檻虎”的“檻”還沒有質變而“圈”又變了？我回答可以從《國音常用字彙》看出來。《國音常用字彙》在“檻”字和“紅”字下所作的注解，沒有指任何動作的意義，但在“圈”字下却註明：（4）“以物圍之，如言用磚先把這塊地圈起來”（216頁），因此我們知道這個“圈”至少從公元前一百年餘年起由量變發展到質變，孳生出動詞“圍”的意義；“檻”和“紅”仍然是名詞和形容詞。

許紹早看到我承認“中國的解放”的“解放”是動詞，卻又承認“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的“明”和“巧”是形容詞，“夫星之隊（墜），木之鳴”中的“隊”和“鳴”是動詞，因此，說我是忘了這些在語法形態上的相同而鬧出了笑話。讓我們看看這些在語法形態上是不是相同吧。《孟子》的原文是“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可見‘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是兩個讓步副詞句，即‘雖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與‘離婁雖明，公輸子雖巧’的意思，接續助詞‘之’在這裏是起着接續主詞和述詞的作用。至於‘中國的解放’的‘的’是接續偏位詞和扮演主詞的抽象名詞的，它跟‘日月之明普照大地’才是同一類型，而和‘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却無相通之處，怎麼能把它們相提並論呢？（參看傅子東《傅氏文典》2冊，37—44頁）。“星之隊，木之鳴”是“星之隊於地也，木之鳴於空也”的意思，這兩個“之”字與“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的“之”字相同，跟“中國的解放”中的“的”字不相同，因此也是不能混而為一的。由此看來，認為“中國的解放”是主謂結構的，當然就破壞了語法上詞的形態，也就不能不是錯誤的。

## 三 位次論

“位次”，“位次形態”，我在《語法理論》中已有明白解釋（詳該書第五章），我想用不着重複，這裏只就許紹早提出的幾個具體問題來解答一下。

“什麼詞類基本上必然充當什麼句子成分，即在句子中具有什麼功用”。這句話中的“詞類”是特就名詞而言的，名詞必然充當主詞或賓詞，只基本上是這樣的，因為名詞憑藉了其

他的位次形態還可以充當述詞、補詞、偏位附加詞、從位附加詞。“基本上”“必然”這兩個詞一先一後，意義很明白，許紹早是不須疑訝的。

在一定的對話環境中，“東方紅”是“東方天色變成紅了”的意思，“紅”的形容詞的面目通過扮演主詞的補詞的功用更清楚地呈現出來，“變成”是“紅”的述位這個位次形態所給予的。“從來沒紅過臉”這句話的意思，在一定的對話環境中是“[我]從來沒使臉變成紅”，“紅”的形容詞面目通過扮演賓詞的補詞的功用更清楚地呈現出來，“使……變成”是“紅”的述位這個位次形態所給予的。比較英語的 red (紅) 和 redder (內動詞：變成紅，外動詞：使……變成紅)，我們就可知道這個述位的位次形態在作用上跟英語或印歐語系語言的構詞法中語尾變化是相同的。“紅”這個形容詞的性質，無論在說話者的頭腦中或在組成的句子中都是顯明的；認“紅”為動詞，是常識斷然否定的。由詞的位次形態新生出的意義是和詞典上詞的意義判然各別的。

“虎”在字典上的意義，除指一種動物外，還“喻威武勇猛”，“喻”是比喻，比喻的不是字的本義。“青年團員胡志祥是真虎”，“虎”是名詞，“真”是副詞。副詞只能對動作或某種情態加以修飾。“虎”在補位，補位這個位次形態使“虎”的特徵“勇猛”出現，“真”這個副詞所修飾的是“勇猛”，不是“虎”字的本身，“真虎”是“真像虎那樣勇猛”。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黃金時代”，“毛澤東”跟“黃金”這兩個詞執行了跟形容詞同一的職務，為什麼不是形容詞？我們的答覆是：詞的性質是由詞的概念或意義來決定的，不能由其他任何什麼標準來決定的。“毛澤東”和“黃金”都是名詞，這是常識所肯定的；它們憑藉偏位這個位次形態限制了扮演主詞的名詞“時代”，和扮演補詞的名詞“時代”，可是它們的性質不因功用上與形容詞相同而改變，它們仍然以名詞的面目出現於詞羣之中。這就是說，它們和形容詞在功用上雖相同，意義上是各別的。在一個對話環境中，“毛澤東時代”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的時代”，“毛澤東”對“時代”是領有關係；在另一種對話環境中，“毛澤東”對“時代”是類別關係，即不是成吉思汗時代，拿破倫時代，而是毛澤東時代。不管對“時代”的關係怎樣，“毛澤東”這個詞是和任何種類的形容詞的意義有區別的。“黃金”這個詞在這裏是“像黃金那樣最有價值或最可寶貴”的意思，與性態形容詞相近似，但它是具體的事物表示出這樣的性質的。偏位是有印歐語系語言的領格語尾變化的作用的。

“蘋果綠色衣服的女郎把臉兒虎了起來”，“蘋果”仍然是名詞，也是常識所肯定的。它憑藉從位這個位次形態才能限制那扮演偏位附加詞的形容詞“綠色”，這個位次形態給予它以介詞“像”的意義，“蘋果綠色”即是“像青蘋果皮上顏色的綠色”。這個“蘋果”的從位在作用上和印歐語中狀態格的語尾變化相同。“我今天走了二百里”，“二百里”這個名詞語憑藉從位這個位次形態，才能限制那扮演述詞的動作“走”；“這個布[是]有二尺五[寸]寬”，“二尺五[寸]”這個名詞語憑藉從位這個位次形態才能限制那扮演補詞的形容詞“寬”，因為從位這個位次形態給予它們以副詞“多”和“很”的意義，這從位在作用上就和印歐語中數量格的語尾變化相同。

以上幾段，可以參看《語法理論》，37—39，121—126 頁。總起來說，詞序或詞的位次作為一種形態，是客觀存在的事

實，絕不是像許紹早所說的“專從想像出發”的。

#### 四 述性詞

若干名詞、形容詞等都可以在述位，也都可以轉變為述性詞；述性詞的性質出現在前，述性詞的功用出現在後，意味着述性詞的性質決定述性詞的功用。許紹早認為使變為述性名詞等，是功用決定了性質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中國人正努力工業化”，“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問題是中國最迫切的問題”，這兩個句子中的“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照詞的功用決定詞的性質的原則，都應是述性形容詞；但是第一個“學習蘇聯先進經驗”是指人所具有的性能，第二個“學習蘇聯先進經驗”指跟抽象的東西——事物，前者是述性形容詞，後者是述性名詞。它們都在述位，執行同一的職務或表現出同一的功用，但由於它們性質的不同，前者和“聰明的中國人”中的“聰明的”相同，後者和“[經濟]革命的問題”中的“[經濟]革命”類似，因為就問題類別這一點說它們的意義是一樣的。也就是說，述性詞和抽象名詞在偏位，都可對事物加以類別的限制，或事物類別的關係。（參看《語法理論》，87—90 頁）。

許紹早問，“述性從什麼地方看出來”，我的答覆是：述性詞既都是在述位的詞轉變成的，因此具有述詞的種種性能，即可以帶賓詞或補詞或賓詞和補詞，可以有助動詞，它們，有從位附加詞修飾它們，這就是具有抽象事物、事物性能或動作狀態等等意義或性質的述性詞所含的述性。也就是說，述性詞的述性從它所具有述詞的種種性能看出來，述性詞是詞羣或句子中的東西，和詞典裏的詞是對立的，但作為一個句子成分，它的意義或性質，是可以並比照詞典裏的詞的意義或性質來判定的。在一個對話環境中，“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述詞有廣狹兩義，“學習”認作述性，是比照狹義的述詞而言，“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認作述性，是比照廣義的述詞而言）作為一個述性名詞語出現在我們頭腦中時，我們可以說出“學習蘇聯先進經驗是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恰如在一個對話環境中，“勞動”作為一個抽象名詞語出現在我們頭腦中時，我們可以說出“勞動創造世界”似的。在另一種對話環境中，“學習蘇聯先進經驗”作為一個述性名詞語出現在我們頭腦中時，我們可以說出“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問題就是我們迅速地工業化的問題”，恰如在另一種對話環境中，“勞動”作為一個抽象名詞語出現在我們頭腦中時，我們可以說出“勞動底問題是資本主義國家不能解決的問題”的。在又一種對話環境中，“學習蘇聯先進經驗”作為一個述性形容詞語出現在我們頭腦中時，我們可以說出“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中國人正努力工業化”，恰如在又一種對話環境中，“勞動”作為一個性態形容詞語出現在我們頭腦中時，我們可以說出“勞動人民是要支配全世界的”似的。在又一種對話環境中，“學習蘇聯先進經驗”作為一個述性副詞語，在我們頭腦中出現時，我們可以說出“我們去莫斯科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它表述詞“去”的目的。在一間着火的煙霧騰騰的屋子屋外的人喊屋裏的人“跑出”（如同說快快地出），在操場上的一個球員喊靠近操場的一間屋裏坐着的人“跑出”，第一個“跑”是以述性副詞的性質出現的，第二個“跑”是演述詞的動詞性質出現的（第一個“出”是述詞，第二個“出”是空間副詞，“到外面”的意思）。在一定的對話環境中，



“跑”這個動作的方式來記述動作情況的迅速這個客觀的，我們就通過詞的位次或一定的位次形態使“跑”這個動詞變為指動作狀態的副詞，如第一個“跑出”的“跑”。一定位次形態使“跑”轉變為指動作狀態的副詞，恰如一定的位次形態使“鳥飛”的“鳥”表現為主詞或動作的主体一樣，不應為詞羣或句子中的固定的序列，如在前或在後，而應了一定的對話環境中一定的位次。“跑”的一定位次形態“跑”以“快快地”或表動作的一種狀態的意義，恰如本文所述的位次形態給予名詞形容詞或名詞語以介詞、動副詞的意義似的，它是有印歐語系語言中語尾變化或屈式使動詞轉變為散動副詞的作用的。“跑出”的“跑”具詞的意義或性質，因此表現出限制述詞“出”的功用，即從位附加詞或執行從位附加詞的職務。

述性詞的存在是一定的位次形態所給予的，既是一種存必然地具有一定的意義或性質，這一定的意義或性質決它的功用，即使它能充當句子中一定的成分。就“跑出”儘管這一定的位次形態是跟“跑”所憑藉來表現出它的功用執行從位附加詞的職務，是同一的位次形態，但它的出現在前，功用出現在後，正如腦髓的活動出現在前，個活動而來的思惟出現在後一樣。“跑”的一定的位次形態變化或消滅，它這個述性詞的存在也就喪失了；“存在”一定的意義或性質的，有一定意義或性質的“存在”消失從這個消失的存在可以出現它的功用自然不是客觀上可的現象：這也可以說明述性詞的性質出現在前，功用出後。

述性詞指抽象的事物的就是述性名詞，指事物的性能的述性形容詞，指動作的狀態等等的就是述性副詞；既已成名詞、形容詞或副詞，當然就不能有語法上的主詞，是說，它既不再具有表現為動作主体執行的動作的意義實，自然就不能在它和動作者間出現着相互依存的關係。們可以保證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學習”和“我們可以保證先進經驗的學習”的“學習”，兩者是有嚴格的區別的，是述性名詞，指動態的抽象事物，後者是抽象名詞，指的抽象事物，前者在詞羣中才有它的存在，後者在詞典有它的存在。

述性詞的定義在這裏可以說明了，就是：作為可以在述詞憑藉一定的位次形態而轉成的詞羣中或句子裏的東西述性詞，指以含動作方式表現出的抽象事物，或事物的或效用，或動作的狀態、方法、目的、效果等等。現在可以進而回答許紹早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問題了。“為什麼謂語形式”就要受到“這是主觀的唯心論見解”的批評，而述性副詞“就不是唯心？”那是因為“謂語形式”的制作人看見詞的性質，只看見詞的功用，而“述性副詞”的制作請了詞的功用背後還有詞的性質，詞的性質是詞的功用決定者。

許紹早問：“為什麼‘不懂就是不懂’中的第一個‘不懂’述性名詞（按第二個‘不懂’是在補位的述性名詞）呢？為什麼‘我要自己擇飯吃’中的‘吃’是述性形容詞呢？為什麼把敵人包圍而消滅之’的包圍是述性副詞呢？而且述性名詞性，述性形容詞的形容詞性，述性副詞的副詞性不是‘在它進入句子之前已經確定了的’？如果不是，怎能詞的功用不是產生詞的性質的’呢？”“不懂”是指動態的抽象事物，所以它能扮演主詞，執行動作者的職務；“吃”是物效用的述性形容詞，所以它能扮演偏位附加詞，執行實詞“飯”的職務；“包圍”是指動作方法的述性副詞，所能扮演從位附加詞，執行限制述詞“消滅”的職務。許紹早問正足以說明他是不知道詞羣中的語法範疇像詞典裏一樣同是詞的性質決定詞的功用，以為詞羣中的語法範然是由功用來決定性質的。

“為什麼‘團結’（團結從鬥爭中產生）是抽象名詞，而‘不懂’（不懂就是不懂）又是述性名詞呢？為什麼同樣可以做句子中的述詞而在这种句子中做主詞的會有兩種不同的解釋呢？而且這‘述性名詞’是不是詞典上的名詞呢？如果不是，那麼‘扮演句子中的主詞必然是詞典上的名詞’又怎樣解釋呢？”“團結”是詞典上的東西，指靜態的抽象事物，“不懂”是詞羣裏的東西，這裏的動詞“懂”憑藉一定的位次形態變成指動態的抽象事物。“懂”和“團結”，作為指事物動作的動詞（詞典裏的東西），才可以充當句子中的述詞，如“學語法的應懂詞性”的“懂”和“大家團結起來”的“團結”。“團結”，作為指抽象事物的名詞，“不懂”，作為指動態的抽象事物的述性名詞，才可以充當句子中的主詞。詞羣裏的語或从句比照詞典上的詞判定為述性名詞語、名詞句等等，然後我們才能明瞭它們的功用，也就是說它們的性質決定了它們的功用；所謂“扮演句子中的主詞必然是詞典上的名詞”，這個名詞當然包括跟它同性質的名詞語、名詞句，還包括代詞和在某種性質上同於名詞的引用語。許紹早一方面堅持葉思丕森的功用論的觀點，認為詞的功用決定詞的性質，另一方面堅持葉思丕森“詞的本身性質不變”的說法，認為詞性是不發展的；又不理解詞羣是同樣地根據它的性質才表現出它的功用的；怪不得要提出上述的質問了。

## 五 漢語的特徵和省略

“省略”就中國語說，像中國語無性、數、格的變化，無人身、動式、動時、語態的變化一樣，是最重要的特徵”。（《語法理論》，105頁）。至於漢語中的助詞，日語中大都有的，但也應認為漢語的重要特徵，漢語中後附的助動詞也可以算為漢語的重要特徵。就位次形態說，印歐語系語言中有着無語尾變化的格，這在實質上和我們的位次是相同的（因為從格產生的意義實質上是从位次形態產生的），漢語的位次也只能是漢語的重要特徵。漢語句子成分的次序，特別是就古代漢語說，較長的賓詞常提置句首，這也是漢語的特徵。這些最重要的和重要的特徵，研究語法而又學過外國文的，可以說，人人知曉，個個明白。“我吃館子”或“拉三千元”這類話所表現的偶然突出的語言習慣，正是咱們老百姓創造性的“省略”法，不須用大力來發掘的。許紹早的大張撻伐：“把西洋的語法系統硬套在漢語上，否認漢語的特徵是對漢語的不可容忍的曲解，是將陷入唯心論的泥坑，是將倒退到幾十年以前去”，只是無的放矢。

“省略”的根據是特定的對話環境，我在《語法理論》中（59—60頁）作了詳明的闡述。據許紹早的意見：“所謂省略就是可以確定不移地補出，並且這個形式和原來的形式常見；所謂非省略就是不能確定不移地補出，一般人說此句時不感覺缺少什麼”。我可以確定不移地回答：不問一般人說某句話時是否感覺缺少什麼，我們是要根據一定的對話環境如實地把沒有說出的東西完完全全地補充出來的。“大家鼓掌歡迎”，在一种對話環境中，我們可以說“鼓掌”表“歡迎”的方式，在另一种對話環境中，我們可以說“歡迎”表“鼓掌”的目的。離開了一定的對話環境，“牛羊父母”和“今天國慶日”，當然是同型的，也就是說“牛羊[是]父母”如同“今天[是]國慶日”一樣。所以，不是許紹早所謂“濫用省略說的人的解釋達到驚人的混亂”，正相反，是那實質上否定省略說的人的解釋達到驚人的混亂。省略的根據既是对一句話有決定性作用的一定的客觀對話環境，那麼，所省略的成分當然是沒有“不能確定不移地補出”的，“牛羊父母”就是“牛羊歸父母”，“今天國慶日”就是“今天是國慶日”。“一般人說此句時不感覺缺少什麼”不能構成“非省略”的論據，因為一般人雖不感覺“此句”缺少什麼，根據一定的客觀對話環境，我們是必然能夠確定不移地補充出省略的成分的。

# 文字改革和电报业务

朱学範

文字改革分兩步走。第一步精簡現有的漢字，使它適应当前實際的需要；第二步是從象形體系的形式過渡到表音體系的形式，使它更密切地配合語言，更有效地為廣大的勞動人民服務。

毛主席早已指示我們：“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漢字簡化，正是照顧當前條件的必要措施。毛主席又指示我們：“要走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漢字簡化，正是往拼音化邁進的起點。

我們熱烈擁護這一歷史意義的偉大改革。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中列舉的簡化字體絕大部分是羣衆已經普遍通用的。這些字的寫法原來是從羣衆中來，經過挑選，而加決定再到羣衆中去。因此，既能夠為已經識字的人所容易接受；又由於結構精簡，異體廢除，給初學文字的人減輕負擔。我同意這一實際可行的漢字規範，使大家有個共同的標準。

簡化字的推行，是為走向拼音文字鋪平道路。取消一定數量形聲字的形旁，適當地合併一些同音字；於是漢字的數目縮小了，漢字“意符”的作用降低了，以漢字作為記錄漢語的音標作用突出了。漢字是漢語詞的音節單位更加明顯了，對於漢字統一讀音的要求感到迫切了。漢字的本身經過這番精簡，一方面既易識易寫，用起來方便；一方面人們在寫作的時候也就不得不較多地考慮到習用的複音節詞，把漢字和漢語聯繫在一起來運用；同時重視了活的語言，極力使文章接近口語，以便讀出來聽得懂。這樣養成習慣，文字將不再是脫離語言的符號，而是記錄在紙面上的語言。人們對於文字和語言一致的作用有了深切的認識，自然給祖國文字的拼音化打下基礎。

對於有關郵電業務的若干問題，這裏先在電報方面就我個人的看法提出一些意見。

現在初步決定的簡化漢字只有798個，擬廢除的異體字也只有400個，此外的字暫時都還保留原樣。但是就以這一千多字的範圍而論，已經牽涉到四碼制的電碼本。

首先是電碼本的編排問題。其實這也是帶有一般性的一個問題——漢字的檢字問題。不過電碼本的問題來得更為重大。

繁體字和異體字停止使用，簡體字和正體字標準字之後，許多字的部首不同了（不能仍在原部下），筆畫減少了（不能仍按原筆畫計），構成漢字分子移位了（字形有變動），甚至根本變成一個別樣了（部首、筆畫、字形都有變動）；因此原來排列次序就不能不隨之變動。不論以原部首為序，以原筆畫為序，或者以原筆法為序，都不能解決問題。

其實方塊漢字本來沒有一個簡易便捷、合於規律的檢字法；“一檢即得”的檢字法，惟有按照先後排列的拼音文字才辦得到。關於現在各種漢字法的缺點這裏且不論述，現在漢字還沒有實現簡化，在這過渡時期，我認為可以採用檢音法，把按照讀音的順序排列。至於是用注音字母，還是拉丁化新文字的拼音方案，可以另外研究。總之，字音的檢字法一定要比根據字形的檢字法便於檢，是無可懷疑的。

電碼本還有它特殊的問題，不是改變一下檢字法就可以解決的。“電報四碼制度是不科學的”，早有人提出；但因習用已久，也就保留下來。現在的電碼本仍是四碼制的電碼，其中幾千個漢字，包括的、死的、常用的、不常用的、簡體的、繁體的……它們的排列，不但是按照部首先後，同按照數碼先後；由於字數多，和給予各個漢字的已經固定，一個電碼本中的位置已經擠滿，極少活動地。部首與部首之間，字與字之間，再難添入新寫法不同的字；如果有此必要，還須另外“作字”如：一個字的變化範圍就上、下、左、右、中五面加上某些或減去某些，總計十個變動部分，用0-9十個數碼來代表：

1=上加 2=下加 3=左加 4=右加 5=中加  
6=上減 7=下減 8=左減 9=右減 0=中減  
根據十個變動部分所編訂的號碼寫在加上或減去字的電碼前面，表示這個新字。例如：

(1) “魷”字未經編入電碼本，可寫作14293



即“尤左加“魚”作成“魷”);

(2) “學”字未經編入電碼本，可寫作 1331 71311 1472(即“學”下減“子”下加“山”作成“學”)。

以上這個作字法還是“較為簡單易記，不增加譯電工作同志的負擔”的辦法。

一個近萬字的電碼本，按說應該夠用了吧？實際上，還要“作字”。為什麼呢？原因很顯明，那就是所羅列的字數雖多，但大部分是古字和日常生活中少見的字，或是與現代生產根本無關的字。一些可能遇到和需要的字並沒有包羅進去。卷末雖有補遺，而所補的字還是不甚有用的字。這裏任意舉列一列電碼為例，譬如說人部 8030 至 8039 的十個漢字：伉、伙、侏、侏、侏、侏、侏、侏、侏、侏——其中有幾個是我們習用的呢？可見打電報要憑藉四碼電碼本是沉重的。也是不切實用的。

漢字簡化後，廢除了一部分繁体字和異體字，電碼本可以騰出許多地位了，但是能否就此添進簡化字呢？答案仍是不能。因為電碼中漢字排列的位置是受部首和數碼双重限制的(每個部首中數碼的前後大小——不是嚴格的——按照字的筆畫為序)，簡化字應該看作新字，這些新字的部首和筆畫決不能恰好填入所騰出來的空碼中去，假若硬編進去，那就更打亂了電碼本原來的編制體例，將越發不便檢查。假若“就簡化”，也就是說，把簡化了的字替換在原來繁体字的位置裏，就字義而論，問題還不大；但是對使用簡字的人來說，他就還要知道這個簡字的前身，才能查出電碼來。

還有困難。用上述“作字”辦法也解決不了。或者根本不能，或者“作”出來麻煩費解，並且使電碼更加複雜。隨便舉幾個例：

(一) 簡化後，字的本身(或者以之作為構成許多字的分子)變了樣，在楷體漢字中原來沒有這種寫法，因此在電碼中“作”不出字來：

韦(韋) 金(僉) 东(東) 乐(樂) 兴(興)  
头(頭) 为(爲) 去(長) 寿(壽) 农(農)  
龙(龍)

(二) “作”出來麻煩費解：

邮=“郵”左減“垂”，左加“由”(6755 80987 33945)  
电=“電”上減“雨”(7193 67183)  
学=“字”上加“八”(1316 10360)，這個上加“八”還要倒寫才像。

习=“刁”中加“丶”(0431 50027)

以上的類例是極多的。

## 二

從理論上說，四碼電報沒有前途，它的種種缺點早有定論，原可不必再論，應該另尋出路。為什麼這裏又就它同簡化字的關係略加敘述？這主要由於四碼制還是當前的一個現實問題，它有較長遠的歷史來源和使用習慣，很難立刻廢止；因此提出來，希望引起討論，促進改革。電碼應該服從語文的需要。簡化字，以及一切应用的字都不應該遷就電碼。電碼的出路肯定是拼音方向。惟有拼音方向方能解決問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今年工作計劃之一“研究並試行拼音文字電碼”是及時的和必要的。

四碼電報為什麼難於改革？這在一個方面是因為漢字的構造特殊，不易處理。漢字數量太多，漢字中每個相同的音節都有那樣許多不同的寫法；如果每一個音節只有一個寫法，拿北方話來說，四百多個符號也就夠了；如果是音素文字，二、三十個字母也就夠了。漢字不然，字數上萬，為了區別清楚，以免電報造成差錯(電報上可能造成差錯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這裏不論)，就勢必對於每個漢字給予一個專有的號碼，把它固定下來——四碼電報應運而生，而其惟一存在的理由也就是在這裏。在另一個方面，四碼電報之所以難以改革，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思想問題。它的事實根據是，記憶一個電碼要比記憶一個漢字更難，漢字大體還有規律可尋，不是漫無標準，認識和記憶，還都能藉助於聯想；電碼就硬是要死記，無理可說。例如從“一”到“十”的十個漢字是：

0001(一) 0059(二) 0005(三) 0934(四) 0063(五)  
0362(六) 0003(七) 0360(八) 0046(九) 0577(十)

其中除 0001(一)之外，電碼與漢字之間的關係實在難於聯想；如果說可以由部首的先後去聯想，那麼這個圈子又兜得太遠了一些，而且部首也只能劃分若干大類，並不精確，何況部首法的本身還存在問題。因此，熟悉電報四碼的人，至少也和熟悉方塊漢字的人一樣，都是下過多少年真工夫的。惟其如此，正是由於得之不易，所以難免保守；而初學四碼的人又和初學漢字的人一樣，只有叫苦。

## 三

以上是說四碼在檢查、記憶和使用等方面的不便。如果從電報的傳遞方面看，四碼也是不科學的。試拿四碼和兩種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和拉丁字母)的符號及其點劃作一比較：

在符號上數碼雖則只有 10 個(注音字母是 37 個，

加上 ㄨ ㄣ ㄣ ㄣ 是 40 個，拉丁字母是 26 個）。但是每個漢字要用四個數碼來代表，而每個數碼的莫爾斯電報符號（莫爾斯符號是目前我國電報通信上普通使用的一種符號）少則 1 劃，多則 4 點 1 劃；1 劃的長短從傳遞技術上講應該等於 3 點，也就是說，每個數碼的符號最短的是 3 點，最長的就有 7 點。照這樣計算下來，用四個數碼代表一個漢字，它的符號至少就有 13 點，多的要到 28 點。而且四碼電報由 0001 到 9999 把漢字按照字典的順序排列下來，其中代表最常用的字的四個數碼不見得是四碼數碼組中符號點數最少的一組，相反，不常用的字也許點劃最少；例如，最常用的字“速”、“運”各 27 點，“篠”（韻目代日）28 點，不常用的字“噤”、“仄”各 13 點。

如用注音字母，不但每一個字母就能代表一個漢字（這種情形是很多的，因為可以單獨使用的聲母就有 7 個，可以單獨使用的韻母就有 16 個），而且在通用的注音字母電報符號內，最短的只有一點（例如最常用的“i”），最長的才有 11 點；何況注音字母除單獨使用的字母之外只有二拼及三拼，也不像四碼電報每個漢字都要用四個數碼來表示。

拉丁化新文字電報的優點更大，字母符號數點數的多少也是照顧到了它的使用頻次的。例如常用的“E”只有一點，“T”只有兩點，特別是由於詞兒連寫，一組電碼可以代表幾個漢字；例如“WENZ”（文字）這個詞兒就等於兩個漢字，而兩個漢字是需要兩組即八個數碼來表示的。因此就從形式上看，拉丁化新文字電報也比漢字四碼電報為經濟。用停閉式電報機傳遞電碼與用莫爾斯機不同，數碼與拉丁字母的電報符號是沒有長短的區別的。儘管這樣，拼音文字電報仍較漢字四碼電報為有利；因為用一個漢字代表一個音節，每個音節都要四個數碼來表示，而拼音文字的每個音節平均要少於四個字母（拉丁化新文字中單獨一個字母可以成為音節的也很多，例如 Z、C、S、R、I、U、Y、等）；並且詞兒連寫，又節省了音節之間的間隔（每個間隔等於 3 點），例如用兩組四碼傳遞“文字”這兩個漢字，組間要有間隔，而“WENZ”（文字）是一個詞兒，中間不需間隔。

總的說，四碼電報的缺點在於電碼難記、翻譯費時、易出差錯、並且點劃多、在傳遞上也不經濟；而拼音文字電報的優點有：

（一）提高電報速率，降低成本：因為電碼總點數的多少直接影響到傳遞處理時間的長短；而人員、材料、機件、電路的消耗又與傳遞處理時間的長短成正比。

（二）提高電報質量，減少差錯：拼音文字有拼音的規律，易於識別電碼的錯誤、顛倒和遺漏。舉“造”（GAIZAO）為例，如果錯成 AGIZOA 或 IGAOAZ，一眼就能看出來，不像四碼電報，不論怎樣顛倒，都能譯出漢字（除非是電碼本中的空白電碼），必須由下文去理解；但這也是不可靠的，因為錯了字不見得錯了文法，像“母病速歸”錯成“母病逝歸”（“速”是 6643，“逝”是 6641），一碼之差的例子（見《中國語文》第二期）是可以發生的。

#### 四

綜上所述，四碼電報的缺點已經很多，應該改革向拼音化邁進；這是完全必要而且可能的。

四碼電報產生的原因，在於遷就不合理的方塊字。四碼電報因漢字的存在而存在，也將因漢字的改革而改革。

但是，在漢字簡化階段，電碼改革是有困難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漢字分批簡化，數目很難最後確定。簡化多少？作廢多少？結果存在若干選定的字樣？這個大前提不解決，配合它的電碼就無從編定下來。

（二）漢字簡化後，到底還不是純粹表示音節的符號（我們不能走音節文字的彎路，這且不論），儘管提倡同音假借，但是形聲字仍佔絕大多數，因此每個具體的漢字還是不得不有一個特定的號碼；並且估計後選定的漢字決不會少於幾千，那麼，編出來的號碼還是四位數目，同樣不便學習和使用。

（三）由舊四碼改成新四碼不但沒有意義，而且對於已經熟悉舊四碼的人（尤其是從事譯電工作的人）又要從頭學起，增加困難，在工作上造成混亂。

我們期待實現拼音文字。只有拼音文字才能解決電碼的困難。

電碼的性質和文字的性質不同；文字改革可以而且應該由六書體系過渡到拼音方向，而傳遞文字的電碼只能緊跟着拼音文字的實現，直接採用拼音文字的電碼。

這樣說來，電報業務是否就不能配合漢字簡化運動呢？也不是。在與公眾接觸的一面來說，目前可以這樣做：

（一）對於譯送來報，以及郵電企業對外文件的用字，都按照選定的簡體字和正體字書寫。

（二）編印一個《選定簡化字的電碼檢字表》，便利發電用戶翻譯電報；但是簡化後的各個漢字仍舊保留原來各個漢字的電碼，並不變動。例如“並”（0017）



化後作“井”，電碼仍是0017。

(三) 在再版印刷《標準電碼本》的時候，作下列的修定：

1. 把簡化字印在原字上面，原字電碼不動。
2. 把由異体字中選定出來的正体字保留下來，印在其餘被廢除的異体字上面，同時在各個異体字的電碼上加印黑綫，表示這個電碼以後停止使用。
3. 把同音假借的簡化字作為選定出來的正体字處理，並且把這個簡化字印在原字上面，同時在原字的電碼上加印黑綫，表示這個電碼以後停止使用。
4. 如果由異体字中選定出來的正体字在電碼本中原來沒有，就把這個正体字印在那個被廢除的字上面，但電碼不動。
5. 把上述第(二)項的《選定簡化字的電碼檢字表》加以增訂，作為這個再版電碼本的附錄。

## 五

電報是文字应用到現代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電報是傳遞文字的一種工具，是配合文字來服務的；怎樣的文字，產生怎樣的電報。東北鐵路在拉丁化新文字電報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績，證明電報同樣可以為拼音文字服務，而且服務得更好。

關鍵不在電報是否能够採用拼音文字，而在是否有這樣或那樣一種通行的拼音文字，在全國範圍內或專業範圍內被大家所採用。

在電報專業的內部，就有幾個方面是並不採用四碼的，因為四碼不方便。內部公電往來，机上談話，用英文；傳遞局名，也是拼音方式。用的什麼字母呢？拉丁字母。這就好办了，如果說電報採用拉丁化新文字，在技術上問題不大；這個过渡比較容易，只看採用怎樣一套拼音方案，和工作人員怎樣熟悉這一方案。

電報業務內部工作用英文是不對的，应用拉丁化新文字來替換，先从机上談話用語着手編擬是可能的。局名拼音也要走這個方向，使拉丁化新文字電報能够先从郵電企業的內部開始試行，以便逐漸取得經驗，作為日後推及全面的參考。

## 第一、二批試用簡字表

北京一部分出版印刷業从八月十五日起在書籍報刊上試用第二批簡化漢字84個，連同五月一日開始試用的57個簡字，共有141個。現在把第一、二兩批試用的141個簡化漢字列表如下：

## 第一批試用簡字

刘(劉)	机(機)	听(聽)	选(選)
劝(勸)	权(權)	胆(膽)	还(還)
团(團)	欢(歡)	与(與)	边(邊)
压(壓)	灯(燈)	艰(艱)	医(醫)
学(學)	独(獨)	万(萬)	铁(鐵)
实(實)	献(獻)	苏(蘇)	双(雙)
宝(寶)	当(當)	处(處)	难(難)
对(對)	尽(盡)	号(號)	响(響)
从(從)	礼(禮)	觉(覺)	头(頭)
应(應)	称(稱)	观(觀)	养(養)
战(戰)	种(種)	証(證)	体(體)
担(擔)	粮(糧)	丰(豐)	党(黨)
敌(敵)	才(纔)	办(辦)	
会(會)	声(聲)	这(這)	說明
东(東)	联(聯)	过(過)	( ) 內是作廢的字。

## 第二批試用簡字

乱(亂)	坏(壞)	断(斷)	灶(竈)	邮(郵)
个(個)	寿(壽)	晒(曬)	窃(竊)	陈(陳)
备(備)	夺(奪)	条(條)	筹(籌)	际(際)
伤(傷)	奋(奮)	荣(榮)	罢(罷)	虽(雖)
侨(僑)	妇(婦)	样(樣)	罗(羅)	离(離)
伪(偽)	帮(幫)	标(標)	义(義)	电(電)
仨(仨)	庙(廟)	桥(橋)	兴(興)	灵(靈)
优(優)	弯(彎)	档(檔)	举(舉)	齐(齊)
剧(劇)	爱(愛)	歼(殲)	盖(蓋)	
剂(劑)	态(態)	气(氣)	荐(薦)	
务(務)	惨(慘)	济(濟)	虫(蟲)	
劳(勞)	怀(懷)	洒(灑)	蝇(蠅)	
势(勢)	惩(懲)	营(營)	蚕(蠶)	
协(協)	恋(戀)	为(爲)	蛮(蠻)	
参(參)	扫(掃)	尔(爾)	变(變)	
乔(喬)	据(據)	环(環)	赶(趕)	說明
坚(堅)	拥(擁)	画(畫)	辞(辭)	① 本批簡化漢字
执(執)	挤(擠)	众(衆)	运(運)	84個；
垫(墊)	拟(擬)	碍(礙)	远(遠)	② ( ) 內是作廢





推行以後，收到很大效果。

由於對於發報改進了寫法，音段明確，詞兒連基本上解決了到報譯電的困難。

電報略号明確。因為拉丁化新文字電報寫法体式兒連寫的，編制了字母中間加圓點、加短橫、站名用三個字母。它的最後部的字母是不能單獨構成的聲母，這樣就明確了電報略号的個性，根本地解決了注音字母時期在略号上不能解決的混亂問題。

中國鐵路電報工作人員，歷來就要學會拉丁字阿拉伯數字電報符号。使用注音字母時期，又必外記憶一套注音字母的電報符号。推行拉丁化新電報以後，不是加重負擔，而是減輕一種符号的負擔。

節省紙張。注音字母電報使用的紙張，每字佔一兩字中間有一定的距離，每封電報平均2.5張。拉丁化新文字電報，詞兒連寫，字間緊湊，每封平均1.4張紙。

拉丁化新文字電報可以直接利用既有的快速電報設備，大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拉丁化新文字電報在東北鐵路推行一個時期以後，由於人員的流動，學習過拉丁化新文字的人員日少，而日常生活的書報中都是漢字，只是電報上拉丁化新文字，很多人不是經常利用電報；因學過的人，對這種文字也就逐漸生疏，以致忘。在這種情況之下，很多單位把電報交給專人辦理，而這些人員並不具備本單位各項業務上的全面知識。在發報譯電時，只能依照原稿拼寫，結果就不到語文一致，改變文言字眼，因而到報譯電感受困難。這種問題，主要地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 同音詞

對於用戶（經辦人）自己直接寫、看電報的時候，本身業務範圍內一些事物，具備已知條件，不感覺詞是個問題。缺乏已知條件，譯電上對同音詞確是一個問題。如：“吊車”和“調車”、“土斗車”和“瓦車”、“鉛字”和“鉗子”、“電材字”和“電財字”、“工員”和“記工員”等等。

#### 特殊名詞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名詞，外人根本無法譯出原來字。如：xeshui=渴水，kaibici=開閉漆，bian=扁鐵，giaogang=角鋼，lun'yan=輪緣，lundui=輪，tungkuang=銅框等等。

#### 詞

我們知道用漢字寫文章，只有字句組成沒有詞兒之分。拉丁化新文字電報要詞兒連寫，只在寫法上簡單地說了一下詞的性質。究竟怎樣算一個詞？並沒有具體規定。那麼“主任”是名詞，“工程師”是名詞，“主任工程師”也是一個名詞，寫成zhurhen gongchengsh？還是寫成zhurhen-gchengsh？如果分開寫，主任是主任，工程師是

工程師，不能代表一個完整的名詞；如果應當連寫的話，那麼對於“技術教育推行先進工作方法合理化建議工程師”的一個職名，寫在一起太長，如果分開寫就失掉一個名詞的完整的意義。

哈爾濱有一條“極樂寺街”，在這條街上有一個技術學校。教育處通知各地學員“來極樂寺街技術學校報到……”，發報寫成“……lai gile shgie……baodao……”，到報看成“來極樂世界……報到”。由於當時對於分詞方法沒有明確的規定，形成這樣一個笑話。

所以能夠產生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擬定計劃的時候，認為用戶（經辦人）親自寫看電報，他們具備已知條件，同音詞不成為問題。試行以後，因為電報不多，人員流動頻繁。拉丁化新文字不是日常生活上的應用文字。因為這樣，就無法鞏固用戶親自看、寫電報的條件，收發電報勢必成為專人工作。因此，不能不暴露了同音詞的問題。為了保證鐵路通信工作，解決同音詞的問題。1951年9月6日，鐵電業(51)字第147号部令第15條規定了“對於收發報人及電文中的人名、地名、商名和生疏的或容易誤解的名詞、術語，可參用漢字（四碼）。用這種措施解決了同音異字的問題。

#### 電報机上談話

擬定拉丁化新文字電報方案的同時，制定了電報机上談話略号。實行初期，因為拉丁字母和注音字母併用，在電報上談話也是兩種字母。當時，電報員對於拉丁化新文字還不如注音字母熟練，利用拉丁化新文字談話的很少。在這兩種字母併用的過渡時期，雖然彼此有時各用一套字母談話，甚至在一次談話中有時一部分用拉丁字母，一部分用注音字母，因為雙方都具備已知條件，互相是可以理解的。也有不能立即听懂對方的談話，反問一下（費些時間）也就懂了。以後，拉丁化新文字電報逐漸推廣，以至最後全部代替注音字母為止，電報机上談話的文字基本上用了拉丁化新文字。

### (三) 今後的办法

#### 徹底解決同音詞

東北鐵路為了解決同音詞的問題，對於必須表示出來一定的漢字的詞，參用了四碼，這只是一種暫時的办法。為了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應該統一編制“拼音定型字”，在原有的拼音後面加上不能構成音段的聲母。這樣，既能拼音又能表示出來一定形狀的漢字，可以解決了拉丁化新文字電報存在的根本缺點。

#### 鞏固既有成績，創造條件，逐步推廣

拉丁化新文字既然能夠拼寫中國語言，又能表示一定形狀的漢字，通報效率又高（根據1955年1季度，東北地區[新文字]和關內地區[四碼]的比較，把電文用拉丁化新文字發報，每小時為147的話；把同樣電文用四碼發報，每小時為100），所以希望有關通信部門共同研究推廣。

# 关于解决拼音电报中的同音字問題

張 雁

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電務局所作的“东北鐵路電報改革工作的經驗總結”，很明顯地告訴我們东北鐵路上使用的拉丁化新文字拼音電報確實是好的，比注音字母的和四碼的電報強，效率又高。這是值得全國電報通訊部門注意和學習的。

但是在正式拼音文字還沒有建立起來，使用漢字書面語的現況之下，其中有一個同音字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他們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臨時規定摻雜四碼的辦法，限於人名、地名和一些專門名詞等需要標明其所代表的漢字，避免發生錯誤的時候使用。例如：

Willao zhangwo 3265 3055 cingkuang, mei-10  
tian jao tichu shumian baogao.

爲了掌握、渴水情況，每十天要提出書面報告。

Pai 2799 2504 2494 t-zh ky bgn kaixui.

派楊春明同志去北京開會。

〔註〕bgn 是鐵路上規定的 Beiging (北京) 的專用略號。

從這情形看，摻雜四碼使純拼音的明碼電報，變成一種不純的拼音而帶有密碼的電報（四碼的實質是密碼），而且四碼摻雜在裏面，很容易和一些數詞相混，實在不是一個好辦法，需要另想辦法來解決。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爲此問題，曾邀請鐵道部、郵電部、新華通訊社等電報工作的同志共同來研討，認爲在拼音電報中要解決同音字的問題，根據國內外一些熱心人士的意見，惟有在同音字的拼音(音段)末尾附加區別同音字的符号(特定的字母)比較妥當；但這種區別同音字的符号，必須不是能單獨使用的字母，而且要規定它在這上面是不發音的。首先確定了這條原則，接着選定了 b p m f v d t l k x 十個字母，作爲區別同音字的符号。這些區別同音字的符号如何編排使用，必須編出一本檢字來作依據，於是決定編一本“拼音電報檢字手冊”。其第一部分是從拼音查漢字，內容是這樣：

把電報電碼本上所應用的漢字（根據漢字簡化廢除異體字和現實需用的情況，將有所增刪），分別照拉丁化新文字字母表的順序排列在 27 部四百幾個音段裏，每個音段裏的漢字，常用的排在前面，他的排在後面，依次排號，利用 b p m f v d t l k x 十個字母代表 1 2 3 4 5 6 7 8 9 0 十個數目。這樣每個漢字都有一個區別同音字的符号。從 1—9 的字只有一個區別同音字的符号；從 10—99 的漢字用兩個區別同音字的符号。個別音段的漢字特別多有超過 99 的，那就用三個區別同音字的符号，不過這些字都是罕用字，將來是要淘汰的。

爲使習慣於四碼的電報工作同志使用上方便見，該手冊編有第二部分，就是從漢字查拼音，內是這樣：

把電報電碼本上所應用的漢字，按原來的四碼 0001 到 9999 排列，每個漢字註有拉丁化新文字拼音(音段)和附加區別同音字的符号。

區別同音字的符号在電文中究竟如何運用，在手冊第三部分“拼音電報方案”的“寫法規則”第十條有詳細規定。主要是這樣：在人名、地名、某些專門名詞、文言字、對稱意義容易混淆的字和其他容易混淆的同音字，需要明確譯出其所代表的漢字，避免發生錯誤的時候，就可以在音段末尾附加區別同音字的符号來寫（多音段的詞兒，可以把各個音段連區別同音字的符号分開來單獨寫），一切當依“拼音檢字手冊”規定的爲準。

根據以上所述，拉丁化新文字拼音電報的同音字問題，無疑地已經得到比較好的解決辦法了。然，在現階段說，這個辦法，僅僅是一個改良的辦法。东北鐵路電報採用了這個辦法之後，摻雜四碼辦法就不需要了，即可改變成爲一種純拼音的明碼電報了。由此，也給四碼電報改爲拼音電報造成了便利的條件，用四碼電報的部門就可以考慮來採用拼音電報了。



# 談談科學用字的同音代替

劉澤先

如果您離開書本堆兒出去，深入到老百姓羣兒，您就會看到老百姓是多末喜歡“同音代替”。比方貨公司裏就普遍使用“水呼（壺），粉卜（撲），羅絲，且（蛋）糕，并干（餅乾），平（蘋）果”等等。

雖然民間早就廣泛地應用了同音代替，可是知識圈子，印刷品上使用得還不算多。從這方面說，我們經驗也許有人認為還嫌不夠。那末，日本人的經驗值得我們參考一下。我們從近年來日本比較正式印刷品上，也可以見到許多同音代替字，比方，（吡）素，万才（歲），義（蟻）酸，希（稀）酸，蒸留水，弁（辯）証法”等等。

這次簡化漢字是文字改革的第一步，我們認為，同音代替是最富改革性的措施。

通過同音代替，人們才會更清楚地認識到文字只表音就夠了；也就會逐漸改變“望文生義”的習慣。有了這種認識和改變，文字拼音化才能比較順利進行。

因為文字拼音化基本上就是同音代替的最高發

我們認為下列的字（主要是自然科學用字）應當用同音代替的辦法簡化：

版——用“板”代替。“版”字根據《康熙字典》的記載，《廣韻》上說“同板”，《集韻》上說“或作板”。《辭源》也說：“與板通”。可見“板”字是可以代替“版”的。

板——還原成“板”。科學家認為“金屬板”的“板”用金字旁，這個原則未免太不科學化了。如果根據這個原則，我們要問：“玻璃板”、“蜡板”、“紙板”、“石棉板”、“洋灰板”、“橡皮板”、“塑膠板”等“板”該用什麼偏旁呢？

銀——用“貝”代替。前者常說成“銀元素”、“金銀”、“銀鹽”、“硫酸銀”等，後者常說成“寶貝”、“虎”等，兩者不會混亂。

狼——用“貝”代替。前者目前只常說成“狼狽”，兩者不會混亂。

呎——用“尺”代替。前者《康熙字典》裏沒有，是人工造的字，作為英文 foot, feet 的譯名，日本人讀英文的音念。這個字他們現在也不大用了。在我

國，為了清楚，一定要說成“英尺”才行，那末，寫成“英尺”不是很好嗎？

汽——用“氣”代替。這兩個字在實用上根本沒有區分的必要。

氫——還原成“輕”。從前的老譯名“輕氣”、“輕氣元素”、“輕化物”、“輕養化物”什麼的就足夠清楚，“氫”字沒有存在的必要。

吋——用“寸”代替。《康熙字典》上雖然有“吋”字，但是那完全跟現代的念法和用法不是一碼事。“吋”字用作英文 inch 的譯名，那是日本的辦法，他們就按英文的音念。這個字他們現在也不用了。我們說的時候總是說“英尺”，那末，寫成“英寸”不是很好嗎？

氮——還原成“淡”。原來的譯名“淡氣”、“淡化物”就很清楚，“氮”字可以取消。

碘——用“典”代替。前者常說成“碘片”、“碘元素”、“碘酒”、“碘化物”、“碘酸鹽”什麼的，跟後者的用法“字典”、“典當”什麼的不會混亂。

痘——用“豆”代替。前者常說成“牛痘”、“牛痘苗”、“水痘”什麼的，不會跟後者弄亂。

砒——用“法”代替。前者只用於“砒碼”，所以不會跟後者的用法混亂。

醱——用“發”代替。這個字根據《康熙字典》的記載，應當念“撥”，可是大家早把這種念法忘光了。它只用在“醱酵”裏，而這個詞兒也常常寫成“發酵”，所以“醱”字是可以廢除的。

番——用“番”代替。後者只用在“幾番”、“番號”、“番茄”等裏面，跟前者的用法沒有什麼衝突。

氟——還原成“弗”。日本人的經驗證明這樣用沒有什麼不好。近來日本人甚至把它寫成“沸”，也不引起誤會呢。

沸——用“弗”代替。這個字本來念  $fèi$ ，但是現在普遍地都念成“弗”（ $fú$ ）。“弗”在口語裏本來不大用，所以用它來代替“沸”和“氟”也不會混亂。日本人現在用“沸”不用“弗”。

鈣——用“丐”代替，或者最好是用舊譯名“石灰（質）”。

坭——用“甘”代替。它只用在“坭塢”裏。

慣——用“貫”代替。“慣”字，《康熙字典》上說：“又通作貫”；“貫”字，《辭源》上說：“與慣同。《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

鍋——用“鍋”代替。它只用在“坭塢”裏，寫成“甘鍋”是完全可以的。

氧——还原成“養”。原來的譯名“養氣”、“養化”什麼的非常好，沒有用“氧”字的必要。

瑯——用“郎”代替。在口語裏它只用在“瑯瑯”這個詞兒裏，簡化的理由已經在前面“瑯”字項下解釋過了。

螂——用“郎”代替。“樟螂”、“螳螂”寫成“章郎”、“堂郎”不會引起誤解。

理——用“里”代替。“里”是長度單位，用法不會跟“理”混亂，所以可以代用。“里”雖然又和“裏”通用，可是“裏子”、“裏面”、“裏外”、“屋裏”等用法也不會跟“理”字相混。

鯉——用“里”代替。它只說“鯉魚”用。

哩——用“里”代替。這樣代替以後，用在字尾作感嘆詞自然不會跟“理、裏、里、鯉”混亂，而學日本人用在 mile 的譯名裏，寫成“英里”也不會引起誤解。

涇——用“里”代替。用作長度的單位寫成“海里”是完全可以的。這種用法原來也是日本人想出來的。

磷——还原成“磷”，完全沒有問題。

氯——还原成“綠”，說成“綠氣”、“有效綠氣”、“綠化物”、“綠酸鹽”什麼的，不會引起誤解。栽花栽樹來“綠化”環境跟有機合成上的“綠化”(chlorination)由於說話的條件不同，也不會弄亂。

膨——用“彭”代替。“膨脹”寫成“彭漲”是完全可以的。

硼——用“朋”代替。前者是化學元素，後者只用在“朋友”裏，所以是不會混亂的。

棚——用“朋”代替。“頂棚”、“帳棚”、“棚子”不加木字旁也不會引起混亂。

稀——用“希”代替。後者差不多只用在“希望”裏，所以前者簡化了也不會弄亂。

橡——用“象”代替。前者差不多只用在“橡皮”、“橡皮樹”、“橡膠”等詞兒裏，所以容易區別出來。

酵——用“孝”代替。“醱酵”、“酵母”、“酵素”寫成“發孝”、“孝母”、“孝素”就行。“孝母”也不會誤會成“孝順母親”，因為我們不把“孝順母親”說成“孝母”。

嗅——用“臭”代替。“臭”字，《康熙字典》上說：“與嗅通”，這兩個字實際上也不會混亂，所以可以代用。

溴——用“臭”代替。這兩個字《康熙字典》和《學物質命名原則》上都說同音。不過《康熙字典》上說“尺又切，音臭”；而《化學物質命名原則》上說溴“T臭”。日本人就用“臭”來作這元素的名称，單獨說的時候說成“臭素”，並沒有什麼問題。

胸——用“凶”代替。“胸”字根據《康熙字典》記載，《說文》本作“匈”。“胸”是生理學上的名詞，“凶”是形容詞，所以共同用一個字代表也不會發混亂。

颶——用“台”代替。“颶”字《康熙字典》裏找到，這個字的來源我們還不太清楚。有人說中國的“風”被外國人音譯成 typhoon, typhoon 又回到了中國被翻譯成“颶風”。有人說是來自希臘文 tuphos, 來到阿拉伯寫成 tūfān, 再到荷蘭和英國變成了 typhoon, 到了中國譯成“颶風”。又有人說“颶”字是根據“台灣吹來的風”這意思造的。《Словарь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лов》上說 тайфун 這個字是由中國來的。不管怎麼說，這個詞兒寫成“台風”是足夠清楚的。

碳——还原成“炭”。從化學應用的觀點上看，兩個字也是沒有分別的必要的。日本人就只用“炭”來代表這種元素，單獨說的時候說成“炭素”。我們即使看很複雜的日文化學書，也從來不會引起疑問：是學元素，還是燃料的炭？

糖——用“唐”代替。後者現在只用來指朝代，而且用的時候總說成“唐朝”，所以不會跟前者弄混。

醣——用“唐”代替。“醣”、“糖”在化學上根本不著區分，理由和“碳”、“炭”不必區分相同。Carbohydrate 過去採用日本譯名“炭水化(合)物”或“含炭素”就滿好，再不然說“糖類”也行，何必造一個“醣”字呢？

搪——用“唐”代替。“搪”字根據《康熙字典》“亦通作唐”。《辭源》上說，“搪突亦作唐突”，“搪”本作唐塞，可見這兩個字不必區分。

塘——用“唐”代替。“池塘”、“水塘”不寫土字旁不會引起誤會。

澹——用“唐”代替。“澹心兒的雞蛋”寫成“唐心兒的雞蛋”，誰都明白。

棠——用“堂”代替。前者現在只用在“海棠”、“梨”等植物學名称裏，寫成“堂”沒有問題。

螳——用“堂”代替。“螳螂”寫成“堂郎”就行。

膛——用“堂”代替。“胸膛”寫成“凶堂”也不會引起誤解。

蛔——用“回”代替。“蛔蟲”寫成“回蟲”也不會引起誤會。



茴——用“回”代替。“茴香”寫成“回香”也不會引誤會。

迴——还原“回”。根據《康熙字典》的記載，古時本來只有“回”字，“迴”字是後人分化出來的。“迴”等詞凡用“回”字也一樣清楚。

詐——用“乍”代替。“詐”字《辭源》上說：“与乍”。“乍”字多半用作副詞，而“詐”字多半用在“敲詐”、“詐騙”等詞裏，不會弄亂。

炸——用“乍”代替。“炸彈”、“炸藥”、“炸丸子”裏的用“乍”字都很清楚。“炸丸子”的“炸”字跟“乍”聲調雖然不同，但是那是不重要的事。

炸——用“乍”代替。“炸腮”寫成“乍腮”就可以。

蚱——用“乍”代替。“蚱蜢”，“蚱蟻”用“乍”字足夠清楚。

搾——用“乍”代替。“搾”字是日本人造的字，《康熙字典》裏是找不到的。“壓搾”、“搾取”、“搾菜”什的用“乍”字不會引起誤會。

樟——用“章”代替。前者只用在“樟腦”、“樟木”、“樟樹”等詞裏，跟後者的用法不會相混。

脹——用“漲”代替。本來這兩個字的意思就差不多，“膨脹”也有寫成“膨漲”的，所以“脹”字取消也不緊。

颶——用“具”代替。“颶風”寫成“具風”不會引起解。

上面這些字不過是一小部分例子。這些例子說，這次公佈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還有很大的擴展

餘地，或者說有很多遺漏。

我們應當指出，上面這些例子選擇得很“保守”。所有這些例子都保留了原有的聲符，從改革性來看，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姜薑、凡礬、谷穀、玉鬱、斗鬥”這些。但是也正因為是這樣，我們認為它們是比較容易推行的。

擴大來說，我們認為聲符相同的字都可以考慮合併（要根據聲符在現在的作用會不會混亂等方面來考慮）。

我們完全贊成那些富於改革的同音代替字。但是我們認為這些容易推行的同音代替字更應大量採納。

更值得重視的一件事是不應當忘掉自然科學用字的簡化。如果這次的漢字簡化把自然科學用字排除，我覺得那是一種錯誤。因為目前自然科學用字上的毛病最大、最深，這點語文工作者都有認識。固然，自然科學用字的問題並不簡單，但是初步簡化的時候是不應當不管的。

我個人估計，這些字的簡化，在推行上還不致於有什麼困難。可是，就這一小部分自然科學用字推行了的話，所收的效果會是很大的。它會讓科學界認識到一件新的事情，——文字改革。它會讓自然科學工作者開始改變了過去對於命名上的錯誤認識，而從造字的歧路上回過頭來。

我認為如果自然科學工作者能改變了對文字改革的態度，我們的文字改革的偉大事業就一定能夠順利進行。

1955年3月30日

##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 即將召開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正會同有關方面加緊籌備在今年八月中旬召開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會議的主要任務是討論漢語規範化的原則和如何建立標準漢語語音方面的明確規範。對標準語的語法和詞彙等方面的規範問題也將在會上提出報告，組織討論，指出解決的方向。這次會議對於確立漢語標準語的規範和推行標準語將要起一定的作用。通過這次會議也可以組織全國的語言學界推動研究工作，開展語言學上某些重要問題的自由討論。會議將邀請國內各地與語言規範問題密切有關的單位代表和個人出席，其中包括語言學者、語文教師、作家、廣播、戲劇、電影、曲藝、編譯等方面的工作者和政府文教部門的代表。

隨着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不斷高漲，隨着社會文化生活的內容日益豐富，我們擁有五億多人口的漢民族不能不有一個統一的共同的規範明確的標準語。有這樣的一個標準語，各方言區之間才能充分交流思想，政府才便於順利進行宣傳、教育工作，我們的建設事業才不會因為語言的隔閡而受到某些障礙，國內各兄弟民族和國外友人學習漢語才有明確的準則，我們的文字改革在語言方面才有所依據。語言是人人都要使用的，因此，語言規範化不只是少數語言學家的事，而是我國當前社會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每個人都應該關心的問題。

#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 (六)

## 語文知識講話

苏联 A.A. 龍果夫

### 動詞內部的特殊的詞義·語法範疇

#### 非動作動詞

91 正如名詞範疇一樣，一般的動詞範疇的內部又可以分爲若干特殊的詞義·語法範疇。

在動詞範疇之內，首先可以分出雖然爲數不太多，可是不論從意義方面看或是從語法方面看都十分明顯地可以劃出來的一組動詞，這些動詞不表示動作，因而“主語做什麼？”的問題，對它們是不適用的。這組動詞包括：

a) 思想和感覺的動詞：“知道，認得，認識，懂，明白，思量，害怕，羞，愛”，等等；

b) 狀態動詞：“疼”；

c) 語氣動詞：“能，願意”；

d) 半實詞性的動詞：“在，姓，像”。

這一類動詞，我們以後將稱之爲非動作動詞。<sup>①</sup>

因爲這種動詞不表示動作，它們不允許有數量上的變化，所以很少跟加於動詞的計算詞放在一起 (§§ 74, 93)。例如：“看”可以說“看 (一)-看”，“走”可以說“走 一-走”，可是不能說，“\*知道 (一)-知道”或者“\*能 (一)-能”等等。在這方面，非動作動詞在動詞範疇之內所佔的地位和不容許個別計算的名詞在名詞範疇之內所佔的地位一樣 (§ 23)。其次，這類動詞還有一個特徵，就是不容許具有動作動詞所具有的質量。結果的變化，因此不能構成可能式 (§ 94)。

在甘肅和陝西方言中，用這類動詞作成的謂語通常帶上語尾“呢”(現在-將來時，見 §§ 128, 129)，並且在特殊的上下文裏，還勉強可以帶上語尾“着呢”(—дннн 或 —чжэни，指說話時的現在時，見 § 138)。後者只當遇着兩種平行進行的過程時，才有可能(現在相對時，見 § 138)。例如：“我知道呢”，但“我也知道着呢”。

非動作動詞的另一特點是和上述的特點联系着的。既然否定詞“不”和“沒”同語尾“呢”和“着呢”形成一個系統，那末，很自然地，非動作動詞容易和否定詞“不”(現在將來時)結合起來，而比較難同否定詞“沒”

(指說話的時候)結合起來。我們可以在用動詞“看”的時候見到一些猶豫不決的情況(在白話中)：對“他在家嗎？”這個問題可以回答“他 不 在家”，也可以回答“他 沒 在家”。

助詞“了”在非動作動詞後面永遠具有句子的(語氣·時間的)意義而沒有動詞的(結果·時間的)意義，它表示對比的意思，即從一種情況轉變爲另一種情況。“有 了”(早先沒有而現在有)“會 說 俄國 話 了”(早先不會說俄國話而現在會了) (§ 114)。

由於同一原因，非動作動詞的名詞形式(帶語尾“的”)用做謂語的時候，總是只有語氣的意義 (§ 77)，不轉變爲過去時的範疇。我們可以从語氣·時間關的觀點來比較：“他 也 知道的!”(語氣性“的”)“他 八點 鐘 吃的 飯”，或者“他 也 來的”(時間性“的”，過去時)。

這類動詞裏有的具有名詞性質，這也同缺乏動作的性質相關。例如，在許多山東方言裏，像“知道”動詞的主語如果是代詞，常常可以領格語尾“的”，如不但可以說，“他 知道”也可以說，“他的 知道”。這種主語的採取領格形式是同動詞缺乏動作的性質相關，這件事可以用下面的事實來證明，就是，在這方言中，這樣的結構在動作動詞那兒也是可能的，是只在帶有否定詞的時候，也就是說，恰好當動作發生的時候。例如這些方言裏可以說，“他 不 去”也可以說，“他的 不 去”。

在甘肅方言中，這些動詞由於它的意義(無動作)能直接加用表示過去狀態的語尾“來”而動作動詞則要求先加上名詞語尾“的”，然後才能加上“來”。我們“知道 來”，“有 來”，但動作動詞只能說“唸的 來”或“唸書的 來”。在這方面，由非動作動詞作成的語和由名詞或形容詞作成的謂語相類似，例如：“十 年 之前，我 是 一個 青年 小伙子 來”“октябрь революция 的 之前 俄羅斯 工人的 陰 都 難 來”。

① 關於這些動詞，請看作者的專刊《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бласти дунган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Тр. Инс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27 卷, 51—56 頁, 1940。



这些方言中，由这一類動詞作成的謂語往往不要一定加用謂語語尾以取得一定的形式構成。例如：我知道(呢)“他 会 說 俄羅斯 話(呢)” (§§ 23, 129)。

92 非動作動詞本身的內部又可分為若干組，每組有它自己語法上的特點；特別是半實詞性的動詞在這裏面形成特殊的一組：“姓、像、在”，等等。

他 姓 馬。  
不 像 老虎。  
他 在 北京。

半實詞性動詞的語法上的特點是：保持自己的聲調(“像”去聲，“在”去聲，“姓”去聲)，可是不容許有形態上的構成，特別是不能加名詞語尾“的”。它們的第一個特點使它們接近實詞，而第二個特點使它們接近虛詞。

繫詞“是”近似這些半實詞性動詞，也有它自己的特點(當然，並非永遠如此②)，可是不能加名詞語尾“的”。但是繫詞“是”跟這一類動詞又有所不同，因為它不是動詞，所以除了單純的連繫作用外，它還可以表示語氣兼連繫的作用，而後者又可以用它的起源於動詞來解釋。

### 動作動詞

#### 數量的變化

93 跟非動作動詞不同，動作動詞首先具有允許各種數量變化的特點。這些變化或藉助於動詞詞根的重疊來實現(看~看看，走~走走，商量~商量-商量)③，或藉助於加於動詞的計算詞來實現。按俄語，我們說“звал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посмотрел один раз”，按漢語，則說“叫了 好幾聲”，“看了 一眼”或者“看 一看”，等等。

加於動詞的計算詞按意義和語法性質為三個基本組。

第一組。計算詞就是動詞詞根用為計量單位。如：看了 一-看“想了 一-想”。這一組的計算詞能加在動詞語尾“兒”，也就是說，能說“看了 一-看兒” (§ 58)。

第二組。計算詞是名詞性的詞根，它在某一方面與那個動作在語義上密切地聯系着：這多半是動作的工具，較少的是動作的對象，例如：“幫了 一-手”，“對 看了 一-眼”，“打了 他 一-針”，“放了 三-槍”“救 我 一-命”(比較“救命”)。

跟第一組計算詞不同，這一組計算詞在一定程度上

上是類別詞 (§§ 19-21)。例如凡是跟計算詞“聲”用在一起的動詞，它們的動作都密切地跟聲音相聯系，因而這些動詞在這個關係上形成了一個特殊的詞義。語法組：屬於這一組的動詞有“喊，叫，喊叫，吶喊，喝，說，罵，言語，唱，答應，笑，哼”，等等。表示觀看意義的一些動詞構成另外一組，語法上由計算詞“眼”聯合起來，例如，“看，望，瞪，瞥”，等等。可是跟名詞的情形不同，在動詞內部，這樣的小組，或者更精確一點說，詞義·語法組，不是那末多；有些計算詞的使用限於一兩個動詞。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計算動作比計算事物稀少得多。

第三組。跟上面兩組不同，這組計算詞是嚴格意義的度量單位。它們裏面除了“次”這樣最中性的以外，大多數(場，頓，番，趟，通，遍，等等)還在一定程度上表示長度，因而也表示動作的強度，而與此相聯，往往帶有感情色彩 (§ 22)，例如：

② 例如在指示代名詞作主語的時候，系詞“是”就失去自己的聲調——比較“這<sup>4</sup> 是<sup>1</sup>他<sup>1</sup>”和“這<sup>4</sup>個<sup>2</sup>人<sup>2</sup>是<sup>4</sup>學<sup>2</sup>生<sup>2</sup>”。

③ 重疊動詞詞根，在不同的上下文，可以表示：a) 動作的加強，或 b) 動作是減弱。比較下列例句：

a) 這 一點 咱們 得 好好的 想<sup>想</sup>。

所以 不 能 不 看<sup>看</sup> 他的 說法。

b) 我 昨天 早晨 出去，到 樹林子裏 去 走<sup>走</sup>。  
吃過了 晚飯 休息-休息，到 十點 三刻 睡覺。

有意特別強調動作的加強(多次性)的時候，可以在第二個動詞詞根前面安上副詞“又”，例如：“他 想了 又<sup>又</sup>想”。

相反，需要強調動作的減弱(一次性)的時候，可以在第二個動詞詞根前面安上數詞“一”，這第二個詞根就作計算詞用，例如：

假如 查 一-查 Legge 輯的 段 玉裁 《詩經 韻類》……。

你們 下 課 以後，也 要 唸 一-唸，寫 一-寫，不 要 忘了！

用動詞詞根重疊來表示動作的加強和減弱(“強度體”)，僅僅是文學語言的特徵。在口語裏，尤其在方言裏，有明顯地表示出來的一種傾向，就是強度體只有一個意義——動作的一次性或是動作的減弱的意義。這種過程在甘肅省某些方言裏發展得特別遠，這裏動詞詞根的重疊[而且中間一定要加“一”，第二個動詞詞根一定要“兒化”，§ 58]只能用在命令語氣的句子裏，例如：“看 一-看 兒！”

把強度體的作用限制在表示動作的一次性和減弱只適用於單音節的動詞，跟雙音節的動詞無關。雙音節的動詞一般不容許在中間加數詞“一”，因此在什麼場合動詞重疊表示動作加強，在什麼場合動詞重疊表示行為減弱，這個問題完全決定於上下文。

在會上他被同志們批評了一頓。  
細細的說了一遍。(熱河)  
他的母親大哭了十幾場，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魯迅：《吶喊》)  
想着出一趟門兒。(熱河)

### 質量變化

94 其次，跟非動作動詞不同，動作動詞允許有各種質量變化，而相應地構成“可能式”。例如：“說得～說不得”，“看得見～看不見”。

受了限制的動詞——例如，“花”+“清”，“花清”，“關”+“上”①，“關上”——由於具有結果的意義，就跟未受限制的動詞不同，很難跟過程的延長性或持續性相容，——這種情況在漢學家的著作裏已經不止一次被注意了。

受了限制的動詞的許多重要的語法特點都是由此而來。例如，它們容易跟表示動作完成的語尾“了”相結合，而跟表示在一定狀態中存在的語尾“着”不相容：可以說“寫上了”，“看見了”，但不能說“寫上着”或“看見着”。根據同樣的理由，受限制的動詞很難和表示說話瞬間的現在時的語尾“着呢”相結合。間或有這樣的例子，但此時的語尾“着呢”已經不是關於動作本身而是關於在說話時已經完成了的動作的結果的存在，例如：

喂！難道二狸還在呢嗎？чжэ強盜還打хэ了着呢。(甘肅)

受了限制的動詞和過程的延續性的觀念很少相容，表現在這件事情上 (§ 110)：和否定詞“沒”不同，否定詞“不”照例不能放在受了限制的動詞的前面，而永遠插入它中間。可是這樣已經不是否定動作本身而是否定這動作足以達到某一種結果的可能性了。可以說“沒寫上”，但不能說“不寫上”而只能說“寫不上”。在稀有的情況下，當否定詞“不”居然放在受了限制的動詞的前面的時候，它們否定的也不是動作本身，而是做出這一動作的願望，也就是說，仍然有語氣的意義，例如：“這烟圈兒總不散掉”(不肯散掉)或者“我把你不放開”(甘肅)(我不願放開你！)②。至於否定詞“沒”用在這些動詞前面，總是只有過去時的意義，而沒有說話瞬間的現在時的意義。

還有可以注意的是，數量補足語和表結果的動詞同用的時候，總是放在動詞的前面，而不是放在它的後面。試比較：

抬起頭來，一眼看見高升，手裏拿着  
兩張名片。(茅盾：《子夜》)：  
張叔叔看了他一眼。(同上)

### 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

95 動作動詞按照其意義和語法特點又分為兩個

基本的類——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及物動詞的點是它要求自己後面有賓語③，而不及物動詞就不求有這個成分，例如：“他看報”，“看”有賓語“他來了”，“來”沒有賓語。

在漢語中，及物動詞十分緊密地和賓語聯系着對於“他在作什麼？”這一問題，俄語可以回答“он читает”，“пишет”，“работает”，“спит”，“рисует”，等等但在漢語這是不夠的，它要求有賓語，也就是說，能簡單地回答“說”，“寫”，“作”，“睡”，“吃”，“畫”等等，而必須說“說話”，“寫字”，“作工”，“睡覺”，“吃飯”，“畫畫兒”。

問題在於，在漢語裏，賓語起着兩種作用——一是詞彙上的作用，就是確定動詞詞根的意義，其次是語法上的作用，就是把動詞性詞素從簡單的動作轉變為語義和語法上的完整體，轉變為及物動詞這特別可以說明為什麼漢語裏有這麼多動詞帶上空洞洞的賓語，這些賓語不給動詞帶來任何新的意義而所以不得不有這類賓語，完全是為了給動詞詞根這種形式構成——“睡覺”，“吃飯”，“畫畫兒”等等。

在漢語中，賓語不僅有詞彙上的作用，而且也形式上的作用(而且常常主要是為了後者)，這可以許多事實證明，特別是拿這些動詞和不及物動詞來較。例如，在許多方言裏，回答問題“他幹什麼？”時，可以用完整的形式——句子——回答，“他看報”，但只能說“他(在)走着”，就是說必須加上示狀態的語尾“着”，使它得到形式上的構成。反過來也可以說，“他(在)看着”，動詞帶有狀態標誌語尾“着”作為必要的形式構成，但是說“他走路不用任何形式構成，因為動詞後面的空洞賓語已經使它一種形式構成了。

在命令句裏，不論及物動詞或不及物動詞，都可以不要形式構成，例如“吃！”，“寫！”，“跑！”，“听！”

96 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之間的區別，也表現在結果動詞的結構上 (§ 94)。為表示主要動詞詞素質量變化而用的絕大多數詞素都是不及物動詞的或是形容詞的(即仍然是不及物的)內容的詞根，像“中，成，破，錯，死，掉，透，開，下，出，來，好

① 比較英語的 up。

② 關於這些動詞，請看作者的專刊《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дунган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Тр. Инс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27 卷，7 頁，1940。

③ 這裏所說“賓語”指動詞後的補足語，能轉變為詞。前置詞“把”的賓語並且連“把”一塊兒放在主要動詞之後作為副動詞性的加語的，例如“我把這本兒書吃了”。



真，够，飽，等等。跟這個相联系的另一情况是：說個明白”這個類型的表結果的動賓詞組裏(30)，賓語也總是由具有不及物動詞或者形容詞內的一些詞來充當。

有些方言裏，來自不及物動詞的形動詞可以名詞化，為名詞，例如(甘肅)：“吃的”，“喝的”，“穿的”(參§56)。來自不及物動詞的形動詞，例如來自動詞“跑的”，來自動詞“來”的“來的”，一般不名詞化，它們能在句子裏擔任各種不同的職務，特別是作主語，但是它們並不因此而成為名詞。

97 跟動詞的及物性和不及物性相联系的還有一事：加詞尾“子”構成的派生名詞絕大多數來自及物動詞，並且表示具體的，有形的事物(§62)：“投子”來自“投”，“剪子”來自“剪”，“錐子”來自“錐”，“盒”來自“合”，等等。

与此相反，加詞尾“兒”構成的由謂詞派生的名詞大多數或是來自不及物動詞或是來自形容詞(§§53, 54)，並且表示抽象的概念，例如：“覺着沒兒”(來自“逃”)，“看了個過兒”(來自“過”)，“了個多半死兒”(來自“死”)，“太陽冒紅兒”(來自“紅”)，等等。

### 趨向動詞

98 从不及物動詞裏又分出不大的但是非常重要一組動詞，這就是表示運動的趨向的動詞：“出，上，下，到，來，去”，還有少數別的。

這些動詞的語法特點是：它們由於本身有結果的義，不能加上表示狀態的語尾“着”，但是很容易跟表示結果的動詞詞素“了”結合(出了門；來了)，也易跟動詞詞素“得”結合，例如在“出得門”，“上得椅子”，“到得大堂”等等狀語裏。

趨向動詞的另一語法特點是大家都知道的：它們能作為限制詞素，不論是加在運動的動詞之後(拿出去，走到)，或是加在其他意義的動詞之後(起來，關上)。在後一場合，這些限制成分中有幾(上，下)有變成“休”的語尾，變成一種“完成體”的傾向。

以趨向動詞為限制成分的複合動詞，語音上的特點是重音在第一音節，就是在基本詞素上，例如：“拿來”，“跑出去”，“關上”，等等，和另一類表結果的動詞如“唸完”或“花清”不同，後者的重音照例是限制成分上面。

趨向動詞(“進，下，起”，等等)和一般運動動詞(走，飛，跑，拿，等等)之間的區別，很有趣的反在甘肅方言裏，在那兒，第一組動詞直接和動詞詞素“和”“去”結合起來(§§99, 100)：可以說“進來了”，“起來了”，等等。第二組動詞就不容許這

樣，必須預先加名詞語尾“的”(造成副動詞·形動詞)。這些方言裏說：“走的來了”，“飛的來了”，“跑的”，“拿的”，等等⑦。

99 在趨向動詞之內，動詞“來”和“去”佔有特殊的地位。

作為複合動詞的限制成分，它們指明動作的方向，或是向着說話者的方面(來)，或是離開說話者的方面(去)，不論是本來意義，例如“拿來”，“拿去”，或是引申意義，例如“想起來”，都是一樣。例如：

但他手裏沒有鋼鞭，於是只得撲上去，伸手去拔小D的辮子。小D一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一手也來拔阿Q的辮子。(魯迅：《吶喊》)

涼風雖然拂拂的吹動他斑白的短髮，初冬的太陽却还是很溫和的來曬他。

(魯迅：《吶喊》)

在這種虛詞作用上，大家都知道，動詞“來”和“去”的語法特點是：能被賓語把它跟主要動詞或其他限制成分隔開，例如：“拿水來”，“掉井去了”，或是被附屬主語隔開，例如：“下起雨來了”⑧。

100 在現代漢語中，不管在日常口語裏還是在文學語言裏，尤其是在文學語言裏，有這樣的傾向，就是利用動詞“來”和“去”作為一種形式的標誌，表示發生在主要動作以前的、有目的的移動(實際的來去或想像的來去)，特別是利用這些動詞來引出表目的的“不定式”，例如：

我出門去買點兒東西。

我舉這幾條例來証明……。

我也沒有功夫來跟你多講了。

在甘肅方言裏，動詞“出”的虛詞作用以幾種另外的方法進行。

在甘肅方言中，經常利用動詞“去”作為限制詞素  
(轉9頁)

⑦ 比較英語的“came running”，德語的“kam gelaufen”，等等。

⑧ 關於“附屬主語”的概念，請看我的論文《О зависимых членах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Изв. АН СССР, ОЛЯ, 5卷, 6号, 484—489頁, 1946。J. Muller 和別的作者們利用“無定性主語”的名稱，這是不成的，因為這隱蔽了這個問題的本質。“客人來了”和“來了客人”這兩個類型的句子之間的根本差別，不在於前者的主語是有定的而後者的主語是無定的，而在於前者是兩部分的句子，回答“誰來了？”的問題，後者是單部分的句子，回答“有什麼事情？”的問題。後一種句子主要是用來對於某一事實、某一現實作不加割裂的陳述，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團。”

“附屬主語”永遠是謂語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有一系列的語法特點使它接近補足語，而它是既可以是無定性的，也可以是有定性的。後者可以下例為證：

這時走來他兒子，郭富貴。(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 漢語拼音文字怎樣處理 聲調問題

——北京語言學界第三次座談會記要——

1955年5月16日，北京語言學界第三次座談會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會議室舉行。依照計劃，這次會議討論的是漢語拼音文字怎樣處理聲調的問題。

會議由中國語文雜誌社章鰲社長擔任主席。

王力先生在會上作了中心發言，要點概括如下：

## 一、理論方面：

1. 聲調是漢語音位的構成部分。從音位學上說，漢語拼音文字是應該把聲調標出來的。
2. 標明聲調可以多一種區別詞形的手段。
3. 標明聲調能指明聲調的種類，從而使人便於掌握聲調的讀法。

## 二、方法方面：

王力先生舉出三種可能的標調法：1. 用專職的字母放在每一個音節的後面；2. 用韻母結構的變化；3. 用符號。在詳細分析比較三種標調法的優點缺點之後，王力先生主張用符號標調法。

關於標調的範圍，王力先生認為，在詞典裏每個詞都要標調，在書報上，就沒有普遍標調的必要。王力先生主張：單音詞標調；複音詞一般不標，只在必要時標出某一音節的聲調。

## 三、對於標準調類的建議：

現代北京話沒有入聲，原來的入聲歸入陰、陽、上、去四聲，和其他方言沒有一定的對應規律，這在學習上有一定的困難；但是這是事實，不應當改變。至於陰、陽、上、去四聲，和其他方言一般都有對應規律，只有少數例外，這種例外是應該也可以減少的。北京話裏的變調，王力先生主張不標。

在會上發言的人一致同意王力先生對於聲調的性質和它在漢語裏的地位的看法，認為聲調是漢藏語系諸語言的一種特徵。聲調在漢語裏是客觀存在的，是語言本質的東西。它和元音、輔音，同是漢語語音的要素。

然而，關於聲調的重要性，大家的意見就不完全一致。因而在拼音文字裏如何處理聲調的問題上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傅鬱勳先生認為，既然聲調在漢語裏有構成音位的功用，就應該在拼音文字上表示出來。從區分詞義的功能來看，在漢語裏聲調的重要性並不次於輔音和元音。這正是漢語的一個特點。假如文字不把這個語言特點表示出來，將是不完善的。在漢語裏，一個音節若不肯定是哪個聲調，在詞義上是中性的；譬如：“ma”只肯定了輔音和元音，它的意義是“媽”呢？是“麻”呢？是“馬”呢？還是“罵”呢？只要根據漢語的特點來統計漢語的音節，就應該計算聲調的區別。這就是說，輔音、元音相同而聲調不同的，應該看做不同的音節。標調還有給詞根定形的作用。如果不標調，漢語裏有許多詞根就會沒有一定的形式，如“買”、“賣”，“矮”、“愛”，……兩兩之

間，輔音、元音完全一樣，形式的不同就全靠標明聲調。此，傅先生主張每個有固定聲調的音節都標聲調，聲調應和詞根結合在一起。他不同意“標一部分”、“在必要時才標”的辦法。他對這種辦法表示懷疑說：“究竟標哪一部分呢？‘什麼時候是‘必要’呢？”“這樣會不會造成詞形混亂的現象呢？”“為什麼語言裏重要的而又是內部一致的特點，不用一的辦法體現在拼音文字裏頭呢？”他說，有人覺得普遍標調有困難，可是不能為了避免困難就抹殺語言的特點，我應該設法克服困難。文字是代表語言的，要是看了文字還在許多情況下猜詳它們的意義，那就是缺點。他舉出袁驊先生等在廣西進行僮語教學的情況為例：當時草擬的僮語方案是標調的，六個聲調都標出來，教師學員並不感到什麼困難；相反地，當沒有標調的時候，學員就捉摸不定。如全部的或許多的詞只在詞典裏標調，則調類和標準音不同地區的漢族人民學習標準音，少數民族人民和國際友人學漢語的時候，每個詞或許多詞都得查詞典才能學會，這是麻煩的。既然是拼音文字，特別是新創立的拼音文字，如不能使人們通過它很便利地學習它所代表的語言，還能算完善的文字嗎？我們的語言文字在國際上的地位已經隨著我們國家的地位大大地提高，如果我們將來的拼音文字不伴我們語言裏現成的一個主要的語音特點，而只把這個特點寫在詞典裏，這是很不妥當的。至於標調的方法，傅先生為附加符號有三個缺點：（1）不好看，（2）打字印刷不方便，（3）書寫麻煩，不能連寫。他主張用字母標調，寫在每個音節的後邊。用字母的好處是能連寫，寫得快，好看，又便印刷打字。當然，這樣做詞形會長一點兒；但是這並沒有大防礙，反正將要有許多詞的音節是連寫的，不可避免地有許多長的字。語言的事實需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就應該這樣做。創立拼音文字是我們國家的一件大事，希望對這個問題詳細研究，展開討論，以便總結出完善的辦法。

陳剛先生在發言裏認為聲調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不把它和聲母、韻母同等看待。文字裏缺了聲母、韻母是不想像的，而不標聲調的文字，像北方話拉丁化方案那樣，大致上能夠辨別認識。陳先生舉例說明聲調的一定的重要性，如果“住址”寫作“ㄗㄣˊㄗ”，“敢幹”寫作“ㄍㄢˊㄍ”，是費錢的，類似這樣的情形，就有必要標出調來。但是，“同音”寫成“ㄊㄨㄥˊㄣ”，“電訊”寫成“ㄉㄧㄢˊㄒㄩㄣ”，人們看了可以得，就可以不標調了。他說，有些字“定調不標符”是可以“調”不妨只在字典上寫出來。陳剛先生主張以北京話聲調為根據，他說，調類不應沒有標準。其他地區的人學習北京話雖然有困難，但是困難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大。據了解，學習北京話的外地人，首先掌握的往往是聲調。北人學北京話一般只學調類，不學調值；而南方人則往往同學會調值。將來在調值上，我們不一定作硬性規定，因為



寫調類。陳先生贊同王力先生用符號標調的方法，他認為好處是方便以後取消它；如果用了字母，那末，當以需要取消調號的時候，詞形就不免要變動。

杜松壽先生認為在文字上標調不標調，同聲調的重要性有必然的關係。即使不算標，也不等於否定它。學習拼音有一般的情況，也有特殊的情況。小學生從入學的第一年就學習拼音文字，這是一般的情況，也就是考慮問題的情況。認識漢字的知識分子或不認識漢字的成人學習拼音文字，應該認為特殊的情況，也就是過渡期間的情況。等將來完全使用了拼音文字，文盲已經掃除的時候，這種情況就不存在了。因此，我們考慮拼音文字的聲調問題應該弄讀者對象。從一般情況說，拼音文字的詞是一個一個認的，每個詞都是作為生詞來認識的。在新詞首次出現的時候該標出聲調，以後就不用標了。在閱讀時候碰到生詞，就查字典，詞典上是標調的。我們知道英文、俄文等的處理是很重要的，處理的辦法就跟上述談的一樣。我們學英文、俄文，一般沒有會話環境，重音常常記不準確。如果出都標重音，對我們是方便的。但是人家並不為外國人考，而在他們的出版物上都標上重音，因為標出重音對他需要不大而麻煩反而增加不少。我們的標調問題也可以這樣考慮。這個意見跟為了區別同音詞（指同聲韻而不同調的）而在詞上標調是兩回事，這裏指的是在沒有同音詞情況只是為了確定調類而標調的問題而說的。拉丁化新文字是標調的，那些沒有同音詞的詞我們可以順利地讀懂它，這就強為把調子標上去反而增加麻煩。至於上述所說的特殊情況，也就是今天學會了字母和拼音明天就念大塊文章，由於缺乏對詞形的長期熟悉過程，如果不每個音節都標調，起見免不了要猜着讀的。但是，時間長了也就不需要猜了。久讀的人念得快，新學會的人念得慢。為了適應這種情況，在一定的讀物上多標調是可以的。

鍾秀生先生（藏族）在會上提出了幾個問題：1. 漢語音節四聲不過 1300 多個，如果只是一音一義，是不是太少？2. 同音同調而不同意義的字很多，要是光利用聲調來意義，是否可能？3. 漢語某些方言，包括北京話在內，有變調的現象，即同一個字在不同的詞語中間聲調有時不同。如果肯定標調，這種情況如何處理？鍾先生認為在解決拼音文字的聲調問題時，用英語、俄語等為例證，恐怕不用的，不如用漢語的親屬語言為好。他扼要介紹了藏語字母——即前後綴輔音和字基輔音根據性別相互拼綴——表示音的高低強弱的辦法，提供製訂漢語拼音文字方案的參考。

卞昌厚先生（苗族）認為在有声調的語言中，聲調是與聲韻母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的，因此贊成拼音文字裏全部標調。他舉出苗語為例，從聲調在分辨詞義的巨大作用，從聲調和聲母、韻母的不可分割性方面，證明標調的必要性。他說，在苗語中，不吐氣清聲母在不同的聲調上可成濁音、濁吐氣音等形式，如果不標聲調，這些聲母的讀法無法確定；此外，假如不標聲調，就要多造好多個字，這也將造成極大的浪費。在談到標調的辦法及聲調的教學問題時，卞先生介紹了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的經驗。他四年來民族學院前後講授了二十三種有声調的語言或方言調的表示是用字母標寫在韻母的後面。同志們在學習

時並不感覺到這種表示法不方便，也沒有感覺到在學習聲調時發生特別大的困難，一般同學在半年內就完全掌握了。有個別同學在學習時發生過困難，但是這種困難不單產生在聲調上，也同時產生在聲母和韻母上。卞先生認為用字母標在韻母後面較好。

俞敏先生不同意卞先生的看法，他說，全部標調在苗語是可以的，對於漢語來說就不一定合適。用北京話為例，成段話中大約有  $\frac{1}{5}$  的字調子模糊，這俗名叫輕聲字，這一部分最好不標。比如“寒” $\text{ㄏㄢ}$  的“ $\text{ㄢ}$ ”，究竟是什麼聲？誰也說不定。“地下”一詞裏的“下”，當然可以考出來是去聲，但是它並不當下頭講，就不該標成去聲了。因此，俞先生主張輕聲字不標，重音字全標。俞先生同意用符號標調，因為容易略下去。只要不普遍標，就可以避免“滿臉麻子”的毛病。

李榮先生說，聲、韻、調同樣重要，拼音文字要把聲、韻、調全標出來。有人認為聲母、韻母重要，聲調不重要，那裏頭有數目的問題，因為聲調少，聲母、韻母多。北京話有四個聲調（連輕聲五個），有二十一個聲母（連零聲母二十二個），韻母更多。標聲母、韻母不標聲調，把四個歸併成一個，這種文字有時可以猜出來。標韻母、聲調不標聲母，把二十一個歸併成一個，這種文字就不好猜。同一段話，要是只標聲韻不標調能看出意思來，換一種標音法，標出韻母聲調，同部位聲母用一個符號（如  $\text{ㄣ}$  代表  $\text{ㄣ}$ 、 $\text{ㄥ}$ 、 $\text{ㄨㄣ}$ 、 $\text{ㄩㄣ}$ ， $\text{ㄣ}$  代表  $\text{ㄣ}$ 、 $\text{ㄤ}$ 、 $\text{ㄨㄣ}$ 、 $\text{ㄩㄣ}$ ），把聲母歸併成  $\text{ㄅ}$ 、 $\text{ㄆ}$ 、 $\text{ㄇ}$ 、 $\text{ㄌ}$ 、 $\text{ㄎ}$ 、 $\text{ㄑ}$  六個，照樣也能看出意思來。拼音文字裏， $\text{ㄣ}$ 、 $\text{ㄥ}$ 、 $\text{ㄨㄣ}$  要有分別，陰陽上去同樣要有分別。

丁聲樹先生同意傅懋勳先生的看法，認為聲調是漢語的特點，聲調的重要不下於聲母、韻母，並認為輕聲也是一種聲調，不過是不能重讀的特殊調。比如“簾子”和“蓮子”的分別就是“簾子”的“子”是輕聲，“買賣”的“賣”字重讀和輕讀意義不一樣。他說，有人嫌全部標調麻煩，事實上我們說話有調並不覺得麻煩，在拼音文字上標出怎麼就覺得麻煩呢？丁先生舉例說明標調的必要性說，王力先生主張像“所以”、“蓑衣”之類聲調不同，可以不標，但是這兩個詞有時也用在一塊兒，比如說“所以蓑衣不帶了”，也可以說“蓑衣所以不帶了”，不標調又怎樣分辨？“賊”這個音（ $\text{ㄘㄟ}$ ）在北京話裏只有一個陽平調，但是別的方言地區學習北京話不見得就知道是念陽平，所以從教學觀點上看，不對立的字音也有標調的必要。至於“單子、彈子、担子”，“政治、正直、爭執、整治”之類是必須分清楚的。有人說有了上下文不標調也能猜出來，但是文字的使用非常廣泛，不是處處都有上下文的，比如記帳、開清單、寫發票、編目錄等等，必須確定明瞭，不能讓人亂猜的。此外如人名地名之類，不標調簡直就無法讀出來。當然，若干絕無誤會之可能的地方偶爾省略是可以的。我們應該正視我們語言的事實，聲調不是外加的東西，在拼音文字上是不可少的。有人說聲調不易學習，事實上，個別聲母、韻母，有些地區的人也學不好，如  $\text{ㄌ}$ 、 $\text{ㄋ}$ 、 $\text{ㄍ}$ 、 $\text{ㄑ}$ 、 $\text{ㄒ}$  的分別， $\text{ㄌ}$ 、 $\text{ㄋ}$  的分別是。既然以北京音為標準，就得規定明確，不能含混。語音的標準必須明確，學習的要求可以放寬。

張壽康先生的意見基本上和傅懋勳先生的相同。他指出聲調不僅在單音詞中有作用，在雙音詞中也有作用：松樹、松鼠，書架、暑假，李子、栗子……如果在書面語言中不標

調的話，將會降低書面語言作為交際工具的作用，將無補於語言的規範化，學習使用都將感到困難。張先生主張有區別詞義作用的帶輕聲的詞（如“做買賣”中的“買賣”，“賣”字輕讀，與“買賣東西”中的“買賣”不同，一是名詞，一是動詞），有用輕聲字母或符號標明的必要。

鄭林曦先生發言說，聲調是否像輔音、元音那樣重要，最好從歷史的、發展的觀點來看。四聲在漢語裏的作用和地位，並不是一向就是這樣而且一成不變的。在現代漢語中多音節詞日益增多的情況之下，它是否還像過去那樣重要呢？聲調誠然是漢語中客觀上存在着的語音現象之一，但是並不見得一種語音上存在的東西都必須在文字上表示出來。語氣在語言中是客觀存在的，而文字上並沒有特別表示出語氣的成分。俄語的重音是有區別詞義的功用的，在彼得大帝以前的俄文裏是把它標出來的，1702年進行改革後却不標了。鄭先生認為文字是不同於音標的。作為音標，要求必須嚴格，需要把音節之間的細微差別，把每一音節的特徵，準確無誤地記錄下來；但是，作為給六億人口應用的文字，則主要應該從人民大眾用起來是否方便着想。如果一種拼音文字不在每一個音節上標出聲調，而絕大多數的詞兒就它的詞形看來也可以分辨意義，並可以把一定的概念表示出來，那又為什麼一定要標呢？不標聲調還可以接受漢字的經驗，漢字為漢

語中本來不存在的東西造了形旁，却偏偏沒有為本來存在的聲調造出標誌。過去在教學上曾有过圈調的辦法，但是未見於正式文字上。不在文字上標調，事實上也並沒有否認調，或使它歸於消滅。當然，在不標聲調就常常會引起混淆的詞類相同的同音詞上，還是可以利用聲調符號加以區別。

陸志韋先生認為作為正音符號而標聲調的問題，重點在於複音節詞，而在於單音節詞。現代漢語裏單音節詞還少，就是標上聲調也還有很多問題，要是不標的話，恐怕行不通的。單音節詞是一個個的意義單位，其中常用的必須寫得面貌清楚，才行得通。陸先生不同意李榮先生發言裏說的下面的假設：“同一段話，……標出韻母聲調，同韻母用一個符號，把聲母歸併成ㄅ、ㄆ、ㄇ、ㄌ、ㄎ、ㄎ、ㄎ、ㄎ、ㄎ、ㄎ六個，也能看出意思來。”陸先生指出，六組聲母只歸併一組還可，要是把“ㄅ、ㄆ、ㄇ、ㄌ、ㄎ、ㄎ、ㄎ、ㄎ、ㄎ、ㄎ”、“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ㄆ”這六組同時歸併的話，恐怕是猜意思來的。

主席章懸在結束會議的發言裏，建議下次座談會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下次討論之前，要歸納出哪些是共同的，哪些是分歧的，就意見分歧的地方進一步深入討論。他說，我要解決一個巨大的問題，希望經過充分討論之後，得到確定的答案來。

##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召開漢語規範化問題座談會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正在籌備今年8月間要舉行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的學術會議（參見本期36頁上的消息）。為了听取有關方面對這個問題的意見，該所特在5月24日下午二時半開了一次漢語規範化問題座談會，邀請在京的同這個問題密切有關的單位和個人參加，了解情況，並初步交換意見。出席的有：于道泉、王還、白鳳鳴、老舍、呂叔湘、朱文叔、杜澎、吳青、岳野、林子丹、俞敏、馬學良、姜椿芳、侯寶林、夏青、張勉予、張壽康、謝添、羅式剛、羅常培及該所工作人員等共四十餘人。該所和中央民族學院的蘇聯顧問謝爾久琴柯教授及其夫人塔塔耶娃教授也參加了這次座談會。

座談會由該所呂叔湘副所長主持。他說：在全國範圍內，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如果沒有一個標準，那在互相交際時，必然要產生許多困難。例如廣東的高等學校畢業生到山西工作，因為言語不通，感覺工作困難，要求調回廣東。可見統一的民族共同語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漢字需要改革，要走拼音化的道路。如果語音、詞彙沒有一個規範，是沒有辦法製訂拼音文字的。有人以為進行語言規範化就是要馬上消滅方言，這是一種誤解，其實只是縮小方言的使用範圍而已。我們語言的規範應該拿什麼做基礎，規範化的工作應該如何進行？請各位先生多發表寶貴的意見。

劉正琰（中央民族學院）說：語音規範化是解決拼音文字的先決條件。大多數人贊成以北京音為基礎，但以過去所謂“國語”而論，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必須先加以調整，把讀音統一起來。地道的北京說法，如“Húyǎn”（隔壁兒）、“ㄅ”（把）之類可以不採用。有些字的讀音要從俗，不必考究本音、古讀，以免羣衆不了解。

老舍說：我在《龍鬚溝》裏本來用的北京土話比較多，演員們又給加上了一些，因此有許多人不能全部了解，演出就受限制，翻譯也增多了困難，這給我的教育很大。我近來收斂多了。作家們喜歡用自己所熟悉的方言、土語，認為這樣

語言才生動有力。其實美不美倒不都在於那些方言，土語簡明有力就美，比如唐詩、陶詩，都極簡練，可也很美。語言的統一是個政治任務，個人須克服自由主義，克服一些困難，要求自己在往統一的路上走的过程中有些幫助，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張朝炳、張勉予（亞偉速記學校）：速記工作者深切感到語言規範化的重要，特別是語音方面。從應用上講，听就不無法速記，即使記了下來也無法翻譯。從教學上講，目前雖然是以北京音為標準，由於國家還沒有規定標準，一般人又缺乏語音常識，因而在速記的教學上增加不少困難。因此，我們速記工作者希望語言規範化能早日實現，認為“舊國音”那樣人為的語音是行不通的。

姜椿芳（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所）說：我們在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經典著作的過程中，因工作同志各人的了解不同，對詞語的使用頗多分歧，常常開會討論，根據通用和隨俗的原則解決。為了譯名的統一，我們設立專門機構，編製卡片，有一二十位同志參加工作。依靠這一機構，我們的譯文才稍具“規範”，但還是範圍很小的一些參考資料，工作中感到的困難日甚多，所以確定比較全面的統一的規範是很必要的。

夏青（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說：在廣播中常常遇到許多難以確定字音，大致有：1）古、今異讀；2）語音與字音；3）不同讀音同樣通行；4）意異音異；5）專業用語讀音；6）外語譯音；7）人名、地名讀音以及8）“兒化”的適用範圍問題。對這些問題，我們的初步意見是：1）古、今異讀依今讀；2）語音、字音依語音；3）不同讀音同樣通行的選擇一種通行下來；4）意異音異的讀法有保留的必要，這對將來實行文字，有利無弊；5）專業用語服從專業；6）外來語之譯音求與原音接近；7）人名從主人；8）兒化韻有一定的用途，適當使用。



莊晶(中央民族學院)說:漢語方言的差別很大,至今標準還沒有完全確立,這給兄弟民族學習漢語帶來了許多困難。如果漢語規範化了,教兄弟民族學漢語就可以有個標準教材有了標準,教員有了準則,學員學習起來也能節省時間和精力,這樣就可以更快地學習漢文及其他科學知識。漢語規範化之後,對有方言差別的兄弟民族語言的規範將有所影響,促使它們也趨向於規範化。

羅式剛(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說:在全國廣大地區,許多是通過舞台上演員的語言來學話的。無疑地,話劇是推廣標準語的一個有力的工具。因此在漢語標準語確立之後,推廣標準語的工作上話劇演員是有很大責任的。坦白地我們演員對語言方面的修養相當差,今後必須加強這方修養。劇作家們對語言的使用也應當注意,因為演員是劇本上的語言來進行表演的。

杜澎(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說:第一個問題,標準音和北語音的界限是什麼?希望明確一下。其次,話劇台詞是京音來讀的,但劇作者在台詞中用了方言詞彙時,如果京音來讀,是否會失去味道呢?同時怕也不容易讓人了什麼意思。翻譯劇本中的語言有些是直譯的,有的是某所特有的習慣用語,有的句子還特別長,這些最好盡量使之接近漢語。

王還(北京大學外國留學生語文班)說:由於我們的工作外國留學生,每篇文章必須逐字逐句地講解,於是我們法和詞義的要求非常嚴格。有些詞句在中國讀者看起來可以含混過去,並不妨礙我們對文章的了解,但一經仔細講解就會出問題。目前大家對語法和修辭似乎不夠重視或是寫文章時失之草率,這就給我們的教學工作造成很困難。這種例子我們在教學中遇到的實在不少,可以隨便舉個:

(一)在《關於中國通史簡編》一文中有一句話:“武帝時,才打了決定性的大戰爭。”平常只說“打仗”而“打戰爭”。這大概是作者一時的疏忽。

(二)《標點符號用法》裏有一句:“句號還有圓點兒的(·),用的人很少,為的是印刷、書寫的工夫差一點,易跟旁的符號相混。”這裏“為的是”應該改為“因為”。

(三)《學習》雜誌1955年4期的社論中有這樣一句“我們並不主張對缺乏必要文化準備和政治經驗的人,須學習唯物主義。”這裏“對”字用得豈不是多餘?

作家們、學者們的文章是被人當作典範來學習的,用詞如果有不妥當的地方,會有很大的不好的影響,所以我希望作家和學者們寫文章時要特別慎重。我們還希望在一範的語法書以外能有一本給每個詞下定義,並說明用法典,使大家有所遵循。否則在教學時就會感到沒有把握,這還是我們吹毛求疵,甚至了解錯了,還是作者自己寫。此外在規範化工作中,標點符號也不能忽視。大家必用法有一致的認識,而且嚴格地實行。

白鳳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說:說唱曲藝用的是北京我們不分尖團,因為北京話裏沒有。京劇裏講究分尖團,得分在什麼地方使,“令箭”、“寶劍”的“箭”跟“劍”就不個念法。規範化的時候最好別把北京沒有的音給加進去。

吳壽(北京電影演員劇團)說:我在對電影演員進行語音的工作中,感到有幾個重要問題需要解決。首先我感到演員從思想上明確全國人民對語言規範化的迫切要求,明確在全國語言規範化工作中電影演員負有怎樣重大的。我希望今後在推行語言規範的工作中,能從理論上和上對這個問題給予深刻的闡明,從而推動電影演員在工地負起應盡的光榮任務。其次是使演員更進一步理解語科學性的問題。有許多演員有改正語音的要求,但感到像汪洋大海,學一個記一個,沒有依傍,難於徹底改

好,因而沒有信心。我們進行語音訓練是從掌握語音的規律性入手的:先使演員了解北京語音的規律,了解自己方音的規律,並找出兩者的差別和對應關係來,然後進行比較研究,看異同點在哪兒,這樣就可以舉一反三執簡馭繁了。還有,就是需要社會輿論來督促演員更有毅力地克服自己語言中的方言口音。語音在我們的生活中已經成為下意識的習慣,要把這下意識的習慣有意識地克服,並逐漸使正確的語言變成下意識的習慣,這是個艱苦的過程。

曹書端(廠橋小學)說:我們參加會議、參加學習,有時因為發言人的口音不好懂,就不能充分吸取他人之長、彌補自己之短,因此感到苦惱。我們不希望今後孩子們長大再有同樣的苦惱,那就需要進行語言規範化的工作。小孩子的語音最容易糾正,他們最相信的是老師,他們無意中就摹倣教師的言談舉止,因此全國小學教師應當把學習標準語、為語言規範化打基礎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看待。為了使小學教師學好標準語,希望領導上能有一系列的措施,例如,專門為教師編寫適用的辭典,電台每天在業餘時間用標準語聯播課文的講讀作為示範,就像通過播音來教學俄語一樣。總之,語言規範化是需要的。小學教師在這一工作上能起很大作用,希望幫助教師,使之能對這一個意義重大的任務有足夠的認識,同時也要給予具體的必要的幫助。

最後是謝爾久琴柯教授發言。他說:大家提出來的問題,不僅關係到語言研究所的工作,而且關係到國家利益。我們必須建立統一的民族標準語,才能解決今天已經發現的許多語言方面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書中說:“民族運動的力量決定於該民族廣大階層即無產階級和農民參加運動的程度”(《斯大林全集》2卷303頁)。斯大林同志又說過:“民族的共同體非有共同的語言不可,國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語言……這裏所指的是民衆的口頭語言,而不是官場的文牘語言”(同上書292頁)。應該有統一的共同語來進行全民教育,來團結各階層。談到民族的概念,要和書面的口頭的全民語言的概念聯繫起來。由於歷史條件限制,全民性的漢民族語形成得很遲緩。現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必須建立一個無論是哪個方言地區的人都能懂的全民的統一的語言。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建立這樣的一個在書面上和口頭上都統一的標準語。

新中國各方面的經濟聯繫日益加強,來往越來越頻繁,交通越來越發達,這些都促使我們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語。我們應該定出一個明確的語言規範,並且把它推行到各地。目前由於缺少統一的規範,就產生了一些不好的影響。例如:有的學生听不懂老師的話,有的老師听不懂學生的話;如果一個學生由某地轉學到另外一個地方,成績就會下降。剛才戲劇工作者和廣播工作者舉了一些例子,也是由於規範沒確定使工作受到影響。北京的廣播電台用北京話廣播,別處是不是都能听懂?能完全收到應有的教育效果嗎?這些問題廣播台的同志也應該考慮到。莫斯科的廣播蘇聯任何地方的聽眾都能懂,能充分發揮教育作用。但在中國,南寧用北京話、白話(廣州話)、西南官話三種方言廣播;南京用北京話、上海話兩種方言廣播,這種情況是不能長期容忍的。文化工作者和知識分子應該掌握標準語的規範來促進新中國文化的發展。在北京演出的話劇是很好的,各方面的藝術很高。新中國的戲劇正在日益發展着,但是如果要到南方給不懂北京話的觀眾演出,話劇的優點和教育作用就沒有了。譬如說,如果演給廣東人看,他們就看不懂。前些日子我們在南京、上海、南寧等地開了一些座談會,大家感到北京話的語音按照他們的話講是“很美的”。各地的學生也都要求老師教北京話,因為他們感到北京話用處很大。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都應該考慮標準語這個問題, (轉12頁)

# 新書預告

## 活教育批判

人民教育社編 (八月份出版)

爲幫助廣大教師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聯系學習辯證唯物主義，人民教育社特選編‘活教育批判’一書。本書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活教育’討論結束語，第二部分是‘活教育’初步討論，第三部分是活教育學校調查報告，第四部分是对活教育的理論與著作的分析批判，第五部分是对活教育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些文章都是從1951年至1953年‘人民教育’及‘新教育’等刊物中選出的，可供研究參考。

## 古代世界史

柯瓦達夫著 何東輝譯 (八月份出版)

本書是蘇聯學校五、六年級用的古代世界史課本。自從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作出了過渡到普及中等教育和在中等學校實行綜合技術教育的決定以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部會同教育科學院製訂了初等和中等學校的新教學大綱，本書就是按照新的歷史教學大綱編寫的課本。

全書包括緒言和‘原始人的生活’、‘古代東方’、‘古代希臘和黑海沿岸各族’、‘古代羅馬’等部分。在緒言中介紹了關於歷史的一些基本概念。同舊用的課本比較，把原始人的歷史獨立成章是這本新課本的一個特點；這裏簡單敘述了原始人的生產性質同集體所有制的關係，語言和宗教的起源等等。以下的三個部分概括了古代埃及、兩河流域、烏拉爾圖、波斯、印度、中國、希臘、西徐亞和羅馬的歷史，顯示了奴隸制世界的面貌。本書的目的是把古代世界的基礎歷史知識授與學生，引導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理解歷史，幫助他們建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

###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市期刊登記證出期字第〇二二號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爲定期出版物

每冊定價人民幣二角  
(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 中國語文

月刊

一九五五年七月號

第三十七期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

社長 章 黎

編輯委員 丁西林 王 力 呂叔湘  
杜松海 吳曉鈴 林漢達  
高名凱 陸志韋 陳 剛  
倪海曙 章 黎 曹伯韓  
莊 棟 傅懋勛 葉恭綽  
葉聖陶 葉羅士 鄭之東  
黎錦熙 魏建功 羅常培

總編輯 林漢達

編輯者 中國語文雜誌  
北京景山東街四十五號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東街四十五號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館  
北京 虎坊橋

總發行處 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

代銷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1-29.780

預訂 { 三個月三期 六 角  
半年六期 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期 二元四角

寄費 { 1. 平郵寄費不計  
2. 掛號郵費由訂戶負擔

周漢臣 1955.7.29.